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

王福堂 著

语文出版社

HANYU FANGYAN YUYIN DE YANBIAN HE CENGCI

# 汉语方言
# 语音的演变和层次

王福堂 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王福堂著.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1

ISBN 7—80126—397—9/H·96

Ⅰ.汉…　Ⅱ.王…　Ⅲ.汉语方言－语音演变规律－研究　Ⅳ.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4506 号

HANYU FANGYAN YUYIN DE YANBIAN HE CENGCI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6.375 印张　16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1.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前　言

1991 年起，我在讲课中尝试从变化规律和形成原因的角度给学生介绍汉语方言中语音词汇等方面的现象。因为涉及到当前汉语方言研究的实际，所以几次讲授后，观察问题的角度逐渐集中到了演变规律和不同层次的鉴别方面。1996 年，工作纳入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研究项目，得到项目基金的支持，得以整理课程的讲稿。本书所述是其中的语音部分。

近年来不少高校在建设汉语方言学方面投入了力量。国外在这方面也有卓越的工作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不过汉语有自己的方言土壤，我以为汉语方言学应该尝试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只有这样，作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才能适合语言理论建设和汉语方言研究的实际需要。本书所述是探索中的一些初步设想。尽管一些部分的论述还不充分，在这里发表出来，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

本书共八章。前面两章分别介绍汉语方言中由语音演变和外来影响这两种不同原因造成的语音变化以及它们的表现形式。前一种演变中有新旧不同的语音形式，后一种变化中有来源不同的语音层次，需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后面“儿化韵”等三章是个案处理，介绍几个重要的方言现象，探索它们生成发展的规律。“原始

闽语"一章是根据头两章的认识对一个古方言音系构拟所做的分析。关于方言分区的两章，因为和对方言语音演变和层次的认识有关，所以也收在里面。

附录是我在1964年秋为方言调查实习课写的总结。其中语音的描写和比较实际上牵涉到演变和层次的问题。三十多年前的旧作，虽然所记个别语音现象（如发音时声母持阻阶段的延长）或许和发音的特定场合有关，有的提法（如说孝义话降升调使音节分裂为二，晋中方言文白异读反映阴阳对转）还需要改善，但作为早期观察的一页，也附入以供参考。

本书从某些著作中引用的观点，在文内直接说明了出处。引用材料则不一一注明，请参看各章后的参考文献目录。

王福堂

1997年10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 目　　录

一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 …… (1)
(一)语音变化的原因 …… (1)
(二)语音变化的方式 …… (3)
(三)语音变化的规律性 …… (6)
(四)语音变化的系统性及其表现形式 …… (8)
二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音变化 …… (19)
(一)以语音因素为接触内容的语音变化 …… (19)
(二)以词汇因素为接触内容的语音变化 …… (29)
三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一) …… (40)
(一)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工作 …… (40)
(二)划分汉语方言的标准 …… (46)
四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二) …… (54)
(一)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 …… (54)
(二)闽方言和吴方言的关系 …… (64)
(三)晋语的设立 …… (71)
五　原始闽语的构拟 …… (78)
(一)构拟汉语原始方言的背景 …… (78)
(二)原始闽语构拟的内容 …… (79)
(三)对原始闽语声母系统的讨论 …… (84)

六　儿化韵…………………………………………………………（104）
(一)儿化韵的地区分布和语音形式……………………………（104）
(二)儿化韵的性质……………………………………………（105）
(三)儿化韵的合音方式………………………………………（108）
(四)儿化韵的形成……………………………………………（112）
(五)儿化韵韵类的调整和归并………………………………（117）
(六)儿化韵调整归并中的"逆行"现象…………………………（120）
(七)儿化韵的衰亡……………………………………………（124）
(八)儿化韵和小称变调………………………………………（128）
七　子变韵…………………………………………………………（135）
(一)子变韵的分布和语音形式………………………………（135）
(二)子变韵的合音方式………………………………………（138）
(三)子变韵和基本韵母的对应………………………………（141）
(四)子变韵的演变……………………………………………（147）
八　连读变调………………………………………………………（154）
(一)连读变调的性质…………………………………………（154）
(二)连读变调的类型…………………………………………（154）
(三)连读变调和轻声…………………………………………（161）
(四)变调和单字调的关系……………………………………（162）
(五)连读变调和声调包络……………………………………（171）
(六)合音变调…………………………………………………（176）

**附录**:晋中榆次、太谷、祁县、榆社、平遥、介休、灵石、孝义
方言语音特点简述 ………………………………（181）

# 一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

汉语经历数千年长时期的发展，语音上有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各地变化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长时期这样巨大的不同的变化，造成了目前各地方言语音纷繁复杂的局面。汉语方言语音变化的原因，变化的方式，变化的过程，以及变化的结果，都很值得探求。

## （一）语音变化的原因

汉语方言语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出于发音上省力和方便的要求，引起发音动作的改变。发音上省便的要求使音节内部不同语音成分相互影响，改变了其中一方或双方原有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变得彼此相近或者相同。以下列方言声母的实际音值来说明：

| | 厦门 | 福州 | 梅县 | 南昌 |
|---|---|---|---|---|
| 九 | ᶜkiu | ᶜk̘ieu | ᶜciu | ᶜtɕiu |

把这些方言的字音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南昌话见母字"九"的声母因为前元音的影响而经历过一个腭化的过程：

k → k̘ → c → tɕ

在这个过程中，舌根音声母为了和前元音的舌位协调，发音部位越

来越向前移动，最后变成了舌面前音。

又如复元音的单化：

| | 北京 | 太原 | 西安 | 济南 | 合肥 |
| --- | --- | --- | --- | --- | --- |
| 拜 | pæeᵓ | pæɛᵓ | pæᵓ | pɛˊ | pEᵓ |

蟹摄开口二等韵“拜”字的复元音韵母 ai* 在北京、太原方言中韵腹和韵尾相互影响，韵腹元音舌位逐渐升高，韵尾元音舌位逐渐降低，彼此逐渐接近；在西安、济南、合肥方言中则合并成了单元音，而且因为元音的舌位偏前而逐渐高化。

相对来说，汉语语音的变化还不是太复杂的。汉语音节结构在上古时期的情况目前存在不同的构拟，但根据《切韵》，至少在中古时期要比印欧语系各语言来得简单。汉语也不像印欧语系各语言那样富有多音词，构词多用屈折方式。汉语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多单音词，语音的变化基本上是在音节内部进行的，变化方式相对也要简单得多。

汉语语音的变化大多是由发音上的同化作用引起的，音变种类主要有声母的清化、腭化、弱化，韵母的鼻化、单元音化、复元音化等。也有因异化作用引发的音变，同样也是发音上省力方便要求的结果。例如广州话：

| 帆 | 篮 | 乏 | 蜡 |
| --- | --- | --- | --- |
| ꜀fan | ꜁lam | fat꜆ | lap꜆ |

咸摄字“帆”、“乏”的韵尾本来应该和“篮”、“蜡”相同，都是唇音 m、p。但“帆”、“乏”因为声母也是唇音，发音过程中要求发音部位先在唇部，然后转向其他部位后再转回到唇部。一个音节内同一唇部先后有两个发音动作，显然比较费事。于是，在发音省力方便的要求之下，韵尾被声母所异化，变成了舌尖音 n、t。这样，“帆”、“乏”二字就不再和“篮”、“蜡”同韵，而和山摄字“兰”꜁lan、“辣”lat꜆同韵了。

还有的语音变化无法用发音机制来说明原因，需要从其他方

面去寻找答案。例为合肥话“鸡”字和“资”字同音，韵母都是 ɿ。“鸡”字的韵母在安徽方言中一般都是 i，合肥话自身并不能说明 i 音变成 ɿ 的原因。但这一答案可以从邻近的和县话找到。比较下面合肥话和和县话各字的读音：

| | 资 | 鸡 | 姐 |
|---|---|---|---|
| 合肥 | ꜀tsɿ | ꜀tsɿ | ꜂tɕi |
| 和县 | ꜀tsɿ | ꜀tɕi | ꜂tɕiɪ |

和县话“资”、“鸡”、“姐”这三个古韵母不同的字目前的韵母也都不相同，而合肥话“资”、“鸡”同韵。可以设想，合肥话早期的情况应该是和和县话相似的，只是后来字音发生了变化，“姐”字韵母变成了 i，“鸡”字韵母变成了 ɿ。可以认为，合肥话“鸡”字韵母的变化是在“姐”字韵母变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也就是说，是“姐”字韵母由 iɪ 向 i 的变化使“鸡”字韵母由 i 变成了 ɿ。因为只有这样，“鸡”字的韵母虽然变得和“资”字同韵，但仍然能保持和“姐”字韵母的区别。这种由于语音系统要求保持某些特定音类的区别而发生的音变，和发音机制没有直接关系。

## (二)语音变化的方式

语音的变化大多采用渐变的方式。这是由语言的渐变性决定的。一个语音成分的变化，开始时只在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造成细微的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逐渐积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变化不断进行，差异不断积累，最终结果就是汉语语音古今的巨大差别。

在语音变化的过程中，通常是新的语音形式出现，旧的语音形式消失，二者并不同时存在。而且因为一般情况下语音在一段时间内变化不大，所以音变也不容易被人们所觉察。但有时语音变

化比较快,短短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就会积累起可以被觉察到的差异,而且新旧语音形式同时存在,表现为老中青口音的不同。例如上海话:

| | 老① | 老② | 中 | 青 |
| --- | --- | --- | --- | --- |
| 雷 | le | le | le | lᴇ |
| 来 | lᴇ | le | lɛ | lᴇ |
| 兰 | lɛ | lɛ | lɛ | lᴇ |

“雷”、“来”、“兰”三字的韵母分别来自中古蟹摄合口一等、蟹摄开口一等和山摄开口一等。在上海少数老年人的口音“老①”中,三字韵母元音舌位相近,但不相同。不同音值反映不同历史来源,显然“老①”是较早的读音。在多数老年人的口音“老②”中,“雷”、“来”韵母元音合流,二字同音。在中年人(包括少数青年人)口音中,“来”、“兰”韵母元音合流,二字同音。看来在“老②”和中年人口音中,三字合流的方向并不一致,似乎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中。但最后青年人(包括少数中年人)口音中“雷”、“来”、“兰”韵母合流,三字同音。这就在两三代人、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项音变,而为人们所觉察。

语音的变化也采用突变的方式,即某一类语音成分由原来的形式突然变成新的形式,中间没有过渡。不过在语音突变的同时,仍然会有其他因素来体现语言的渐变性。比如新旧两种语音形式可以在不同条件下同时存在。以山西五台话为例。五台城区话有两组入声韵:

八 paʔ꜆　夹 tɕiaʔ꜆　刷 suaʔ꜆　曰 yaʔ꜆

喝 xɔʔ꜆　钥 iəʔ꜆　骨 kuɔʔ꜆　月 yəʔ꜆

这些入声字可以出现在语句的任何位置上。但在五台走马岭话中,入声字只在非词末位置保留喉塞韵尾。如:

八哥 paʔ꜆ ꜀kɔ

夹袄 tɕiaʔ꜆ ŋuəˑ

刷子 suaʔ, tə'

脊背 tsɔʔ, pei'

钥匙 iɔʔ, sɿ'

骨毒*(拳头) kuɔʔ, tuɔ,

月明 yɔʔ, mi'

单念时或出现在词末位置时则失落喉塞韵尾，韵母转入阴声韵。如：

八 pa,　夹 tɕia,　刷 sua,　曰 ya,

脊 tsɔ, tɕiɔ,　钥 iɔ,　骨 kuɔ,　月 yɔ,

这样，五台走马岭话的入声韵就先于城区话开始了消亡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入声韵向阴声韵的变化从音值来看是突然的，中间没有韵尾的变化作为过渡。不过，在一种语音条件下保留入声韵，在另一种语音条件下变成阴声韵，体现了语言的渐变性。

语音变化采取突变方式，变化条件也可以是非语音的。例如北京话 uei 韵母阳平调“危微”等字向阴平调的变化。变化也是突然发生的，或是读阳平，或是读阴平，中间没有调值的过渡。因此这种变化也不是渐变，而是突变。这些字发生音变的语音条件相同。但是否发生音变，音变的早晚和快慢，却因词而异，即取决于词汇的条件。如“危微薇巍”等字阳平、阴平两读由来已久，大约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目前以读阴平为常，《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也已经确定为阴平字。“唯惟维违”等字在口语中开始出现阴平一读则要晚得多，目前阳平和阴平两读，阴平的读法还没有被规范所认可。而“围为桅”等字则目前仍然只有阳平一读，还没有什么变化。这些字在音变过程中所处阶段的不同，可以表示如下：

| ① | ② | ③ |
| --- | --- | --- |
| 危微薇巍 | | |
| | 唯惟维违 | |
| | | 围为桅 |

①指音变已经完成,②指音变正在进行,③指音变还没有发生。这种音变方式就是王士元所说的"词汇扩散"。变化在语音上表现为突变,但在词汇方面有先有后(因此被称为离散式音变),仍然体现了语言的渐变性。

## (三)语音变化的规律性

语音变化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同样的语音条件引发同样的语音变化,不管这种条件所涉及的语音成分数量的多少。以北京话古全浊声母字为例,声母清化后其中塞音塞擦音有的送气,有的不送气。例如:

铜(平)　动(上)　洞(去)　独(入)

꜀tʻuŋ　tuŋ꜄　tuŋ꜄　꜁tu

送气不送气取决于古调类,变化的规律即是平声送气,仄声(上、去、入)不送气。

但人们发现,语音变化常有例外现象,无法以音变规律来说明。比如浊入字"突"、"特",北京话声母应该是不送气音,实际上却是送气音,读作꜀tʻu 和 tʻɤ꜄;"渗",所禁切,生母沁韵,潮州话应该读作 siəm꜄,实际上却读作꜀tsʻam;"糙",去声字,北京话却读作꜀tsʻau,阴平;"蕊",止摄合口字,苏州话韵母应该是 y,实际上读 iʏ,和流摄字同韵,等等。这些都是不符合音变规律的例外。

语音变化的例外按理是可以找到原因的。比如上面所说的北京话"突"在《广韵》中有陀骨、他骨两个反切,读音꜀tʻu 的来源不是陀骨切,而是他骨切。潮州话"渗"字是声旁"参"(参加)꜀tsʻam 引起的误读,北京话"糙"是因为避讳某个字音而改变了读音,苏州话"蕊"则是借用了流摄字"纽"(花纽头)ȵiʏ꜄的读音,是一种训读,等等。

不过以上例外都是由语言使用中的社会心理现象或是文献材料方面的困难造成的，并不是语音历史演变的结果，所以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例外。真正意义的例外，原因要从下面两个方面去寻找。

1. 不同音变规律的影响

在语音演变的过程中，本来某字的变化应该受某一语音条件支配，但因为另一语音条件的影响，改变了应有的变化方向，成为例外。例如西安话“女猫”一词中的“女”ˋmi（常写成“咪”），作为泥母鱼韵字，应该和“女”字在其他使用场合中一样读作ˋȵy。不过，联系其他方言来观察，可以发现汉语方言中鼻音声母发音部位转移而发音方法不变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比如合肥“泥”（泥）ˏmɿ，建瓯“尼”（泥）mi²，“日”（日）mi₂，苏州“蚁”（疑）mi²，温州“蛾”（疑）ˏmai，广州“弥”（明）ˏnei 等等，各字音声母的例外，都是因为泥、日、疑、明母等鼻音声母的发音部位转移而造成的。这种音变虽然只涉及到部分字，但也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西安话“女猫”中“女”字声母的例外，就是这一规律的表现。泥母字“女”声母的正常演变正是受到这一规律的干扰，才变成了 m。不过从河北滦县、定兴等方言母猫叫“伲（妮）猫”的情况来看，“女”字的声母在变成 m 以前，韵母先要由 y 变成 i，然后声母再发生变化。因此变化过程应该是

ny → ni → mi

另外，不同音变规律的影响也表现为一种感染作用，即同一音类中的语音成分在不同语音条件下发生不同音变，其中个别字音本来应该按甲条件变化而却被乙条件所感染，因而成为例外。例如汉语方言上声字中全浊上字普遍和浊去字合流，归入去声（阳去）调，清上字和次浊上字则另有变化方向。但有的方言个别清上字和次浊上字因为受全浊上字音变规律的感染，也归入了去声（阳去）。例如长沙话清上字“捅”t'ʊn²，广州话次浊上字“老”（细老）

lou², 都在本方言中成为例外。

**2. 词语不同使用频率引起的差异**

同一音类中的不同字音，因为组成的词语使用频率不同，各字音自身的变化是否发生以及变化速度的快慢也就不同。以北京话为例。“内馁嫩黁”等泥母蟹臻摄合口字，由于发音部位靠前的声母和韵尾的共同影响，舌位偏后的介音 u 逐渐趋于不稳定，多数字的韵母开始由合口韵向开口韵转变。如下表所示：

| | ① | ② |
|---|---|---|
| 内 | nei | nei |
| 馁 | nei、nuei | nei |
| 嫩 | nən、nuən | nən |
| 黁 | nuən | nuən |

①指五十年代的情况。“内”字只有开口韵一读，已经完成了介音 u 失落的音变过程，“馁”、“嫩”兼有开口合口两读，说明正处在音变的过程中，“黁”则没有发生音变。②指九十年代的情况。“馁”、“嫩”和“内”一样也已经只有开口韵一读，但“黁”仍然保持合口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词汇扩散”的现象。四字中“内”、“嫩”是常用字，“馁”、“黁”是非常用字。就上述例字看，北京话使用频率高的字音比使用频率低的字音变化快，说明词语使用频率的不同造成了音变规律的例外。

## (四)语音变化的系统性及其表现形式

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拥有相当数量的语音成分。它们因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等方面的异同分成种种集合和组合，即种种大小不等的类。语音成分的变化要受语音条件的影响，同类语音成分的变化要受同一语音条件的影响。因此方言中语音成分的变化主要

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由行动，而是声韵调各个不同层级的集群的集体性变化。也就是说，语音变化要受语音系统的制约，具有系统性。

一般所说声韵调的集群，声母方面有系、组、清浊、全清次清、全浊次浊，韵母方面有韵腹（摄、等）、韵头（开合、洪细）、韵尾（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声调方面有舒（平上去）入、平仄（上去入），等等。对有的方言来说，以上反映中古音韵结构的集群还不一定都能说明所有的语音变化，需要在方言现代语音系统的基础上再补充归纳集群，如送气不送气、四呼等。

语音变化的系统性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 合流和分化**

合流指本来不同的声母、韵母或声调的音值逐渐变得相近以至相同，结果是语音系统中减少了一类声母、韵母、声调或它们间的配合。如苏州话细音前精组见组声母字在不同年龄层口音中的读音：

| | 老 | 青 |
|---|---|---|
| 济（精）～计（见） | tsi꜄≠tɕi꜄ | tɕi꜄＝tɕi꜄ |
| 妻（清）～溪（溪） | ꜀tsʻi≠꜀tɕʻi | ꜀tɕʻi＝꜀tɕʻi |
| 齐（从）～奇（群） | ꜁zi≠꜁dʑi | ꜁dʑi（꜁ʑi）＝꜁dʑi |
| 西（心）～希（晓） | ꜀si≠꜀ɕi | ꜀ɕi＝꜀ɕi |
| 徐（邪） | ꜁zi | ꜁dʑi（꜁ʑi） |

精组字声母老年人口音保持为舌尖音，“济妻齐西”和见组字“计溪奇希”不同音，保持尖团音的区别；而青年人口音精组字声母腭化成舌面前音，上述两组字同音，尖团不分。这样，苏州话细音前的精组见组声母就通过老年人口音向青年人口音的过渡完成了合流，尖音字消失。

分化指原来同一声母、韵母或声调的字音经历音变而不再相同。比如湖北大多数方言见组细音字声母是舌面前音 tɕ tɕʻ ɕ，但

广济话见组字声母虽然在齐齿韵前仍然是舌面前音，在原撮口韵前却变成了卷舌音：

今 ꜀tɕin　欠 tɕ'iẽ꜄　希 ꜀ɕi

军 ꜀tʂʮən　劝 tʂ'ʮẽ꜄　虚 ꜀ʂʮ

这样，广济话见组细韵字声母就以齐撮韵的不同为条件发生了分化。

2. **平行发展及平行的破坏和重建**

本来同组的声母、韵母或声调经历音变后仍然保持同组，叫做平行发展。如前述苏州话齐撮韵前的声母 ts ts' s 在青年人口音中变成 tɕ tɕ' ɕ，保持了声母发音部位的一致；广州话咸摄合口三等唇音字"帆"、"乏"韵尾由 m、p 变成 n、t，保持了韵尾发音部位的一致，都属平行发展。

但同组的语音成分如果在音变过程中遇到不同的语音环境，也有可能变得不再同组，这就出现平行的破坏。比如吴方言区大部分方言晓匣母字声母在开合口韵前是 h ɦ，发音部位相同，属于一组，但在齐撮韵前发音部位不同，晓母是舌面前音 ɕ，匣母是舌面中半元音 j，ɕ 和 j 不同组。例如苏州话：

孝（晓）ɕiæ꜄

效（匣）jiæ꜄＝耀（喻）

晓匣母音变中平行的被破坏，原因在于晓母字声母 h 在腭化成 ɕ 的过程中没有遇到方言音系中其他语音成分的干扰，而匣母字声母 ɦ 则在腭化的中途受到声母 j（喻）的吸引而和它合流，不能再向前腭化成和 ɕ 同组的 ʑ：

h → $x_j$ → ç → ɕ

ɦ → $ɣ_j$ → j ↛ ʑ

匣母字声母的这一音变现象和吴方言喻母字音节不以纯元音起头而具有声母 j（和 ɥ）有关。老湘语喻母字仍然保持以纯元音起头，匣母字声母的变化情况就完全不同。例如娄底话：

孝(晓) ɕiɤ³

效(匣) ʑiɤ²≠耀(喻) iɤ²

晓匣母声母在腭化过程中都没有受到外来干扰：

x → xʲ → ç → ɕ

ɣ → ɣʲ → j → ʑ

x ɣ 变成 ɕ ʑ,腭化后仍然同组,保持了平行。

又如苏州话流摄字"走"、"酒"的读音,老年人口音中韵母是 øy(ʏ)、iøy(iʏ),开齐两呼构成一组韵母。但青年人口音"走"字韵母变成 ei,"酒"字韵母变成 y 或 iø,分属不同韵组。这是因为开口呼韵母 øy 由圆唇元音变成不圆唇音的 ei 后,同组齐齿呼韵母的变化受到苏州方言韵母的介音和韵尾不能同是高元音 i 的限制,无法同步变成 iei：

øy → ei

iøy ↛ iei

于是 iøy 只能并入音近的韵母 y("酒"="举")或 iø("酒"="捲"),因而平行被破坏。

平行破坏后,韵母系统会变得凌乱不整齐。不过系统化是语音的内在要求。在某些方言中,平行破坏后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起来。以赣方言效摄字(一等"保"、二等"饱"、三四等"标条",知照二等"抄梢"、三等"潮烧")和流摄字(一等"头"、三等"酒优",知照二等"愁"、三等"周收")的韵母为例：

| | 保饱、抄梢二 | 潮烧三 | 标条 | 头、愁二 | 周收三 | 酒优 |
|---|---|---|---|---|---|---|
| 武宁 | au | iau | iau | iao | iu | iu |
| 峡江 | au | ɛu | iau | ɛu | iu | iu |
| 宜丰 | au | æu | iɛu | æu | əu | iu |
| 南昌 | au | ɛu | iɛu | ɛu | əu | iu |

以上效流摄知照三等字属齐齿韵的特点保存在赣方言的中心地区。不过各地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如武宁泉口话效摄字特点保存

完好，但流摄字开口韵转为齐齿韵，平行发展受到损害。峡江话效摄知照三等字分化出韵母 ɛu，但因为可以并入流摄，所以平行破坏后得以迅速恢复。宜丰话效流摄知照三等字都分化，虽然由效摄分化出的韵母 æu 并入流摄，但由流摄分化出的韵母 əu 却和原开口韵 æu 重叠，两摄韵母不仅平行发展被破坏，而且韵母多样，韵组凌乱。南昌话效流摄知照三等字分化情况和宜丰话相同，但韵母音值已有调整，有 ɛu、iɛu 和 əu、iu 两个新的组合，只剩效摄原开口韵 au 成为孤韵。赣方言知照三等字韵母的分化是声母在官话影响下由舌面前音向舌尖音变化的结果。因此，只有在知照组声母的音变全部完成以后，效流摄韵母平行发展的破坏和重建过程才会终止。

再以部分吴方言梗摄字（“棚硬兵经横”）和宕摄字（“帮娘光旺”）江摄字（“江”）的韵母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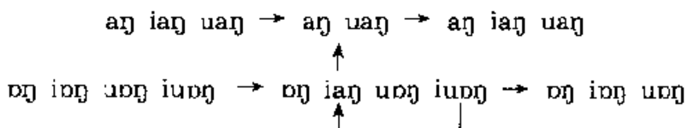
| | 棚硬二 | 兵三经四 | 横二 | 帮一江二 | 娘三 | 光一 | 旺三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 | aŋ | in | uaŋ | ɒŋ | iaŋ | uɒŋ | iɒŋ |
| 宁波 | ã | iŋ | uã | ɔ̃ | iã | uɔ̃ | uɔ̃ |
| 绍兴 | aŋ | iŋ | uaŋ | ɒŋ | iaŋ | uɒŋ | uɒŋ |
| 松阳 | aŋ | in | uaŋ | oŋ | iaŋ | oŋ | ioŋ |

从上表看，各方言韵组的平行发展都经历过破坏和调整。其中梗摄开合口二等和开口三四等字的韵母早期应该是 aŋ、iaŋ、uaŋ，但齐齿韵除因照三字声母演变及个别字介音失落使韵母转为开口呼，从而得以保留主要元音 a，如苏州“声”꜀saŋ、“盛”zaŋ꜄，松阳“柄”paŋ꜄，此外都已经和深臻曾摄齐齿韵 in～iŋ 合流。如苏州话：

英（庚）、婴（清）꜀in＝音（侵）＝因（真）＝应（蒸）

aŋ 组韵母因此失去了齐齿韵，平行发展被破坏。宕江摄字早期韵母如苏州话应该是 ɒŋ、iɒŋ、uɒŋ、iuɒŋ。在梗摄 iaŋ 变成 in～iŋ 以后，宕摄的韵母 iɒŋ 随即调整而音变成 iaŋ，使 aŋ 组韵母复归完整，重建平行。而以后宕摄合口三等韵 iuɒŋ 音变成 iɒŋ，也使 ɒŋ

组韵母恢复完整,重建平行。表中松阳话情况和苏州话相同,而绍兴、宁波方言中虽然宕摄合口三等韵没有发生上述音变,但通过另一途径(江摄见晓组声母字的文读)也重新出现了齐齿韵,如绍兴"降"(投降)꜀iɒŋ,宁波"降"(降落)꜀tɕiɔ̃(꜀tɕyɔ̃)。总的来看,由于语音的系统性要求而产生的调整活动,使吴方言早期 aŋ ɒŋ 两组韵母的平行发展在破坏后都告恢复。以苏州话为例,这一过程可以假设如下:




3. **整化**

语音系统中某些凌乱不成系统的语音成分,在音变过程中有可能和音值相近的语音成分合并,整化成一个系组。例如闽北话深臻曾梗摄和咸山摄字的韵母:

| | 明 | 深 | 年 | 仁 | 延 | 寒 | 献 |
|---|---|---|---|---|---|---|---|
| 建瓯 | meiŋ | ts'eiŋ | niɪŋ | iɪŋ～ieiŋ | ieiŋ | kuɪŋ | xyɪŋ |
| 松溪 | meiŋ | ts'eiŋ | niɪŋ | ieiŋ | ieiŋ | kueiŋ | xyɪŋ |
| 建阳 | meiŋ | ts'ɪŋ | nieiŋ | iɪŋ | ieiŋ | kueiŋ | xyeiŋ |

从各方言的例字可以看出,由两个都不完整的 eiŋ 组韵母和 ɪŋ 组韵母整化成一个四呼俱全的 eiŋ 组韵母的过程,是逐步进行的。建瓯话 eiŋ 组韵母只有开口齐齿呼 eiŋ、ieiŋ 两个,ɪŋ 组韵母只有齐合撮韵 iɪŋ、uɪŋ、yɪŋ 三个,都不完整。不过 iɪŋ 韵母字在零声母条件下又读 ieiŋ,如"仁"꜂iɪŋ～꜂ieiŋ,显示出整化过程已经开始。松溪话 eiŋ 组韵母则已经扩及到齐齿呼全部零声母字和合口字:ieiŋ、ueiŋ,整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ɪŋ 组韵母只剩齐撮韵 iɪŋ、yɪŋ,减少了一个合口韵。建阳话则 eiŋ 组韵母更扩及到齐合撮三呼:ieiŋ、ueiŋ、yeiŋ,虽然还保存有部分 iɪŋ 韵母字,但四呼俱全的 eiŋ 组韵

母已经出现。综合三个方言的情况来看，整化实际上表现为韵母 iŋ 中韵腹元音 i(如果把 iŋ 标写成 iŋ 的话)复化成 ei 的音变。而推动这一音变的，则是不完整的韵母重组成新的完整的组合的要求，就中反映了语音变化中系统化的力量。

**4. 链移**

链移指音系中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具有某种关系的多个声母、韵母或声调，向着同一方向变化，而大致保持彼此原有的关系，表现为 A 变成 B，B 变成 C，C 变成 D 等，或 B 变成 A，C 变成 B，D 变成 C 等。这种音变并不是成组的语音成分的同步变化，而是不成组的语音成分连成一个系列作递进式的变化，所以也称为音移或连续式音变。

链移中音变的动力来自音链一端的某个语音成分。如果这个语音成分发生变化，变得和语音系统中另一个语音成分相似，它就有可能迫使这另一个语音成分也发生变化，以免和它混同。这个语音成分进而又再迫使另一个语音成分发生变化，从而引发连锁反应。这种因排斥而引发的音变叫做推链。相反，如果这个语音成分变成和语音系统中任何一个语音成分都不相同的新形式，它就有可能吸引语音系统中的某一语音成分来填补自己变化后留下的空缺，使它变得和自己原来的形式相同，进而再引发连锁反应。这种因吸引而引发的音变叫做拉链。由此可见，链移也是语音系统性制约下的产物。

汉语方言中推链式音变并不多见。现在以吴方言、老湘语和徽州方言中蟹(一二等)假果遇等摄字的韵母为例。它们早期的音值可能和今北京话的 ai、a、o、u 等相近。由于蟹摄一二等字的韵母在上述方言中单化成 a，这个单元音 a 进入假果遇摄韵母的单元音行列，就可能产生推挤的作用，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元音变化，造成各种长度的链移。以下列方言为例：

太(蟹)　巴(假)　破多(果)　铺都(遇)

| | | | | |
|---|---|---|---|---|
| 北京 | ai | a | o | u |
| 太平 | a | ɔ | o | u |
| 绍兴 | a | o | o | u |
| 双峰 | a | o | ʊ | u(əu) |
| 上海 | a | o | u | u |
| 苏州 | ɒ | o | u(əu) | u(əu) |

如上表所示，北京话蟹摄一二等字韵母仍然是复元音，因此不存在推链式音变，可以作为其他音变方言的参照。表中其他方言蟹摄一二等字韵母都单化成了低元音 a(ɒ)，这就对假摄字的韵母构成压力，迫使它的舌位高化。安徽太平话假摄字韵母元音因此变成ɔ，但链移到这里就停止。绍兴话假摄字韵母元音则继续高化，和果摄字韵母 o 合流，链移到这里也停止。双峰话假摄字韵母推动果摄字韵母音变成 ʊ，果摄字韵母又推动遇摄字中舌尖音声母字韵母由 u 变成复元音 əu，链移进行到了终点，同时又保持了各摄韵母间的区别，是音变进行得最完满的。上海话假摄字韵母则推动果摄字韵母元音高化，使它和遇摄字韵母 u 合流。苏州话假摄字韵母推动果摄字韵母和遇摄字韵母合流成 u 后，还使其中舌尖音声母字韵母都变成复元音 əu。在这里，上海、苏州方言假摄字韵母表现出了巨大的推动力。以上各方言音变中的低元音高化和高元音复化，离开链移，将是难以找到音变条件的。

拉链式音变目前所见更少。现在以闽方言海南文昌话声母的变化为例：

| | 保 | 地 | 苏 | 祖 | 醋 |
|---|---|---|---|---|---|
| 厦门 | ʿpo | tiʾ | ꜀sɔ | ʿtsɔ | ts'ɔʾ |
| 文昌 | ʿɓo | ɗi$^{2}$ | ꜀tou | ʿtou | souʾ |

表中以厦门话和文昌话相比较。两方言例字的声母不同，其中厦门话声母的音值可以代表文昌话早期的情况。文昌话声母音变的动力来自原清塞音声母 p、t。p、t 首先变成吸气音 ɓ、ɗ，这是当地

非汉语的临高话等影响的结果。然后 t 留下的空缺吸引了原 s、ts 声母(在以 a、o、u 为韵腹元音的开合口韵母前)再变成 t，再以后声母 s 留下的空格又吸引原 ts‘ 声母变成 s。这样，链移先后经历按如下顺序进行的三个阶段，得以完成：

① p、t → ɓ、ɗ

② s、ts → t

③ ts‘ → s

以上声母中辅音超越集合关系的变化，不从链移着眼，也是难以说明的。

5. **类推**

类推是指某个语音成分自身并没有发生音变的条件，只因为原来同组的声母、韵母或声调发生了变化，就随着也发生了变化。以北京话见系开口二等见溪晓母字和影母字声母为例：

| 家(见) | 掐(溪) | 虾(晓) | 鸦(影) |
| --- | --- | --- | --- |
| ꜀tɕia | ꜀tɕ‘ia | ꜀ɕia | ꜀ia |

见溪晓母字“家掐虾”的舌根音声母 k、k‘、x 在开口二等韵前元音的影响下腭化成舌面前音 tɕ、tɕ‘、ɕ，同时韵母也因为声母舌面前音的影响衍生出一个前高元音 i 作为介音，声母韵母的音变同步完成(“掐”字还经历了入声韵韵尾脱落的过程)。这样的音变在音理上是容易说明的。但影母字“鸦”并没有同样的声母作为语音条件，韵母却也由开口韵变成了齐齿韵。根据近人的研究，在见系开口二等字声母腭化的元明时期，影母字音节已经不再有 ʔ 声母，而是以纯元音起头，其中三四等字已经和喻母字合流。也就是说，影母已经不存在引起可能腭化的语音基础了。这就很难解释“鸦”字韵母的低元音 a 为什么会变为 ia。可以设想，“鸦”和“家掐虾”的韵母本来同组，在“家掐虾”等字的韵母变成 ia 以后，为了保持同韵，“鸦”的韵母随着也变成了 ia。这种音变应该是类推的结果。

类推也有由词义相关引起的。例如方言中的人称代词：

| | 我 | 你 | 佢 |
| --- | --- | --- | --- |
| 广州 | ꜅ŋɔ | ꜅nei | ꜅k'øy |
| 梅县 | ꜁ŋai | ꜁n̩ | ꜁ki |

人称代词上声字“我”、“你”和平声字“佢”在上述两个方言中变得声调相同。广州话的“佢”受“我”、“你”的影响变成阳上调，梅县话的“我(𠊎)”、“你”受“佢”的影响变成阳平调，都是类推的结果。不过这种因词义的影响而发生的类推只能作用于个别字音，不能影响到整个音类，因此在音变中的作用不大。

综上所述，语音变化的系统性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们在语音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一般说，平行发展、类推使语音系统得以保持原有的基本格局，分化、合流、整化使语音系统简化或繁化，链移则常常造成语音系统中的特色。通过这些不同的音变方式，方言语音在长期演变后可以和原来大不相同。但不管变化怎样，由于音变的规律性，古今汉语语音之间总是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二十至二十三章)，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陈昌仪：《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

房德里耶斯：《语言》(第一编第二章)，岑麒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
合肥师范学院:《安徽方言概况》,1962。(内部发行)
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江　灏:《长沙方言去声字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81.2。
李济源等:《湖南娄底方言的同音字汇》,《方言》1987.3。
萨丕尔:《语言论》(第八章),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编),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
王士元:《学术报告(二):语言的演变》,《语言学论丛》(第十一辑),商务印书馆,1983。
徐通锵:《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四):王士元教授谈语言的变异和语言的发展》,《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商务印书馆,1984。
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1928;科学出版社,1956。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同音字典》,商务印书馆,19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

# 二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音变化

社会生活的种种要求促使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交往，由此产生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使不同方言相互影响，引起方言中包括语音在内的各方面的变化。由此看来，方言的语音变化，除第一章所述由方言自身演变引起以外，还可以由异方言的影响引起。也就是说，方言的语音变化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第一章所述原发性的音变，一种是由语言接触引发的音变。前一种音变是纵向的，即音类早期形式向近期形式的演变，后一种音变是横向的，即这一方言的语音形式向另一方言语音形式的转变。这后一种语音变化在形成汉语方言语音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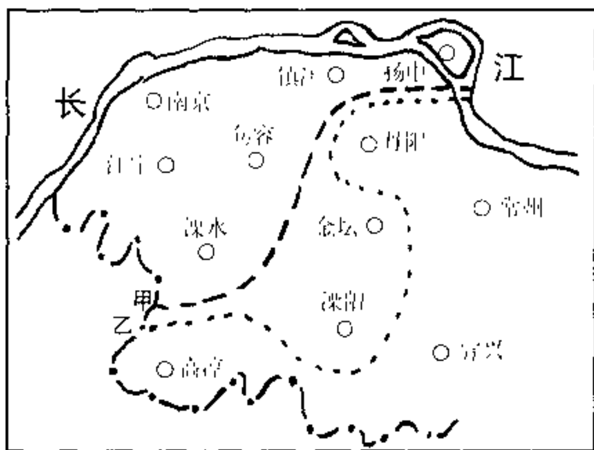
方言接触中，有因语音因素的进入引发的语音变化，也有因借入词语引发的语音变化，二者的表现方式不同。下面分别介绍。

## （一）以语音因素为接触内容的语音变化

由于受异方言语音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语音变化，这是方言中常见的情况。异方言的语音因素通常以音类的形式进入，成为这一方言语音系统的组成部分。如果接触中两个方言强弱对比的情况不同，引发的变化也会有程度上的差异。情况可以分下列三种。

### 1. 对等方言间接触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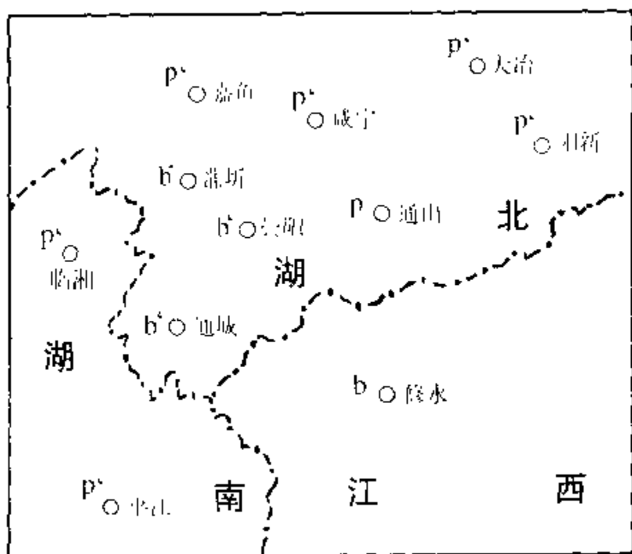
两个强弱相类的对等方言相互影响，引起方言中个别音类的变化。这一类语音变化常见于方言交界地区。方言的分界，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方言众多的语音特点都只分布在边界线的自己一边，所有方言同言线都重合在一起。不过这种现象非常少见。由于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常见的现象是同言线的参差分布。以长江南岸吴方言和江淮官话的交界地区为例：




如上图所示，同言线甲（以虚线- -表示）以东的方言保持古浊声母的浊音音值，线以西的方言古浊声母清化。这反映了吴方言和江淮官话各自的基本特点。如"台"，丹阳꜁dæ，句容꜁t'ɛ。又同言线乙（以点线……表示）以东的方言区别声母 n 和 l，线以西的方言 n、l 不分。这也反映了两个方言各自的基本特点。如丹阳"难"꜁næ≠"兰"꜁læ，句容"难"꜁na＝"兰"。但问题是同言线甲和同言线乙不完全重合。比如吴方言区金坛（城区）、溧阳两方言虽然保持古浊声母的浊音音值，但也不分 n、l 声母。如溧阳"台"꜁dæᴇ，"难"꜁lᴀ＝"兰"。保持古浊声母音值说明它们是吴方言，但在 n、l 不分这点上它们又反映了江淮官话的特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方

言各语音特点分布范围大小的不同。如果把这种分布看成是语言波的扩散，那么这种语言波扩散的距离会因语言接触中的情况而有不同。比如江淮官话 n、l 不分这一语音特点的波浪就扩散得比较远，它超出了方言区边界，向吴方言区推进，复盖而扩及到了金坛和溧阳。

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交界地区赣方言和湘方言的分界情况更为复杂。如下图所示：




三省交界地区的方言多数属于赣方言，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咸宁、大冶等大多数方言清化送气，以 p' 表示。但少数方言有所不同。如蒲圻、崇阳（白霓）、通城三方言是 b'，修水（白岭）话是 b，通山（城区）话是 p。这就使它们的归属显得难以判断。现在以"盘"（浊平）、"伴"（浊仄）、"潘"（次清）、"般"（全清）等字为例，把咸宁、蒲圻、修水、通山等四个方言和南昌（赣方言）、双峰（老湘语）、长沙（新湘语）等方言比较如下：

| | 盘 | 伴 | 潘 | 般 |
|---|---|---|---|---|
| 南昌 | ꜁pʻɔn | pʻɔn꜄ | ꜀pʻɔn | ꜀pɔn |
| 双峰 | ꜁bæ̃ | bæ̃꜄ | ꜀pʻæ̃ | ꜀pæ̃ |
| 长沙 | ꜁põ | põ꜄ | ꜀pʻõ | ꜀põ |
| 咸宁 | ꜁pʻoŋ | pʻoŋ꜄ | ꜀pʻoŋ | ꜀poŋ |
| 蒲圻 | ꜁bʻɛn | bʻɛn꜄ | ꜀bʻɛn | ꜀pɛn |
| 修水 | ꜁bɔn | bɔn꜄ | ꜀bɔn | ꜀pɔn |
| 通山 | ꜁pœ̃ | pœ̃꜄ | ꜀pʻœ̃ | ꜀pœ̃ |

上列例字中，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咸宁话是送气清音，和赣方言的南昌话相同。而蒲圻、崇阳、通城三方言是送气浊音；修水话是不送气浊音，和双峰话相同；通山话是不送气清音，和长沙话相同。从古浊声母的音值看，似乎蒲圻、崇阳、通城、修水等方言应该归属老湘语，通山话应该归属新湘语。

不过音类的演变不仅牵涉到音值，还牵涉到和其他音类的关系。因此，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要从几个方面去观察，即清浊，送气不送气，和次清声母的分合。赣方言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除清化送气外，和次清声母（如“潘”）合流也是一个重要的特点。湘方言则不存在这一特点。蒲圻、崇阳、通城、修水等方言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和次清声母的合流，说明它们应该归属赣方言。不过合流后的声母是浊音而不是清音。根据汉语语音历史演变的一般情况，古清浊声母的合流是浊音清化而不是清音浊化的结果。赣方言区绝大多数方言古浊声母清化，符合这一情况。而且从调值看，四个方言各调次清字调值大多和全清字相同，而不同于全浊字。其中修水话去声入声次清字调值虽然不同于全清字，也仍然不同于全浊字。如下表：

| | 平 | | | 上 | | | 去 | | | 入 | | |
|---|---|---|---|---|---|---|---|---|---|---|---|---|
| | 全清 | 次清 | 全浊 | 全清 | 次清 | 全浊 | 全清 | 次清 | 全浊 | 全清 | 次清 | 全浊 |
| 蒲圻 | 44 | 44 | 24 | 31 | 31 | 33 | 213 | 213 | 33 | 5 | 5 | 24 |
| 崇阳 | 223 | 223 | 21 | 42 | 42 | 33 | 214 | 214 | 33 | 45 | 45 | 45 |
| 通城 | 112 | 112 | 33 | 42 | 42 | 45 | 24 | 24 | 45 | 5 | 5 | 5 |
| 修水 | 44 | 44 | 33 | 31 | 31 | 22 | 55 | 34 | 22 | 4 | 24 | 2 |

因此可以说，在四声八调时期，赣方言的次清声母没有并入过全浊声母。可以假设，蒲圻、崇阳、通城、修水等方言的浊声母应该是古浊声母清化后又浊化的结果。其中蒲圻、崇阳、通城三方言声母浊音送气，是由于送气浊声母清化，和次清声母合流，然后合流以后的声母由于某种发音机制的作用而再浊化。(这种情况在赣方言区的江西都昌话也同样存在)音变过程如下：

p‘ → p‘ → b‘
b‘ ↗

修水话声母浊音不送气，则可以假设是上述清音浊化后又发生了送气成分的脱落。这可能和送气清音浊化后，在和不送气清音的对立(b‘:p)中送气成分变成羡余成分有关。音变过程如下：

p‘ → p‘ → b‘ → b
b‘ ↗

以上假设是唯一可行的。因为如果相反认为以上方言不属于赣方言而属于湘方言，那么音变过程将必需假设如下：

b → b → b‘
p‘ ↗

即先是次清声母和不送气浊音合流，然后再由不送气音(修水)变为送气音(蒲圻、崇阳、通城)。但湘方言不存在清音浊化(p‘ → b‘

或 pʻ → b)的音变，个别方言(如新化、冷水江)中浊音送气化(b → bʻ)的音变也和次清声母无关，因此可以说，上述过程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尽管这样，修水话浊化后的声母变为不送气音，却不能排除可能有湘方言浊声母不送气特点的影响。

至于通山(城区)话古浊声母清化后不送气，不和次清声母合流而和全清声母(如“般”)合流，应该是反映了新湘语的特点。考虑到通山不在湘赣两方言的分界线上，可以假设，这是湘方言(新湘语)浊声母清化不送气这一特点的分布越过方言分界线向东推进，又被赣方言特点所复盖，但最后保留在通山中心地区(包括城区)的结果。虽然通山(城区)话目前仍然划归赣方言，但那应该是综合了全部语音特点考虑后的结果。

**2. 强弱方言间接触的影响**

外来语音因素进入方言以后也可能产生新的音类。这种结果多见于力量对比悬殊的方言相互接触的情况。以四川中江县永兴话为例。永兴话是明清之际湘方言区移民的后代所说的方言，是被称为“老湖广话”的众多湘方言岛之一。它处在强大的官话方言包围中已经三百年左右，但至今仍然保留了湘方言的许多重要特点，其中包括古浊声母的浊音音值。永兴话目前常用的浊声母字有330个以上。但这些字中的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湘方言只有不送气一套，永兴话却有送气不送气两套：b、d、g、dz、dʐ、dʑ 和 bʻ、dʻ、gʻ、dzʻ、dʐʻ、dʑʻ，彼此对立。如“贼”꜀dzuei≠垂꜀dzʻuei。下面以 b、bʻ 声母字为例：

b：꜀bi 鼻脾皮避匹　bu꜆部步簿捕　꜀be 白　꜀bo 薄婆

꜀bai 牌排　bai꜆败稗　bei꜆倍　bau꜆抱豹　bian꜆便

ban꜆伴拌办扮　bən꜆笨　bin꜆病　baŋ꜆棒

bʻ：꜀bʻu 葡　꜀bʻa 拔跋扒　꜀bʻie 劈　꜀bʻei 培陪赔　꜀bʻiau

瓢嫖　꜀bʻan 盘　꜀bʻian 便　꜀bʻən 盆彭膨　꜀bʻaŋ 旁

꜀bʻin 贫频瓶屏平萍坪评凭　꜀bʻoŋ 朋棚蓬篷

以上例字除个别字(如"匹豹扮劈")外,都属古浊声母字。其中不送气浊塞音塞擦音兼有古浊声母各调类的字,可以出现在阳平调和去声调,送气浊塞音塞擦音则限于古浊平字和个别浊入字,只出现在阳平调。从调类的分派来看,送气浊音是受声调影响后来新出现的。但湘方言中并不存在和不送气浊塞音塞擦音并存的送气浊塞音塞擦音,那么永兴话的这种送气声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把西南官话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分解成清化、平声送气和仄声不送气几个方面来观察,那就能发现,正是其中平声送气这一项音变影响了永兴话,使永兴话古浊平字中的绝大部分(172字)塞音塞擦音声母由不送气音变成了送气音(另有29字的声母没有送气化)。也就是说,永兴话尽管浊声母还没有清化,却发生了平声送气的变化。由此可见,永兴话送气的浊塞音塞擦音是在西南官话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只是这一送气浊音不是从西南官话中作为音类整体进入的。它是西南官话中送气这一区别性特征进入永兴话,和永兴话平声字的浊音结合而成的新音类。这种外来语音因素以小于音类的区别性特征的形式进入一个方言造成新的音类,只有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方言相接触时才会产生。

**3. 双语间的渗透**

方言中外来语音因素进入的程度之深,涉及面之广,恐怕要以多语区为最了。多语区的居民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同时使用几种不同的话,这几种话的语音系统就很容易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比如湖南南部一些地方的居民使用两种话,对外地人使用西南官话,对本地人使用一种目前还不清楚系属的土话。其中某些方言两种话的声韵调有很大差别。例如江永话官话(原永明城关官话,1935年记录)的声韵调:

声母: p p' m f
t t' n l
ts ts' s

tɕ tɕʻ ȵ ɕ

k kʻ ŋ h

ø

韵母: ɿ a o ɤ ai au əu aŋ əŋ oŋ

i ia io ie iau iəu iẽ iaŋ iŋ ioŋ

u ua uɤ uai uəi uaŋ uəŋ

y ye yẽ yiŋ

声调: 阴平 33 阳平 31 上声 55 去声 25 入声 22

土话(1986 年记录,韵母作了调整)的声韵调:

声母: p pʻ m f v

t tʻ n l

ts tsʻ s

tɕ tɕʻ ȵ ɕ

k kʻ ŋ h

ø

韵母: a ø ə ɯ ai au ou əɯ aŋ əŋ oŋ ŋ̍

i ie iau iou iu iaŋ iŋ ioŋ

u ua uø uə uɯ uai uəɯ uaŋ

y ya yø yə yai yu yəɯ yaŋ yŋ

声调: 阴平 44 阴上 35 阴去 21 入声 5

阳平 42 阳上 13 阳去 33

两种话的声母基本相同,韵母和声调则不仅数量差别很大,而且韵母类型、元音音值、调类分派和调值也很不同,显然属于不同的方言系统。

但是邻近的临武话却是另一种情况。临武话(1987 年记录)官话和土话的声韵调差别要小得多。例如官话的声韵调:

声母: p pʻ m f

t tʻ n l

ts ts' s

tɕ tɕ' ȵ ɕ

k k' ŋ x

ø

韵母：ɿ a e o ɔ ai ei au ou aŋ eŋ oŋ

i ia ie io iau iou iaŋ iŋ ioŋ

u ua ue uai uəi uaŋ ueŋ

y ye yaŋ yeŋ

声调：阴平 33 阳平 11 上声 53 去声 35

土话的声韵调：

声母：p p' m f

t t' n l

ts ts' s

tɕ tɕ' ȵ ɕ

k k' ŋ x

ø

韵母：a e o ə ai au ou ã aŋ eŋ oŋ ŋ̍

i ia ie io iai iou ĩ iaŋ iŋ ioŋ

u ua ue uai uei ũ uã uaŋ ueŋ

y ye ỹ

声调：阴平 33 阳平 13 上声 55 去声 11 入声 53

两种话的声母完全相同，韵母和声调数量差别很小，韵母类别、元音音值、调类分派和调值的差别也不大，语音系统非常近似。下面再把临武话官话和土话的韵母和声调综合在一起：

韵母：ɿ̣ a e o ə ai ẹi au ou ḁ̃ aŋ eŋ oŋ ŋ̥

i ia ie io iḁi iạu iou ĩ̥ iaŋ iŋ ioŋ

u ua ue uai uei ũ̥ uḁ̃ uaŋ ueŋ

| | y | ye | | | | ỹ | yaŋ | yeŋ |
|---|---|---|---|---|---|---|---|---|
| 声调： | | 33 | 11 | 13 | 55 | 53 | 35 | |
| | 官话 | ꜀波 | ꜁剥 | | | ʿ拨 | 簸ʾ | |
| | 土话 | ꜀巴 | 罢ʾ | ꜁爬 | ʿ靶 | 刹꜄ | | |

从上表可见，临武话韵母中官话特有的(下加黑点表示)有5个，土话特有的(下加圆圈表示)有7个，官话和土话共有的有27个，共有的占了绝大部分。声调中官话特有的有1个，土话特有的有2个，官话和土话共有的有3个，共有的也占了多数。大量音值相同的声韵调组成音值相同的音节，使官话和土话在语音面貌上渐趋相同。但是从江永话的情况推断，早期临武话的官话和土话应该也是有很大差别的。看来临武话的官话和土话是在长期的共同使用中相互渗透，相互适应，相互调整，有差别的音类日渐减少，音值相同的音类日渐增多，最终使两个语音系统变得面貌相近的。这无疑和人们希望在双语使用中减少发音上和记忆上的双重负担有关。

不过临武话官话和土话语音系统的趋同，总的来说并没有导致字音的趋同。官话和土话因此存在同字不同音，同音不同字的奇特现象。例如：

| | o | a | ai | ou | u |
|---|---|---|---|---|---|
| 官话 | ꜀蓑 | ꜀沙 | ꜀筛 | ꜀馊 | ꜀苏 |
| 土话 | ꜀沙 | ꜀筛 | ꜀馊 | ꜀苏 | |

上表中例字的声母都是s，但同字不同音，同音(上下行)不同字。这说明语言间的语音渗透和语言间的替代或同化是不相同的，前者造成相同的音节，后者造成相同的字音。

湘南地区方言中官话和土话语音系统的接近，还有一个谁向谁靠拢的问题。临武话的官话和江永话的官话相当接近，临武话的土话和官话也相当接近，江永话的官话和土话则存在很大差别。从这一情况推断，临武话官话土话音系的接近，应当主要是土话的

变化，即土话向官话靠拢的结果。这应该和两种话在社会交际方面作用的大小有关。因为湘南各地官话大致相同，可以通用，土话则差异颇大，交际困难，官话的交际作用显然比土话要大得多。相对来说，官话具有强势，土话处于弱势，弱势的土话不得不接受强势的官话的渗透，发生巨大的变化，终于在语音上越来越接近官话。

## （二）以词汇因素为接触内容的语音变化

不同方言区人们的交往有时导致异方言词语的借入。这样，异方言的读音就随着所借词语而进入。这种外来读音即使折合成相近的本方言读音，人们仍然会感到它的不同，把它看成是异读。以北京话从南方引进的“芥（盖）菜”kai˥ ts‘ai˥ 读音为例。“芥”作为见母开口二等字，声母本来早已完成了历史音变，成为腭化音 tɕ。“芥（盖）菜”中的“芥”目前仍然读作 k 声母，完全是因为这一词语是从见系开口二等字声母还没有完成腭化的南方方言借入的缘故。这个 k 不符合北京话的语音规律，“芥”音 kai˥因此成为异读。

语言接触中，一个方言从具有权威性的某方言——地区性的权威方言或全国性的权威方言——借入词语，常常不是个别的，而是成批的。这就使异读大量进入方言，构成异音类。异音类和方言原有的音类具有对应关系。异音类涉及的字音越多，对应就越明显。方言中由于借入的词语起初大多用在较为正式的交际场合，和本方言的口语词有不同的风格，因此异音类就被看成读书音，方言中原有的音类相对成为口语音，读书音和口语音构成文白异读。例如陕西汉阴、宁陕、安康、紫阳、岚皋等地湘方言岛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平声字的文白异读，表现为声母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别。如汉阴湘语：

朋 ꜀p'uŋ文 ꜀puŋ白　茶 ꜀ts'a文 ꜀tsa白

口语音古浊声母清化不送气，保持了湘方言浊声母原有不送气的特点，是方言的原音类。读书音古浊声母清化送气，是随着借入的西南官话词语进入的异音类。清化不送气的音类和清化送气的音类作为口语音和读书音相对应。如果读书音最后取代了口语音，这些湘方言岛的古浊声母平声字就完成了由不送气音向送气音的转化。这种由借词带入的异音类引起方言语音的变化，和前述四川境内"老湖广话"的方式不同，但最终结果将是相同的。

随着借词的进入而发生的语音变化在方式和过程方面表现出多种特点。下面分别叙述。

**1. 进入方言内部的不是借词而是音类**

由于读书音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词语进入方言的，有一种意见认为汉语方言中不存在文白异读，只存在借词。罗杰瑞就把文白异读叫做"又读"，认为读书音是"外来的借词"，口语音是"方言固有的"，二者是同源词。罗杰瑞认为汉语方言中的读书音和英语中的古诺斯语(Old Norse)借词相同。例如英语词 shirt(衬衫)和相对应的借词 skirt(裙子)，二者同源，都来自古日尔曼语。这样，汉语方言中来自同源权威方言的读书音，也被看成了借词。

汉语方言从异方言借入的，从现象上看，的确是一个个的词语，和英语中的情况相似。但二者实际上是不同的。借词应该是完整的词语，有完整的音节。但进入汉语方言音系的其实并不是异方言音节中的声韵调整体，而只是其中的某音类。只不过音类小于音节，它被包含在音节，即具体的语素中，不被单独指称。在上述汉阴等方言浊平字"朋"、"茶"等借入的读书音，就不是完整的音节꜀p'uŋ和꜀ts'a，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音类，即声母 p'和 ts'。

借入的是音类而不是音节，不是字音整体，这一点是人们在语感上非常明确的。章太炎早在一百年前的《新方言》(1908 年)中就说过："盖有通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所说

“用唐韵”，就是从音类的异同上着眼的。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 年)中也说：“在中国好些方言中，有的字读书或‘咬文’时是一种念法，说话时又是一种念法”，分别称它们“文言音”和“白话音”。所说“念法”，也不是指整个的音节，而是指其中的某个音类。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 年)还从“字音”(读书音)和“话音”(口语音)转变的角度观察二者间的关系，所说的“转变”就是音类间的对应。当然，就某些方言来看，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读书音和口语音使用场合的界限可能会逐渐变得模糊，文白的名称会变得名不符实，但对应总是存在的。

汉语方言从异方言借入的不是完整的词语或音节，而是音类，这一点还可以从读书音音节中声韵调的组成来说明：

(1)在借入的词语中，音节内声韵调只有一部分来自异方言，其他部分仍然是本方言的音类。例如太原话：

药 yəʔ꜃文　ieʔ꜃白

“药”字读书音中只有撮口介音是借入的(这和权威方言的早期读音 yo 或 yo 有关)，韵母、声调仍然是本方言的(权威方言早已不存在塞音尾韵和入声调)。这种情况见于汉语方言大多数文白异读中的读书音。

(2)借入词语中的音类可以和方言中原有的音类组合成音节，通常按文白层次组合，但也可以不受层次的限制。例如厦门话：

行 ꜁hɪŋ 文　꜁kĩã 白

知 tiʾ文　꜀ti 文　꜀tsai 白

“行”字声母中 h 属文读层，k 属白读层，韵母中 ɪŋ 属文读层，ĩã 属白读层，字音꜁hɪŋ 是声文韵文，꜁kĩã 是声白韵白，文白读音的音类都按文白层次相配合。“知”字声母中 ts 属文读层，t 属白读层，韵母中 i 属文读层，ai 属白读层，但字音 tiʾ和꜀ti 是声白韵文，꜀tsai 是声文韵白，三个字音中的音类都不按文白的层次配合。“知”的三个读音，没有一个可能是本方言原有的，也没有一个可能是由异方

言整体借入的，而只可能是借入的音类和本方言的音类组合的结果。这说明异方言词语的读音实际上是分解成音类才进入方言音系的。

(3)借入词语的读音还可能在方言中引起音类的类推。例如上海话假摄开口二等字“把沙渣拿”等韵母读书音是 a，口语音是 o，读书音音类是由权威方言（官话）借入的。但果摄开口一等字“娑”꜀sa文，꜀so白，“挪”꜀na文，꜀no白，其中的读书音韵母 a 却不可能是由权威方言借入的，因为权威方言中并没有这样的读音。实际上它们是在上海话里制造出来的，即“娑”字按声旁“沙”（假摄）在权威方言中的读音和上海话中的读书音类推出读书音韵母 a，“挪”字按声旁“那”（果摄）在权威方言中的读音也类推出读书音韵母 a。当然，“娑”、“挪”的读书音都是误读。但正因为是误读，就更能说明异方言借入的不是词语而是音类，因为只有音类才是可以类推的，而只有类推才有可能出错。

2. **借入的音类和原有音类构成叠置**

异方言音类随着词语进入以后，成为方言音系中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不可或缺。这和本章前一节所述语言接触中异方言语音因素引起的变化不同。因为方言中还存在着原音类，进入的异音类和相对的原音类在方言中成为重复存在。它们形成一种叠置的关系，彼此相对于对方都是另一个层次。

文白异读层次的叠置具有下列几种特点：

(1)普遍性，即一个字几个读音是文白异读，一个字一个读音也可能有读书音和口语音的不同。例如太原南郊话梗摄开口三等字：

| 明 | 皿 | 命 |
|---|---|---|
| ꜀miŋ文 ꜀mi白 | ꜂miŋ | miŋ꜄文 mi꜄白 |

梗摄开口三等舒声字韵母读书音 iŋ，口语音 i。上述例字中“明”、“命”韵母文白两读；“皿”虽然只有一读，但从韵母看应该是读书

音。又如南昌话鱼韵字：

居　　　　锯　　　　去

꜀tɕy　　tɕy꜄文 kiɛ꜄白　　꜂tɕʻiɛ

鱼韵字韵母读书音 y，口语音 iɛ。上述例字中，“锯”字文白两读；“居”、“去”虽然都只有一读，但从韵母看，“居”应该是读书音，“去”应该是口语音。

一个字一音不能既不是读书音，也不是口语音，但有可能是读书音和口语音的重合，如果异音类和原音类的语音形式相同的话。以山东荣成话为例：

盘꜁pʻan文꜁pan白　伴 pan꜄　办 pan꜄　拔꜁pa

平声字“盘”声母文白两读，仄声字“伴办拔”声母则是读书音和口语音的重合。

(2)多重性，即文白异读的层次可以有多个，并不限于两读。例如厦门话：

糊 ꜁hɔ文 ꜁kʻɔ白 ꜁kɔ白

暴 po꜄文 pɔk꜇文 pauʔ꜇白

前꜁tsiɛn文 ꜁tsɪŋ白 ꜁tsun白 ꜁tsãĩ白

盘꜁pʻuan文 ꜁puan文 ꜁pʻũã白 ꜁pũã白

平꜁pɪŋ文 ꜁pʻĩã白 ꜁pĩã白 ꜁pʻĩ白 ꜁pĩ白

造成这种多个文白异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几个异音类可能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区进入的，因此形成了多个层次。其次，如前文所述，异音类和方言的原音类可以不按文白层次而任意组合，从而造成多个字音。

(3)复杂性，即文白异读中层次和音值的关系不一定是单一的，固定的。也就是说，同一层次的音类固然音值相同，音值相同的音类却不一定属于同一层次。例如苏州话果摄开口一等字韵母的音值：

多拖　　əu文 ɒ白

驼搓哥　ɔu

他哪那　ɒ

大　　　ɒ文　əu白

左　　　ɔu文　i白

上述各字共有七种韵母：əu文、əu白、ɔu、ɒ文、ɒ白、ɒ、i白。其中 əu文、əu白、ɔu 属于同一层次。它在"多拖"和"左"字中相对于口语音韵母 ɒ、i 成为读书音韵母，在"大"字中因为受新读书音韵母 ɒ 的排挤而成为口语音韵母，在"驼搓哥"中没有新读书音的排挤和旧口语音的支撑而独自存在，虽然性质上仍然是读书音。但 ɒ文、ɒ白、ɒ 不都属于同一层次。它在"多拖"中是旧有的口语音韵母，在"大"字中则是新起的读书音韵母，和"他哪那"相同。所以 ɒ白 和 ɒ文、ɒ 音值虽然相同，却应该分属时间前后相去甚远的两个层次。文白读音的这种复杂关系常常造成假象，增加音类层次分析时的困难。

**3. 文白读音在语音变化过程中的竞争**

方言中由于规范的需要，文白读音处在竞争之中。如果读书音音类的使用日渐普遍，口语音音类的使用日见减少，并最后归于消失，音类就完成了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过程和第一章所述离散式音变的演变过程表现相似。但转化过程中文白异读间的关系和演变过程中新旧语音形式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下面分别叙述。

(1)文读音在竞争过程中的取代

第一章曾经提到，上海话"老①"口音"雷来兰"三字韵母 e、ᴇ、ɛ 在青年人口音中合流为 ᴇ。这是方言自身发生的演变，结果是方言中新的语音形式(ᴇ)继承了旧的语音形式(e、ɛ)。但文白读音在语音变化的过程中，读书音对于口语音不是继承，而是取代。例如杭州话日母字声母绝大多数是 z，如"日"zəʔ₂。从杭州话个别日母字的残余形式(如"软"ʽȵyõ)来看，日母字本来都有口语音声母 ȵ，只是这一口语音的音类在竞争过程中已经基本上被读书音音类 z

所取代。这种取代并不是方言自身演变的结果。杭州话中泥疑母字的声母 ȵ 就不发生这种性质的变化,没有被声母 z 取代。

由于方言自身演变中新旧两种语音形式的交替是一种继承的关系,因此旧语音形式变成新语音形式总是可以由发音机制加以说明的。在变化的音链上,旧的语音形式总是处在上面的一环,新的语音形式总是处在下面的一环。比如北京话"嫩"的 nuən⊃、nən⊃ 两读,前一读音是旧语音形式,后一读音是新语音形式,nən⊃是由 nuən⊃演变而成的,原因是音节中作为介音的后元音 u 在舌位偏前的声母 n 和韵尾 n 的共同影响下趋于失落。它们在音链上的位置不能倒置,因为要假设 nən⊃产生一个 u 介音变成 nuən⊃,并没有任何音理上的根据。

但是文白异读的读书音和口语音由于是异音类和方言原音类的叠置,它们所反映的只能是两个方言间的关系。因此,读书音和口语音在音链上的位置,要由两个方言相对应音类各自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速度的快慢来决定。如果异方言的音类发展比较快,读书音就处在音链的下环,如果方言原音类的发展比较快,口语音就处在音链的下环。例如上海话:

肥 ꜀vi 文　꜀bi 白

读书音声母 v 是权威方言声母 f 的折合音。从历史演变规律看,轻唇音是由重唇音演变来的,权威方言演变比较快,因此读书音处在音链的下环。但如双峰话:

口 ᶜk'e 文　ᶜtɕ'ie 白

读书音未腭化的声母 k'是从权威方言借入的。从舌根音声母的演变规律来看,双峰话舌根音声母在前元音前面完成了腭化,口语音声母显然是后起的,所以处在音链的下环。如果读书音声母 k'今后取代了口语音声母 tɕ',将不可能用音理来说明。

(2)文白读音竞争的一般过程

文白读音中读书音和口语音的竞争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因

为读书音随着词语进入方言，在最初的使用中虽然有严格的词汇条件，但按照规范的要求必然要扩大它的使用范围。所以读书音和口语音之间的音变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争夺词语使用范围的竞争。就读书音来说，竞争是要突破词汇条件的限制，把使用范围扩大到整个口语领域；就口语音来说，则是要坚持不从原有的使用范围退出。

文白读音的竞争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文弱白强，②文白相持，③文强白弱。徐通锵、王洪君曾经以山西闻喜话为例描述过这一过程的进行。第一阶段中，读书音受词汇条件的严格限制，老年人口音章组麻韵"遮者蔗车扯蛇射麝奢赊捨赦舍佘社"等15字韵母都读作 iɛ，只有一个"社"字在"社会主义"一词中韵母可以读作 ə。第二阶段中，读书音已经和口语音在使用范围上大致相当，如年轻人口音"遮蛇社射麝扯捨舍"等字韵母读作 ə，"蔗车佘"等字韵母 ə、iɛ 两读，"奢赊"二字韵母读作 iɛ。第三阶段中口语音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并且受到词汇条件的严格限制，情况和第一阶段中的读书音相似，如宕摄字"娘"꜁niʌŋ$_{文}$꜁niə$_{白}$，口语音只用于指祖母、"阳"꜁iʌŋ$_{文}$꜁iə$_{白}$，口语音只用于地名"下阳村"。

由此看来，文白读音竞争的过程，一般以口语音为零告终。在竞争的最后阶段，个别口语音音类可能据守在人名地名中。如上例闻喜话"娘"、"阳"。再如苏州话"唯"꜁vi$_{文}$꜁ji$_{白}$，口语音只用于地名"唯亭"，厦门话"陈"tin$^{2}$$_{文}$ tan$^{2}$$_{白}$，口语音只用于姓氏。也有的口语音失去了和字形的联系。如西安话"耕"꜀kəŋ$_{文}$꜀tɕie$_{白}$，"横"꜁xuəŋ$_{文}$꜁ɕye$_{白}$，口语音꜀tɕie、꜁ɕye 已经不被当地人看成是"耕"、"横"二字的读音。这种和字形失去联系的口语音，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文白读音的竞争，有可能被看成特殊方言词语保存下去。

(3)文白读音竞争过程的逆转及其原因

文白读音的竞争是由规范的要求引起的。如果规范的要求被放弃，竞争过程就有可能停顿下来，甚至发生逆转，即读书音不但

不再取代口语音，而且本身被废弃，从而使口语音恢复原有的使用范围。这种语音变化的逆转在离散式音变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以宁波话的文白异读为例。据摩里逊（W. T. Morrison）《宁波方言字语汇解》（1876年）所记，宁波话蟹摄一二等字和假摄开口三等字如"泰戴、排牌、戒楷、借夜、怪乖"等，韵母口语音是 a、ia、ua，读书音是 ɛ、iɛ、uɛ。稍后摩伦多夫（P. G. Von Möllendoff）在《宁波方言的音节》（1901年）中说明，这些读书音"原是由来自各省的教师带到学校的，字的读音一般都是现代官话"。但是这些读书音中的大部分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不但没有取代口语音，相反却自身归于消灭。下面列出《汇解》宁波方言和现代宁波、苏州、上海等方言的若干蟹假摄字，以供比较：

| | 汇解 | 宁波 | 苏州 | 上海 |
|---|---|---|---|---|
| 摆 | pɛ 文 pa 白 | pa | pɒ | pa |
| 牌 | bɛ 文 ba 白 | ba | bɒ | ba |
| 买 | mɛ 文 ma 白 | ma | mɒ | ma |
| 太 | t'ɛ 文 t'a 白 | t'a | t'ᴇ 文 t'ɒ 白 | t'e 文 t'a 白 |
| 奶 | nɛ 文 na 白 | na | nᴇ 文 nɒ 白 | ne 文 na 白 |
| 癞 | la | la | lᴇ 文 lɒ 白 | la |
| 解 | tɕiɛ 文 ka 白 | ka | tɕiɒ 文 kɒ 白 | tɕia 文 ka 白 |
| 揩 | tɕ'iɛ 文 k'a 白 | k'a | k'ɒ | k'a |
| 外 | ɦuɛ 文 ŋa 白 | ɦua 文 ŋa 白 | ɦuᴇ 文 ŋɒ 白 | ŋa |
| 债 | tsa | tsa | tsɒ | tsa |
| 晒 | sa | sa | so | sa 文 so 白 |
| 柴 | za | za | zɒ | za |
| 借 | tsiɛ 文 tsia 白 | tɕia | tsiɒ | tɕia |
| 写 | siɛ 文 sia 白 | ɕia | siɒ | ɕia |
| 谢 | ziɛ 文 zia 白 | ʑia | ziɒ | ʑia |
| 乖 | kuɛ 文 kua 白 | kuei | kuᴇ 文 kuɒ 白 | kua |

| | | | | |
|---|---|---|---|---|
| 快 | k‘uɛ文 k‘ua白 | k‘ua | k‘uᴇ文 k‘uɒ白 | k‘ua |
| 怀 | ɦuɛ文 ɦua白 | ɦuɛ文 ɦua白 | ɦuᴇ | ɦue文 ɦua白 |

从上表看，吴方言区北部地区读书音的数量比一百年前一般都要少。有一种看法认为，宁波话《汇解》时期大部分读书音韵母ɛ、iɛ、uɛ在现代归于消失，是因为早期宁波话韵母ɛn（如"慢难"）向ɛ的演变阻断了口语音韵母a向读书音韵母ɛ转化的结果。但是异音类的进入不应当和原音类的演变相冲突，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音变化。而且退一步说，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所说的"阻断"也应该不致使已经存在的读书音韵母ɛ等消失。而且它也无法说明其他方言的情况，例如早期上海话韵母æn（如"慢难"）向现代老年口音ɛ的演变并不会阻碍口语音韵母a和读书音韵母e的叠置，因为它们的音值各不相同，但现代上海话老年口音读书音同样也很少。可见原因不在方言音系内部韵类变化的制约作用，而在其他方面。考虑到读书音的借入本来就是社会需要的结果，读书音废弃的原因就应该也在这一方面。事实是吴方言区近百年来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曾经影响借入读书音的社会需要。首先，清王朝的崩溃、地方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变了这一地区方言和官话的力量对比。其次，清末以后不再有派外省人到吴方言区教授官话这种有力的文教措施，学习官话的要求也就有所减弱。事实说明，吴方言北部地区近百年来文白读音竞争中的逆转现象，和社会情况的变化是分不开的。文白异读实质上是语用的产物，它消失的原因也是语用方面的。

## 参考文献


艾约瑟(Joseph Edkins)：A Gramme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上海方言口语语法），1853。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二十五至二十七章),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
崔荣昌、李锡梅:《四川境内的"老湖广话"》,《方言》1986.3。
董为光:《湘鄂赣三界方言的送气声母》,《语言研究》1989.2。
房德里耶斯:《语言》(第四编第四节),岑麒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何大安:《论永兴方言的送气浊声母》,《史语所集刊》第五十七本,1986。
黄雪贞:《湖南江永方言音系》,《方言》1988.3。
《江永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编写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李永明:《临武方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罗杰瑞:《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方言》1979.4。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萨丕尔:《语言论》(第九章),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章),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
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1928;科学出版社,1956。
张德新:《陕南湘语的演变趋向》,1995。(未刊)

# 三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一)

## (一)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工作

方言现象在我国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从周秦时官吏深入民间采集方言，东汉扬雄著《方言》纪录各地词语和字音，到后世有关的专著和笔记中众多而零星的记载，数千年间不绝如缕。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还没有人做过方言分区的工作。等到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已经是晚在清末民初了。不过从清末到今天的近百年间，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工作进行得却很紧凑。以下分三个阶段来叙述。

**1. 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属于汉语方言传统研究的末期，有章太炎和黎锦熙所做的方言分区。章太炎在《訄书》初刻本(1900 年)中把汉语方言分成十种，稍后在《检论》(1915 年)中又改订成九种。所述如下：

> 河之朔，暨于北塞，东傅海，直隶、山西，南得彰德、卫辉、怀庆，为一种。纽切不具，亢而鲜入，唐虞及虏之遗音也。
>
> 陕西为一种。明彻平正，甘肃肖之，不与关东同。唯开封以西却上。

汝宁、南阳，今曰河南，……及江之中，湖北、湖南、江西，为一种。武昌、汉阳尤啴缓，当宛平二言。

福建、广东各为一种。漳、泉、惠、潮又相鮒也，不足论。

开封而东，山东曹、沇、沂，至江、淮间，大略似朔方，而具四声，为一种。

江南苏州、松江、太仓、常州，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为一种。宾海下湿，而内多渠浍湖沼，故声濡弱。

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厥附属者，浙江、衢州、金华、严州，江西广信、饶州也。浙江温、处、台附属于福建，而从福宁。福建之汀，附属于江西，而从赣。……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音皆大类湖北，为一种。滇、黔则沐英以兵力略定，胁从中原，故其余波播于广西。湖南之沅州亦与贵州同音。

江宁在江南，杭州在浙江，其督抚治所，音与他府县稍异，厍晋宋尝徙都，然弗能大变也。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934 年)把汉语方言分成十二系。所述如下：

直隶、山西、东三省、山东、河南北部，为河北系。

河南中部、山西南部、江苏、安徽、淮北一带，为河南系。

陕西、甘肃、新疆，为河西系。

江苏北部与江苏西部之南京、镇江，安徽中部之安庆、芜湖，江西之九江，为江淮系。

河南南部、湖北，为江汉系。

湖南东部、湖南东南角、江西之南部，为江湖系。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北部、湖南西部，为金沙系。

苏、松、常与浙江之杭、嘉、湖，为太湖系。

浙东金、衢、严及江西东部，为浙源系。

浙江南部近海处为瓯海系。

福建为闽海系。

广东为粤海系。

章太炎、黎锦熙所做的分区，提供了各种(系)方言大致的分布地区。章太炎还对部分方言的语音特点和形成原因做了简单说明，其中有关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符合史实，方音差异由水土不同而造成的看法则出于传统，缺乏科学性。黎锦熙所分方言以江河湖海命名，也不免囿于水土之见，出发点和章太炎相同。所以他提出分区的时候虽然现代意义的方言分区工作已经开始，但他的工作就性质说仍然属于传统时期。

传统时期末期的方言分区颇嫌粗疏，原因是作者没有可能进行实地的方言调查，分区的根据基本上是见闻构成的印象。而印象常常缺乏确定性(比如章太炎原分十区中的湖南一区在改订后反而被删除)和完整性，分区中存在错漏也就在所难免。

**2.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分区工作主要是由史语所进行的。

1928年5月，傅斯年、顾颉刚等受蔡元培委托，在广州筹备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他们对传统汉语研究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和目标。他们认为，传统的汉语研究常常不以具体材料、而以古人的研究成果作为主要对象，材料来源局限在文献的范围之内，研究中不能及时运用新工具新方法，因此虽然在古代曾取得巨大的成就，在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他们强调方言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汉语将来之大成全靠各种方言的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认为研究的方法和步骤应该是“以

调查取得分类的材料、以某一种方言的细密研究认识其中各种机用，以相互的关系和古今的变迁认识其演化”(傅斯年:《所务记载：(二)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同上)。

按照这一设想，史语所从成立时起的十余年间，先后指派赵元任、丁声树、罗常培、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白涤洲等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方言调查，计有两广和海南(1928—1929年，1930年)，关中(1933年)，皖南(1934年)，江西(1935年春)，湖南(1935年秋)，湖北(1936年)，云南(1940年春)和四川(1941年秋—1946年)。此外，赵元任在1926年到史语所任职前还曾经调查了江浙的吴方言。这些实地的调查迅速扩大了人们对汉语方言的认识，为科学而准确地划分汉语方言准备了条件。

1934年起，史语所先后三次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语言区划图”中对汉语方言作了如下分区：

1934：华北官话，华南官话，吴，客，粤，闽，海南—7

1939：北方官话，上江官话，下江官话，吴，客，粤，闽，皖，潮汕—9

1948：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湘，赣，吴，客，粤，闽南，闽北，徽—11

另外，一些学者个人也提出了对分区的看法。其中重要的如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国年鉴》，1937年)中的分区：

1937：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赣客，闽，吴，湘—8

赵元任在《国语入门》(1948年)中的分区：

1948：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赣客，闽南，闽北，吴，湘—9

以上分区中，汉语各方言基本上都已经划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区也日趋准确。但各次分区中官话始终没有统一，这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人们无法对广大北方地区进行方言调查，因而情况了解不够有关。还有一些方言分合不定，如客家话和赣

方言的分合，闽南话和闽北话的分合，以及徽语是否设立，则属见仁见智。

**3.第三阶段**

1949年以后，方言分区工作进入第三阶段，期间提出过三次分区意见。第一次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在所作发言《汉语方言调查》中的分区：

1955：北方话，吴，湘，赣，客，粤，闽南，闽北—8

当时在大陆政治经济高度统一的形势要求下，制订了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三项语文政策。推广普通话首先要求对汉语方言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是汉语方言当时"还没有经过全面的调查"，所以丁声树、李荣所做的分区只是在1948年史语所分区的基础上，把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合而为一，再删去不成熟的徽语而成。可以说，丁声树、李荣的分区实际上是对史语所分区工作的一个总结。

为了取得对汉语方言更多的了解，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建议开展一次汉语方言普查。稍后在教育部和高教部的领导下，全国范围的普查工作从1956年开始进行，到1958年基本完成。两年多时间里调查了全国约2200市县中的1849个汉语方言点。这样大范围的调查提供了相当全面的方言情况，特别是广大官话方言区的情况。人们对汉语方言有了新的了解，因此可以对分区问题作更加具体和细致的考虑，对以往工作中的不足也可以有把握地加以修正。比如福建等省的调查表明，闽方言虽然可以分成多个小区，但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方言，所以闽南话和闽北话应该合并起来。这就最终消除了长期以来闽南话闽北话分合上的意见分歧。1980年，根据这一结论，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和其他一些著作就把闽南话和闽北话统一成闽方言。于是有了这一时期的第二次分区：

1980：北方话，吴，湘，赣，客，粤，闽—7

第三次分区见于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 年)、《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 年)两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 年,1988 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包括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两部分,其中汉语方言部分由语言研究所编制。在地图编制过程中,语言研究所组织众多方言工作者对已有的方言材料做了实地的核对和补充,然后由李荣归纳成文,据此再绘制成 17 幅方言地图。李文和地图的分区如下:

1987:官话,晋,吴,徽,湘,赣,客,粤,闽,平—10

这一分区比方言普查后的分区增加了晋语、徽语、平话三个方言,其中徽语在史语所期间的分区中曾经提出过,晋语和平话则是新设立的。

汉语方言分区的工作数十年来一直受到重视,因为这是方言研究的基础之一。但分区工作中会遇到种种问题,又需要通过研究来解决。从史语所成立至今,汉语方言的分区一方面由粗疏趋于细密,工作进展迅速。另一方面又不断出现意见分歧。有的分歧日见接近,最终归于一致,如湘方言和赣方言从官话中分出,官话方言和闽方言的各自统一等。但也有一些分歧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消除,比如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此外,新设立的晋语、徽语、平话也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对分区存在不同意见,有的是因为对实际情况了解程度不同。这种分歧会随着对情况了解的增加或接近而消除。有的则是对情况了解基本相同,但在怎样根据情况进行分区时掌握上有所不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研究这一问题,比如各种方言特点不同性质的分析,它们的不同重要性的区分,然后在分区工作中合理地处理。而这也就是怎样确定和运用划分方言的标准的问题。

## (二)划分汉语方言的标准

**1.语音是划分汉语方言的主要标准**

划分方言,需要根据语言特点制定标准。汉语方言情况复杂,划分方言时要使用种种标准。在众多的标准中首先要分别主次,即主要标准和次要标准。主要标准指方言口语中出现频率高、覆盖面大的语言特点,次要标准则出现频率要低一些,覆盖面也小一些。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语音特点往往很明显,容易被感觉到。人们对汉语方言特点的感受主要就来自语音。而且语音特点具有明显的对应性、系统性,容易掌握,用来区分方言的功效比较高。相比之下,词汇、语法特点就比较地不够明显,不够系统,掌握起来也不如语音容易。由此可见,语音、词汇、语法在区分汉语方言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等的。相对说来,语音应该是区分汉语方言的主要标准。

以语音作为区分方言的主要标准,有一种不同的看法认为:目前人们对方言语音的研究比较多,了解自然也比较多,自然就倾向于把语音作为划分方言的主要标准;如果今后词汇、语法的研究取得进展,选择语音作为主要标准的情况就有可能改变。这一看法如果是指今后方言分区标准中词汇、语法的比重会有所增加,大概是很合理的。但如果是认为以语音为主的情况会发生变化,则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汉语方言的差异以语音为最是一个客观事实,人们历来也是这样看的。这一事实相信将来也不会改变。

**2.语音标准中的历史标准和非历史标准**

汉语经历长期演变,分化成了不同的方言。从语音方面为汉语方言分区,就要观察汉语从古至今分化过程中的语音变化。上古时期汉语方言的情况难以确知。但隋唐时期出现了我国现存最

早的韵书《切韵》，东晋以后的社会变迁使目前汉语方言分布的基本格局开始形成，因此，一般情况下，这一观察以中古时期作为起点显然是适宜的。通常可以就现代方言和中古方言的语音特点以及地区分布、居民来源等进行比较研究。如果方言中保存有中古以前的语音特点，自然也要纳入比较研究之中。

如上所述，语音的演变导致方言的分化。以古浊声母的音值为例，方言中或是发生清音化的变化，或是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情况的不同犹如一个音变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是从一个地点出发的若干条不同方向的道路，结果是产生了众多不同的方言语音特点。又如入声韵韵尾在各方言中合并、弱化、脱落等不同情况，也如同一个音变过程：

$$-p、-t、-k \rightarrow -ʔ \rightarrow \emptyset$$

结果同样也产生了众多不同的方言语音特点。或多或少的这类语音特点就使汉语分化成了不同的方言和次方言。与之相应，这类语音特点也把方言间的亲缘关系反映了出来。

另外，如第二章所述，方言语音的变化并不都是语音历史演变的结果，方言间的影响也会造成方言语音的变化。后者在性质上不同于前者，变化结果也不是分化，而是在这一方言内部出现另一方言的语音特点，即方言间的趋同。

上述两种语音变化，丁邦新认为前者是“历史性的”，可以分早期和晚期两类。所说早期大致指中古不晚于唐宋的时期，晚期指宋元以后。早期的历史性的语音演变反映方言在中古时已经分化，再经历以后的发展就成为不同的方言，所以可以根据它来区分方言。晚期的历史性的语音演变反映方言近古以后的变化，一般只是方言内部的再分化，只形成方言的内部分歧，所以不能根据它来区分方言，只能区分次方言、土话等。根据早期历史性语音演变情况制定的早期历史性语音标准主要有：

古浊声母的音值

轻唇音的音值

舌上音的音值

根据晚期历史性语音演变情况制定的晚期历史性语音标准主要有:

照二组照三组声母的音值

见组晓组声母的音值

阴声韵韵尾的演变

阳声韵韵尾的演变

入声韵韵尾的演变

调类的分合

入声调的分派

和历史性语音变化相对,还有一类非历史性的语音变化。其中一类虽然也属于方言自身演变产生的语音特点,但因为是近期发生,零星分布,难以通过比较来确定方言的亲疏关系,如关中地区方言中知照系今合口字声母 pf、pf' 等。另一类则属于方言间的相互影响,所以常常呈跨方言分布,也难以用来区分方言,如 n、l 不分等。根据非历史性的语音变化情况制定的非历史性语音标准主要有:

非敷奉母字和晓匣母字声母的分混

泥来母字声母的分混

就上述历史性语音标准来看,1934 年史语所以来的方言分区中,湘方言和赣方言是根据古浊声母音值的不同特点分别从官话中分离出来的,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是根据古浊声母音值方面的共性合而为一的,闽南话和闽北话则是根据古浊声母、轻唇音、舌上音等音值的相同情况合并的。官话内部各地的韵母系统和调类分派存在差别,闽方言各地的韵母系统也存在差异,但都只构成方言内部次方言的语音特点。

### 3. 单一标准和多项标准

由于社会历史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汉语各方言经历长时期发展后，彼此间既有不同的特点，也有相同的特点。因此在为方言进行分区时，常常不能只根据某一个语音特点来判断，而需要同时参考其他语音特点。也就是说，区分方言常常不能只靠单一标准，而要使用多项标准。例如吴方言古浊声母保持浊音音值，根据这一特点可以毫无困难地把它和周围的江淮官话、赣方言、闽方言等区别开来。但是这一语音标准却无法使吴方言和湘方言的老湘语相区别，因为老湘语的古浊声母也保持了浊音音值，和吴方言相同。这就需要同时再使用其他语音标准，比如老湘语非敷奉母字和晓匣母字声母混同以及泥来母字声母混同的特点，把这两个在古浊声母的演变方面具有平行发展特点的方言区别开来。

从地理上看，方言是逐渐变化的。方言区中心地带的特点，扩散到边缘地区时会变得模糊起来，甚至消失。所以边界地带的方言常常不能具有本方言的全部特点，却有可能具有另一方言的某些特点。对于这样的方言，需要区分它所具有的多项语音特点的主次，再考虑它的归属。比如山西太原地区方言中有入声韵，而晋南方言已经入派三声，和河西的关中方言相同。单就入声韵的情况看，晋南方言就不能和太原地区的方言划归一个次方言。但如果使用多项标准，比如不把入声韵的情况看成是唯一的标准，却把一些重要的韵母情况考虑在内，则可以看出晋南地区和太原地区方言的一致性仍然是主要的。

在汉语方言分区工作中，使用多项标准还有“合取”和“析取”的不同处理。“合取”指全部各项标准都必需符合，“析取”指多项标准中只需要符合一二项。两种处理可能引出不完全相同的结果。因为强调“合取”，有时会使方言界限不稳定，反而出现新问题；强调“析取”，则有时会出现太多的随意性。所以还需要在不同的标准中进行适当的调节。

多项标准的选取，也有不主张全部使用语音(语言)标准，而直接采用一部分特定的语言事实的。比如罗杰瑞为区分汉语方言而设计的十项标准：

第三人称代词：他

定语的标记：的

普通话的否定词：不

动物性别标记前置：母鸡

只有平声分阴阳

舌根音在高元音前腭化：k → tɕ

“站”(站立)

“走”(步行)

“儿(子)”

“房子”(整所的)

罗杰瑞根据这十项标准把汉语方言分成南、北、中三大区，再把南、中两区各分为三个方言，结果和前述1980年的分区相同。这些标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按理说使用语言标准和使用语言事实应该是一致的，因为语言标准正是从语言事实中归纳出来的。但特定的语言事实并不一定能像语言标准那样明显地反映出方言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语言事实如果选择不当，还可能导致不正确地反映方言间的关系。此外，语言事实显得零碎，缺乏语言标准、特别是语音标准所具有的系统性，也会造成实际掌握上的困难。

近年来还有用对全部方言特点作计量研究的方法，测量方言间的亲疏程度，来为方言作分区的。比如郑锦全从汉语方言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等)和词语中提取特征转化成数量进行统计，以不同的数量表示方言间不同的亲疏关系，从而区别方言或次方言或土语等。这是从多种标准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方法，具有精密的可验证的特点。它为方言分区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不过它

也不一定能解决方言分区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尝试用这种方法为汉语方言分区，人们也许可以不再在两组相似的语言标准前犹豫不决，但仍有可能在两组相近的数字前犹豫不决。

4.**分区标准掌握中的问题**

在确定区分方言的各种标准以后，还有一个怎样掌握这些标准的问题。以下几个方面也许是需要注意的。

(1)分区标准的普遍适用性

汉语方言的分区是一项全面的系统的工作，分区标准的设定要照顾到汉语方言的整体，要能适用于所有的方言。如果仅仅考虑局部方言的情况就做出判断，就有可能与其他方言的情况发生矛盾。比如根据有入声韵的特点在官话中划定次方言江淮官话，同样根据有入声韵的特点却把山西及其周围地区的方言从官话中分离出来，标准相同而处理不同，形成矛盾。

(2)分区标准的层级性

汉语方言的差异不只存在于方言之间，一个方言的内部也常常是分歧复杂的。方言、次方言、土语之间有不同的差异，相应也都要有不同的分区标准。所以分区标准具有层级性，各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前文所述，早期历史性语音标准可用作方言一级的分区标准，其他语音标准只适用于次方言、土语等的划分。不注意分区标准的层级性，虽然不致于抹煞方言差异的存在，但会在方言、次方言、土语等层级的安排上造成差错，而这也正是分区工作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比如闽南话和闽北话曾经长期分立，就是因为把应该是反映次方言一级差别的韵母特点用作区分方言一级的语音标准。理顺分区标准的层级性以后，闽南话和闽北话就合而为一了。

(3)分区标准运用中的灵活性

方言存在差异是客观事实，方言分区的标准也是客观的。但在某种情况下，为了使分区的结果能符合实用的要求，标准的掌握

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在不损害科学性的前提下，应该允许和纯学术考虑有所不同。比如在要求方言向统一方向发展的社会情况下，可分可不分的方言就以合为宜。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实际上差别很小，在次方言一级加以区分就值得商榷。又如分布面积极小的方言，分类也不宜安排在较高的层级上。比如福建莆仙话原属闽南话，正向闽东话转变，按目前的情况，归属闽南话或闽东话都有困难。但莆仙话只通行在莆田、仙游两地，要作为一个次方言和闽南话、闽东话等并列，实在是太小了。从质和量的关系看，量如果太小，质也将失去意义。因此莆仙话如果就它变化的方向着眼，把它归入闽东话，作为其中一个特殊的土语，也许是比较合适的处理。

## 参考文献


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清华学报》新 14 卷 1.2 期，1982；《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

《书评：〈中国语言地图集〉》，《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1 卷 1 期，1996。

丁声树、李荣：《汉语方言调查》，《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

傅斯年：《所务记载(二)：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与旨趣》，《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

黄家教、詹伯慧、陈世民：《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3.4。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

李方桂：《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国年鉴》第七本（1944—1945），

上海自由论坛报。
李　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1。
《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1989.4。
梁金荣、高然、钟奇:《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1997.2。
罗杰瑞:《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
王士元、沈钟伟:《方言关系的计量表述》,《中国语文》1992.2。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章太炎:《检论》(卷五)“方言”,《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赵元任:《国语入门》(《北京口语语法》),李荣编译,开明书店,1952。
郑锦全:《汉语方言亲疏关系的计量研究》,《中国语文》1988.2。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7,1988。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
朱德熙:《在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语文》1986.4。

# 四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二)

数十年来汉语方言分区中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人们对方言事实了解程度和性质判断上的分歧,以及在分区标准掌握和运用中的差别。有时旧的分歧消除了,在新情况下又会出现新的不同意见。也有一些看法虽然不直接影响方言目前的分区,但涉及方言在历史上的关系。下面分别叙述若干较为重要的分区问题。

## (一)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

**1.问题的提出**

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是汉语方言分区中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1934年史语所所做的方言分区中,有客家话,没有赣方言。赣方言包括在下江官话中,还没有分出来。是不是存在赣方言以及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关系怎样,是罗常培首先提出来的。罗常培1936年在《临川音系》的叙论中提出,临川话和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话很相近,二者"是同系异派的方言";1942年在《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一文中提出,江西方言"和客家话系统相近";1956年在《临川音系》再版序言中又提出,存在着"客赣方言的亲属关系"。罗常培的看法显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37年

李方桂和1948年赵元任所做的方言分区中都有了赣方言，而且都和客家话合在一起，统称“赣客家语”。这和罗常培的看法恐怕不无关系。但是从1948年史语所的方言分区开始，客家话和赣方言不再合在一起了。两方言的分合，以后就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

**2. 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异同**

客家话和赣方言分合的问题，主要是两方言语音特点的异同问题。客家话和赣方言这两个比邻相处的方言在重要的语音特点方面相当一致，要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历来在讨论两方言的分合时，都把作为依据的语音特点列举出来。但所举不全一致，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下面列出一般认为的两方言重要的语音共同点和差异。

(1)共同的语音特点

这一类特点主要有：

①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如：

| | 同 | 动 | 洞 | 独 |
|---|---|---|---|---|
| 梅县 | ꜁t'uŋ | t'uŋ꜄文 ꜀t'uŋ白 | t'uŋ꜄ | t'uk꜇ |
| 南昌 | ꜁t'uŋ | t'uŋ꜅ | t'uŋ꜅ | t'uk꜇ |

②非敷奉母字声母和晓匣母合口韵字声母音值一般相同，如：

| | 匪 | 肺 | 服 | 花 | 画 |
|---|---|---|---|---|---|
| 梅县 | ꜂fi | fi꜄ | fuk꜇ | ꜀fa | fa꜄ |
| 南昌 | ꜂fɔi | fəi꜄ | fuk꜇ | ꜀fa | fa꜅ |

(2)不同的语音特点

客家话不同于赣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如下：

①存在“古无轻唇音”的现象，如梅县“扶”(奉)꜁fu文 ꜁p'u白；

②存在“古无舌上音”的现象，如梅县“知”(知)꜀tsɿ文 ꜀ti白；

③泥来母字声母不相混同，如梅县“男”(泥)꜁nam≠“篮”(来)꜁lam；

④影疑母字声母不相混同，如梅县“爱”(影)ɔi꜄≠“碍”(疑)

ŋɔi²；

⑤溪母合口韵少数字声母读 f，如梅县“裤”（溪）k‘u²文 fu²白；

⑥没有撮口韵，如梅县“雨”（合口三等）ˊi；

⑦一等覃谈韵字韵母混同，如梅县“蚕”（覃）＝“惭”（谈）꜀ts‘am；

⑧部分江摄字韵母读同通摄，如梅县“双”（江）＝“鬆”（冬）꜀suŋ，“浊”（觉）＝“逐”（屋）ts‘uk꜆。

赣方言不同于客家话的语音特点主要如下：

①泥来母字声母混同，如南昌“南”（泥）＝“篮”（来）lan²；

②影疑母开口一二等字声母混同，如南昌“爱”（影）ŋɔi²，“碍”（疑）ŋɔi²；

③有的方言来母细韵字声母读舌尖塞音，如都昌（土塘）“料”tiɛu²；

④有的方言知照三等字声母读舌尖塞音，如临川“转”（知）ˊtɔn，“超”（彻）꜀t‘ɛu，“虫”（澄）꜀t‘uŋ，“真”（章）꜀tin，“春”（昌）꜀t‘un；

⑤一等覃谈韵字韵母不相混同，如南昌“蚕”（覃）꜀ts‘ɔn≠“惭”（谈）꜀ts‘an。

(3)因地域推移而渐增差异的语音特点

还有一些语音特点，在客家话和赣方言两方言的范围内，距离越远，音类的差异也越大。由南向北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

①韵母中闭口韵逐渐消失，如：

| | 三 | 散 | 桑 | 法 | 发 | 伯 |
|---|---|---|---|---|---|---|
| 梅县 | ꜀sam | ˊsan | ꜀sɔŋ | fap꜆ | fat꜆ | pak꜆ |
| 临川 | ꜀sam | ˊsan | ꜀sɔŋ | fat꜆ | fat꜆ | peʔ꜆文 paʔ꜆白 |
| 南昌 | ꜀san | ˊsan | ꜀sɔŋ | fat꜆ | fat꜆ | pɛt꜆文 pak꜆白 |

②读入阴平的次浊上字逐渐减少以至消失，读入阴平的浊去字出现并逐渐增多，如：

| | 马 | 舅 | 蛋 | 硬 |
|---|---|---|---|---|
| 梅县 | ꜀ma | ꜀k‘iu | t‘an꜄ | ŋaŋ꜄ |
| 新干 | ꜂ma | ꜀tɕ‘iu | t‘an꜄ | ŋaŋ꜄ |
| 都昌 | ꜂ma | iu꜄文 ꜀iu白 | ꜀dan | ŋaŋ꜄ |

③阴阳入调值逐渐由阴低阳高变为阴高阳低，如：

| | 阴入 | 阳入 |
|---|---|---|
| 梅县 | 1 | 5 |
| 连南 | 2 | 5 |
| 临川 | 32 | 5 |
| 弋阳 | 5 | 3 |
| 南昌 | 5 | 21 |

上述或同或异的语音特点中，既有历史性的语音标准，也有非历史性的语音标准。其中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这一早期历史性语音标准，无疑是两方言最重要的共同点。相比之下，两方言不同的语音特点重要性就要差一些。其中客家话“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性质上虽然重要，但存在领字太少的问题。另外，某些语音特点反映客家话区南部北部和赣方言区南部北部因距离大小而增减差异，距离近的方言差异小，距离远的方言差异大。所以人们一直感到区分客家话和北部赣方言比较容易，区分客家话和南部赣方言要困难些。特别是赣方言临川地区的方言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客家话和北部赣方言之间的过渡。

从上述语音特点的整体情况来考虑，客家话和赣方言应该是可以处理成一个方言中的两个次方言的。但也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词汇在构成客家话和赣方言差异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比如据调查，和赣方言相比，客家人“我”说“俚”，“吃饭、吃茶”说“食饭、食茶”，“是”说“系”，“破了”说“烂了”，“活个”(活的)说“生介”，“交合”说“鸟”、“藏(藏东西)”说“摒”，等等，明显不同。不过，这种不

同比起汉语方言间一般的词汇差异来程度上并不突出，而汉语方言并不依靠这样的词汇差异作为分区的依据，所以把它看作客家话和赣方言主要差异的组成部分，理由是不充分的。

**3. 客家话和赣方言古浊上字的分派**

由于上述客家话和赣方言语音特点的总体情况不能支持两个方言的分立，1973 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客家方言》一书中提出，客家话有些“古次浊上字归阴平”，可以根据这一特点和赣方言相区别。1988 年美国学者罗杰瑞在《汉语概说》中还进一步表示：“认为客家话和赣方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其理由大部分是表面上的。”桥本万太郎的意见为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他们还补充指出，客家话古全浊上字和次浊平字也有读阴平的。黄雪贞《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一文还提出：“客家话声调的特点在于古次浊上声与全浊上声都有读阴平的。”这就是说，客家话一部分次浊上、全浊上、次浊平字归阴平这一语音特点，可以用作区别于赣方言的主要依据。但结合共时和历时两方面来观察，这个依据恐怕还需要斟酌。

首先，客家话次浊平字的确有少数字在各地一致归入阴平。以梅县话为例，如“毛”꜀mau、“蚊”꜀mun、“拿”꜀na、“褛”꜀lau、“鳞”꜀lin、“笼”꜀luŋ、“聋”꜀luŋ、“窿”꜀luŋ、“拈”꜀ȵiam，“研”꜀ŋan、“昂”꜀ŋɔŋ。但这些次浊平字归入阴平并不一定都是客家话自身演变的结果。其中有些字在邻近的湘、粤、闽方言，甚至赣方言中也同样读入阴平。例如：

| | 毛 | 蚊 | 拿 | 聋 | 拈 | 研 |
|---|---|---|---|---|---|---|
| 南昌 | mau˒ ꜀mau | | | ꜀luŋ | ꜀ȵiɛn | |
| 长沙 | | ꜀mən | ꜀la ꜀la | ꜀lən | ꜀ȵiẽ | ꜀ȵiẽ |
| 广州 | | | | | ꜀nim | |
| 厦门 | | | | | ꜀nĩ | |

这些字在相邻多个方言中都读入阴平，说明可能存在借用的情况。

有的字借用的迹象还相当明显。比如粤方言中存在因小称变调使包括次浊平字在内的各调类字读成高平调的现象。以广州话为例，如“褛”꜀leu、“蚊”꜀men、“窿”꜀luŋ 等。而广州话的高平调和梅县话的阴平调调值相近。这很有可能是客家话这些次浊平字读作阴平调的原因。考虑到这些借用的情况，客家话中可以构成调类分派特点的次浊平字，实际数量要大大减少，以致难以成为一个特点。

其次，次浊上字归阴平的现象的确普遍见于客家话地区，但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一些客家话（特别是在赣南地区）并没有这一特点，而赣方言赣中地区特别是临川地区的个别方言反倒有这一特点，如广昌“野”꜀ia，南城“尾”꜀mi。全浊上字归阴平的现象，更是不仅见于客家话，还见于许多赣方言。因此实际上赣方言也存在“古次浊上声和全浊上声都有读阴平”的方言。而且如果把次浊上字和全浊上字结合起来考察，还可以发现客家话和赣方言在这方面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以梅县、定南、大余等客家话和新干、都昌等赣方言为例：

| | 马 | 舅 | 蛋 | 硬 |
|---|---|---|---|---|
| 梅县 | ꜀ma | ꜀kʻiu | tʻan꜄ | ŋaŋ꜄ |
| 定南 | ꜂ma | ꜀tɕʻiu | tʻan꜄ | ŋaŋ꜄ |
| 大余 | ꜂ma | tɕʻiu꜄$_{文}$ ꜀tɕʻiu$_{白}$ | ꜀tʻã | ꜀ŋã |
| 新干 | ꜂ma | ꜀tɕʻiu | tʻan꜄ | ŋaŋ꜄ |
| 都昌 | ꜂ma | iu꜄$_{文}$ ꜀iu$_{白}$ | ꜀lan | ŋaŋ꜄ |

如果把上表中的阴平字改写成符号“＋”，再删去非阴平字，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情况：

| | 次浊上 | 全浊上 | 全浊去 | 次浊去 |
|---|---|---|---|---|
| 梅县 | ＋ | ＋ | | |
| 定南 | | ＋ | | |
| 大余 | | ＋ | ＋ | ＋ |

| | | |
|---|---|---|
| 新干 | + | |
| 都昌 | + | + |

表中各地都有浊上字归阴平的情况，说明这是一个在客赣两方言普遍发生的音变。音变在各地表现不完全相同，但这只是音变发生时各地方言自身音韵条件不完全相同的反映。如梅县话次浊上字和全浊上字都归阴平，反映音变发生时梅县话次浊上和全浊上还没有分化。定南话和新干话次浊上字归上声，只有全浊上字归阴平，反映当时定南话和新干话次浊上和全浊上分化，次浊上已经和清上合流。大余话和都昌话次浊上字归上声，而全浊去（和次浊去）字和全浊上字同归阴平，反映当时两个方言次浊上和清上合流，全浊去（和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上面所说各方言不同的音韵条件，就是指次浊上和清上合流、全浊去（或包括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这两个调类演变在方言中是否已经发生。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设想，浊上归阴平的音变不是在客赣两方言各地同时发生的。音变可能由南（客家话）向北（赣方言）发展，中间有一个过程。最先在南部发生时，客家话还不存在次浊上归清上以及全浊去（或包括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的演变，所以次浊上字和全浊上字都归入阴平，浊去字不归阴平。以后音变向北发展到江西时，当地客家话和赣方言已经发生了次浊上和清上合流（这大概是官话的影响）以及全浊去（或包括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的演变，所以次浊上字不归阴平，全浊去（或包括次浊去）字却随全浊上字归入了阴平。（值得注意的是，今江苏泰州一带的方言也有类似的现象，如泰兴“舅旧”꜀tɕʻiɤɯ，“蛋”꜀tʻɛ̃，“硬”꜀ŋəŋ，泰州“舅旧”tɕiɤɯ꜄$_{文}$ ꜀tɕʻiɤɯ$_{白}$，“蛋”tɛ̃꜄$_{文}$ ꜀tʻɛ̃$_{白}$，“硬”꜀əŋ。也许这一带的方言和赣方言之间曾经有过密切的关系。）根据这一设想，浊上归阴平的音变发生时，如果不是江西的客家话和赣方言已经受到其他调类演变规律的影响，客赣两方言各地的浊上字显然将和梅县话一样全部归入阴平。当然，以后次浊上归清上和浊去归全浊上的音

变由北发展到了南部客家话地区，但那时当地浊上字已经归入阴平，浊去字归入上声后已经不可能再归入阴平了。至于官话全浊上归去的调类演变规律对客赣两方言的影响，则是更晚的事，和浊上归阴平问题无关了。

从以上观察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1)客赣两方言区发生过三种和浊上字归阴平有关的调类演变。属于客赣两方言的除浊上归阴平（由南向北）外还有浊去归上（由北向南），由官话区进入的有次浊上归清上。这些时间先后不一的演变在各地方言中留下了不尽相同的声调层次。

(2)客赣两方言浊上字归阴平，是在同一规律支配下产生的历史音变。浊上字在各地方言中的不同表现只是同一规律的不同折射，或者反过来说，这些不同折射恰恰反映了同一个音变规律。

(3)各地方言的全浊上字都参与了归入阴平的音变，而次浊上字是否参与音变则取决于有没有其他声调演变规律的影响。因此，浊上归阴平这一音变的核心成分应该是全浊上字，而不是次浊上字。

(4)客家话和赣方言中都有在上述浊上归阴平的音变方面表现相同的方言和表现不同的方言，而表现相同的和不同的方言并不按两方言的界限分布。这说明当时这一音变可以在客赣两方言的范围内自由传递或扩散，说明当时客赣两方言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方言区的界限。

根据以上几点认识，可以认为客家话古次浊上、全浊上、次浊平字归阴平的语音特点，还不是一个本质的特点。依靠它来和赣方言相区别，就方言一级来说是不够的。但用来说明客赣两方言是同一大方言的两个次方言，则有相当的说服力。

**4. 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历史关系**

综上所述，客家话和赣方言不存在真正能成为方言分区依据的语音差异。但就目前所知，江西境内说客家话的人和说赣方言

的人都坚持自己说的话是和对方不同的方言。也就是说，两个方言虽然共同点是主要的，但居民却在语言上互相排斥，不相认同。人们自然要提出疑问：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也许客赣两方言重要的语言共同点不是由历史演变形成，而是由不同方言间的影响造成的？如果是这样，有重要共同点而仍然属于不同方言就不足为奇了。但至少前述浊上字归阴平的现象不可能是借用的结果。那么问题仍然要回到前面提到的一些最重要的语音共同点（如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等）上，看它们到底是怎样产生的。1960年袁家骅在《汉语方言概要》中曾就这一问题指出："方言间语音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是可能的，因此必须找出历史发展的线索，说明两个方言的确经过一个共同时期，才能算是同一方言的不同分支。"这样，就需要从了解客赣两方言人民的历史入手，观察两方言是不是经历过这样的共同时期。

现代赣方言分布在江西北部中部以及相邻湖北、湖南、福建的边缘地区。古代这一带的情况缺乏记载。东汉扬雄《方言》多处提到吴越、吴扬越、吴扬江淮、吴楚、荆吴扬瓯等地的方言，但没有提到过包括在这些地域中的赣方言地区。这可能和当地人口稀少，缺少语言方面的记载有关。不过稍后中古时期的吴语是一个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内部比较接近的大方言，当时赣北赣中一带的方言和吴语其他地区的方言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客家人的祖先是由古代中原地区躲避战乱而南迁的汉族居民。据近人的研究，他们的迁徙主要分为三期。西晋末年（306年）以后是第一期。他们顺颍水南下，在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徙到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以至苏南、赣北、赣中一带的江南地区。《晋书·王导传》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可见移民数量之多。当时为安置移民，建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按移民来源地分别管理。人口的增长导致不断增设行政机构。如江西在东晋时有豫章、鄱阳、临川、庐陵四郡，刘宋时从庐陵郡分出南康郡（赣

南),隋时又从豫章郡分出宜春郡(赣中)。导致人口增长的原因主要就是客家人祖先的迁入。以后唐末黄巢起义(874 年),十年战乱,江西"虔吉饶信"等州(今赣北、赣中西部、赣南)处在战火之中,客家人祖先不得不又向今赣东南、闽西一带迁徙。这是第二期迁徙。再以后到南宋末年(1271 年),元人南下,战乱又起,又有大量客家人的祖先向南迁徙到今广东东部北部。这是第三期迁徙。在这三期的主要迁徙以后,客家人还有局部的流动,其中如清初靖边迁海,部分客家人回流到江西遂川、萍乡、万载、修水等地。不过客家人在第三期以后的迁徙,和客家话赣方言的分合问题已经没有关系了。

客家人祖先的三期迁徙,每一期迁徙后都有二四百年的时间得以安定生息。第一期迁徙后是唐代盛世,第二期迁徙后是宋代小康。而第一期迁徙后所居住的赣北赣中地区正是现在的赣方言区。由此看来,客赣两方言历史上的确是有过一个共同时期的。这就可以认为,它们重要的语音共同点是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经历共同的演变形成的,它们不同的语音特点则是在客家人祖先第二次迁徙,离开赣北、赣中以后分别产生的。不过客家人祖先离开今赣方言区后并没有立即使两地方言间的关系发生多大变化。官话中次浊上和清上合流的声调演变发生在宋代,这一演变对客赣两方言浊上归阴平的音变都造成了影响。可见客赣两方言在稍晚于宋代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仍然属于同一方言。(目前临川地区的赣方言和客家话语音共同点较多,可能是因为唐末动乱期间抚州一带相对比较安定,客家人祖先居留未迁的较多。这一语音共同点较多的现象也反映了客赣两方言早期的密切关系。)

既然客赣两方言曾经有过一个共同时期,曾经是同一方言,具有许多重要的语音共同点,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居民的共同心理却没有能形成呢?这恐怕和客家人祖先第二期第三期迁徙后的情况有关。客家人祖先作为晚到的移

民，一般居住在闽西粤北的山区，和当地的畲族杂处，贸易婚姻，往来密切，和周围平原地区的其他汉族居民却有一个距离。他们没有能和这些更早到达的汉族居民融合，相反语言上很快有了人们所注意的特点，后来还有了一个作为特殊民系的称呼——客家，显示出不同于当地话和当地人的特殊性。而且，作为移民的后代，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如坚守祖先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容易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再度迁徙。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他们和周围社会环境的融合。当然，在目前，客家人的大批迁徙已经成为历史，但客家是一个特殊的民系，客家话是客家人的语言这种观念，其影响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除。似乎客家话主要是和客家人本身，而不是和客家人所在的地域相联系的，似乎客家话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地域性方言。也许这才是客家话和赣方言无法合成一个方言的真正原因。

## （二）闽方言和吴方言的关系

### 1.闽方言和吴方言的差别

闽方言和吴方言分布在东南沿海，比邻而处，各有特点。它们各自主要的语言特点是：

(1)闽方言古浊声母清化，塞音塞擦音大多数字不送气，少数字送气，吴方言则保持浊音音值。例如：

| | 桐 | 动 | 洞 | 读 |
|---|---|---|---|---|
| 苏州 | ꜀doŋ | doŋ$^{2}$ | doŋ$^{2}$ | doʔ$_{2}$ |
| 厦门 | ꜀tɔŋ文 ꜀t'aŋ白 | tɔŋ$^{2}$文 taŋ$^{2}$白 | tɔŋ$^{2}$ | t'ɔk$_{2}$文 t'ak$_{2}$白 |
| 福州 | ꜀tuŋ文 ꜀t'øyŋ白 | touŋ$^{2}$文 tœyŋ$^{2}$白 | tɔŋ$^{2}$文 tœyŋ$^{2}$白 | t'uʔ$_{2}$文 t'øyʔ$_{2}$白 |

(2)闽方言有较普遍的"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现象，吴方言则极少上述现象。例如：

| | 飞 | 蜂 | 知 | 治 |
|---|---|---|---|---|
| 苏州 | ꜀fi | ꜀foŋ | ꜀tsɿ | zɿ꜉ |
| 厦门 | puci | ꜀hɔŋ文 ꜀p'aŋ白 | ꜀ti | ti꜉文 ꜀t'ai白 |
| 福州 | ꜀pe | ꜀huŋ文 ꜀p'uŋ白 | ꜀ti | tei꜉文 ꜀t'ai白 |

因为闽方言和吴方言各自的特点都很显著，所以在以往多次的方言分区中，还从没有人对它们的区别提出过疑问。

**2. 闽方言和吴方言的共同点**

从50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发现闽方言和吴方言存在若干重要的共同特点。

(1)群母字有一、二、四等

50年代方言普查时发现，江苏长江北岸江淮方言扬州等30市县的方言中，匣母浊平字"环"的声母不是擦音 x，而是送气清塞音声母 k'，恰好和长江南岸吴方言"环"的浊塞音声母 g 相对应：

扬州꜁k'uæ̃ ： 苏州꜁guE

1965年，李荣《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一文把江淮方言、吴方言、徽州方言和闽方言部分匣母字和个别见溪疑母字白读音声母读同群母的现象加以比较，得出古代某些方言群母字"除三等外，也见于一、二、四等"的结论。现在分别举例如下：

①见于闽方言的如：

| | 寒一 | 猴一 | 咬二 | 行二 | 悬四 |
|---|---|---|---|---|---|
| 厦门 | ꜁kũã | ꜁kau | ka꜉ | ꜁kĩã | ꜁kũãĩ |
| 福州 | ꜁kaŋ | ꜁kau | ka꜉ | ꜁kiaŋ | ꜁keiŋ |

②见于吴方言的如：

| | 隑一 | 搿一 | 搅二 | 解二 | 掼二 | 懈二 |
|---|---|---|---|---|---|---|
| 苏州 | gE꜉ | goʔ꜆ | gæ꜉ | gɒ꜉ | guE꜉ | gɒ꜉ |
| 温州 | ge꜉ | go꜆ | ꜂guɔ | ꜂ga | ga꜄ | |

③见于闽方言和吴方言的如：

| | 厚 | 怀 | 环 | 衔 |
| --- | --- | --- | --- | --- |
| 苏州 | ᶜgei [illegible] | ꜀gua [illegible] | ꜀guɐ | ꜀gæ̃ [illegible] |
| 温州 | ᶜgau | ꜀ga | | ꜀ga |
| 厦门 | kau$^{2}$ | ꜀kui | ꜀k'uan | ꜀kã |
| 福州 | kau$^{2}$ | ꜀køy | ꜀k'uaŋ | ꜀kaŋ |

由于徽州方言和江淮方言的分布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吴语区，因此上述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群母字有一、二、四等是闽方言和吴方言的共同特点。

(2)"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

方言普查时，在吴方言区浙江南部如丽水、江山等方言中发现颇多"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的现象。这说明这些现象不但不能用来区别闽方言和吴方言，相反倒是反映了两个方言间的密切关系。例如：

①"古无轻唇音"现象：

| | 斧 | 肥 | 伏 | 反 | 放 |
| --- | --- | --- | --- | --- | --- |
| 江山 | ᶜpu | ꜀bi | bɯ$^{2}$ | ᶜpã | puŋᵓ |
| 福州 | ᶜp'uɔ | ꜀puei | pou$^{2}$ | ᶜpeiŋ | pouŋᵓ |
| 厦门 | ᶜpɔ | ꜀pui | pu$^{2}$ | ᶜpɪŋ | paŋᵓ |

②"古无舌上音"现象：

| | 猪 | 迟 | 账 | 长 | 竹 | 直 |
| --- | --- | --- | --- | --- | --- | --- |
| 丽水 | ꜀ti | | tiaŋᵓ | ꜀dãĩ | tioʔ꜇ | |
| 江山 | ꜀tɔ | ꜀dei | tiãᵓ | ꜀dɛ̃ | taʔ꜇ | dieʔ꜆ |
| 福州 | ꜀ty | ꜀ti | tuɔŋᵓ | ꜀touŋ | tøyʔ꜇ | tiʔ꜆ |
| 厦门 | ꜀ti | ꜀ti | tiɔŋ$^{2}$ | ꜀tŋ | tek꜇ | tit꜆ |

(3)区别三四等韵：

汉语方言中一部分三四等韵保持区别的现象，以往只见于闽方言区。金有景60年代在吴方言浙南义乌话中也发现了这一特

点，以后又在当地 16 个方言中发现同一特点。下面以金华、永康、义乌等方言为例，并和闽方言福州、厦门方言相比较：

| | 连咸三 | 莲咸四 | 仙山三 | 先山四 |
|---|---|---|---|---|
| 金华 | lie | liɐ | siɛ | siɐ |
| 永康 | liᴇ | liᴀ | ɕiᴇ | ɕiᴀ |
| 义乌 | lie | liɛ | sie | ɕiɛ |
| 福州 | lieŋ | leiŋ | sieŋ | seiŋ |
| 厦门 | liɛn | nãĩ | siɛn | sɪŋ |

(4)共同的词语

闽方言和吴方言还有一些词语彼此相同，而且极少见于其他方言。例如：

| | 骹 | 侬(人) | 箬 | 赚(错) |
|---|---|---|---|---|
| 宁波 | ꜀k'ɔ | ꜁ȵioŋ | ȵiaʔ꜆ | dzɛ$^{2}$ |
| 温州 | ꜀k'uɔ | ꜁naŋ | ȵia꜆ | dza$^{2}$ |
| 福州 | ꜀k'au | ꜁nøyŋ | nuoʔ꜆ | taŋ$^{2}$ |
| 厦门 | ꜀k'a | ꜁laŋ | hioʔ꜆ | tã$^{2}$ |

上述例字中，"侬"是古江南地区的方言词。《庄子·让王》东汉成玄英疏："侬，人也，今江南唤人作侬。"当时的江南地区包括现代的吴闽两方言区。

近年来人们还在文献中发现，古代吴、楚、江东、江南的若干方言词语，目前已经不见于吴方言，却还能在闽方言中找到。现选取《方言》、《说文》(以上东汉时期)、《方言》注、《尔雅》注(以上东晋)、《广韵》(隋唐)中"夥"多、"椷"勺子、"煤"火、"濑"浅滩、"褫"袖、"漴"淬、"健"小母鸡、"澳"海岸、"虮"蚂蚁、"鹁"蛤蟆等词，分时期列表如下：

| 东汉 | 东晋 | 隋唐 | 福州 | 厦门 |
|---|---|---|---|---|
| 夥楚 | 夥江东 | 夥齐 | uai$^{2}$ | |
| 椷楚 | 椷江东 | | ꜀xie | ꜀hia |

| | | | | |
|---|---|---|---|---|
| 燬楚 | | 燬南人 | ʻxuei | |
| 濑吴越 | | | laiʾ | suaʾ |
| | 椀江东 | | ʻuɔŋ | ʻŋ̍ |
| | 薸江东 | 薸江东 | ꜀p'icu | ꜀p'io |
| | 侬江东 | | | nũãʾ |
| | 澳江东 | | ɔʾ | oʾ |
| | 扤江东 | | ꜀k'i | ꜀k'i |
| | | 鶄吴 | | ꜀tsĩũ |

上述词语虽然已经不见于现代吴方言，但仍然能说明历史上吴闽两方言在词语方面的共同点。

以上闽方言和吴方言语音和词语的共同点，虽然不足以否定两方言的区别，但确实也反映了两方言存在密切的关系。不过所述语音特点在吴方言中一般少见于北部苏南地区，而多见于南部浙江，特别是浙南地区；词语中则有一部分在古代曾见于江南北部（现代吴方言区），而目前只见于闽方言区（古代江南南部）。这一现象可以用方言间的影响来解释，即吴方言北部地区因为受官话的影响，保留特点比较少，而南部地区因为和官话距离比较远，又和闽方言区相邻，特点保留比较多。

由于吴闽两方言具有以上重要的共同特点，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吴闽两方言同源的假设。比如 1983 年罗杰瑞《闽语里的古方言字》认为，闽方言的来源是《切韵》成书以前的江东方言或吴方言。1986 年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也认为，"闽语的主要渊源应该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吴语，因为福建的汉人主要是这一时期开始从江浙一带迁入的。他们带来的这一时期的吴语与当时闽越族语言经过交融后逐渐形成与今日吴语大不相同的闽语。""吴语历史虽然最为久远，但在表现形态上却不算古老。因为三千年来它一直受到不断南下的北方话的强烈影响。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头。"1988 年丁邦新在《吴语中的闽语成

分》中更明确地提出："现在吴语的底层具有闽语的成分，可能南北朝时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当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祖先。"丁邦新实际上认为，现在的吴语只是中古北音的继承者，和中古的吴语并无关系。以上几种意见虽然小有差异，但在认为现代闽方言是中古吴语的继承者这点上是一致的。

从目前吴闽两方言的重要共同点引出现代闽方言是中古吴语继承者的结论，是言之成理的说法。不过它不能说明吴闽两方言为什么目前又还存在某些十分重要的差别，比如古浊声母音值的不同等。通常认为，吴方言和湘方言都是由中古吴语发展而来的，它们至今还保存不少共同的特点，如古浊声母保持浊音音值就是其中之一。如果闽方言是中古吴语的继承者，则应该也具有这同一语音特点。但难以解释的是，这种浊音音值在受北方官话长期强烈影响的吴方言中得以保持，反倒是处在吴方言区以南、和北方官话并不接壤的闽方言中却已经不再存在。看来唯一可能的答案应该是，它们本来就是不同的方言。而且，如果认为闽方言是中古吴语的继承者，那也需要有社会历史方面的证据，需要弄清楚闽方言形成过程中和中古吴语有关的具体情况。

**3. 闽方言形成的历史**

根据历史记载，现代闽方言区在古代是"百越"的居住地，汉族居民是在东汉以后才进入这一地区的。最早的记载见于三国时期。孙吴开发江东，东吴人逐步从会稽南下，越过仙霞岭经浦城进入闽北地区，由此设立了建安郡。这些最早进入闽北地区的汉族居民数量不多。他们说的话应该是中古的吴语。

汉族居民大量进入闽地是在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以后。由于战乱，中原地区的居民纷纷避难南迁。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他们南迁的路线大致可分为三。一是中原西部秦州雍州（今山西、陕西、川北）的居民向南迁徙到湖北湖南的洞庭湖地区。二是中部并州、司州、豫州（今山西、河南）一带的居民大部分顺颍水淮水向东

南迁徙到豫南、皖北、皖南一带，再转入赣北地区，也有小部分向东迁徙到苏北地区。三是东部青州、徐州(今山东、苏北)一带的居民沿海南下迁徙到江苏长江北岸和南岸太湖地区，其间也汇入了上述从司州、豫州一带南下的小部分居民。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所以按第三条路线南迁的中原居民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区。江东地区经过孙吴近百年的开发，经济富庶，人口众多。因此中原居民的大量进入，不免会引起和当地豪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在提到这一问题时说，为了维持东晋王朝政权的稳定，已经迁人的中原居民就再次大批南迁，"以王谢为首的北来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到温、台一带，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另据《三山志》记载："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入闽者八族。"所说八族，除林、黄、陈、郑外，还有詹、丘、何、胡四姓。由此看来，东晋以后从吴地进入闽地的汉族居民，实际上主要是中原居民，而不是吴人。这一史实，张光宇认为对说明吴闽两方言的关系颇具关键性。

以上进入古代闽方言区的中原的和吴地的居民，使闽地人口迅速增加，行政区因此也不断增设。从东吴时的建安郡开始，增设的有西晋的晋安郡(福州)，梁时的梁安郡(南安郡)，陈时的义安郡(潮州)，唐代的漳州郡。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扩散，闽方言也得以形成和发展。

根据上述史实，东晋南朝时闽方言区的汉族居民主要是从江浙方向进入的。但由于他们中居多数的不是吴地的原居民，而是西晋时南下的中原居民，带入闽地的应当主要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方言，而不是吴语。不过中原居民带入闽地的中原方言在经过吴地时也吸收了吴语的成分，进入闽地后又吸收了闽越语的成分。应该说，闽方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唐代以后还不断有中原居民进入闽地，从而继续给闽方言以影响。)因为其中有吴语的成分，所以现代闽方言和吴方言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但

闽方言并不是中古吴语的继承者。现代闽方言和吴方言各自的重要语音特点——如古浊声母的不同音值，作为早期的历史性语音标准，应该很早就有所表现。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提到：“钟独佛曾说唐时已有‘福佬’之称，这也许可以作为唐代渐已形成闽方言的一个旁证。”

## （三）晋语的设立

### 1. 晋语的概念

近五十年来，在讨论汉语方言分区问题时，先后有三次提到晋语。这三个晋语的概念不完全相同。

最早提出晋语的是英国学者富励士（R. Forrest）。1948 年他在《汉语》（The Chinese Language）一书中以晋语指称分布在我国西北甘肃东部、山西和陕西一带的方言。这个晋语具有下列语音特点：

（1）鼻音声母有失去鼻音成分的倾向：m, n, ŋ → $m^b$, $n^d$, $ŋ^g$，如文水“母”꜂$m^b$u；

（2）有入声，收-ʔ 尾，如太原“麦”mieʔ꜇；

（3）塞音塞擦音声母的送气成分强烈，如兰州“皮”꜁pʻei；

（4）鼻音尾韵失落韵尾后转为鼻化韵，如太原“炭”tʻæ̃꜄，“桑”꜀sɔ̃；

（5）知照组合口韵字声母转为唇齿音声母，如西安“猪”꜀pfu，“出”꜀pfʻu，“水”꜂fei。

富励士根据以上特点把晋语从北方话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方言。他曾说明，他把这个方言叫做“晋语”，完全是出于历史的兴趣，（他所说的晋语的分布地区和春秋时秦晋两国的疆域相近）如果从共时的语音特点看，晋语上述各项特点中实际上只有第

二项"有入声"是可以作为同言线的。

以后，1976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晋语诸方言的比较研究》一书中也提出了晋语。这个晋语中的"晋"是山西省的别称，晋语即指山西省的方言，因此不牵涉到方言分区的问题。不过他所研究的方言还包括河北的崇礼、尚义方言，表明他认为河北西北部的方言和山西方言相近。

最近一次提出晋语是在80年代以后。当时全国各地正普遍开展地方志的编写工作，省、市、县各级纷纷成立地方志办公室负责这项工作。地方志包含有方言志的内容。编写方言志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方言的调查研究。山西省是这方面成绩突出的省份之一。调查研究增加了人们对方言的了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方言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晋语的概念。

1985年，李荣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一文中按入声字声调的分派情况把官话方言分成七个次方言，(1989年《汉语方言的分区》中又改变为八个)把晋语从官话方言中独立出来，用来"指山西省以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所说毗连地区，包括陕北、内蒙古西南部、河北西北部和沿太行山东麓地带以及河南北部等广大地区。

1986年侯精一《晋语的分区(稿)》指出这一晋语有如下五个特点：

(1)有入声，如太原"壁"pieʔ꜆，"拔"paʔ꜆；

(2)有一组鼻音尾韵əŋ iŋ uəŋ yŋ，如太原"根庚"꜀kəŋ，"新星"꜀ɕiŋ，"魂红"꜀xuəŋ，"群穷"꜀tɕʻyŋ；

(3)有词头"圪"，如吴堡"圪洞"kɤʔ꜆ tuŋ꜄；

(4)词尾"子"读入声韵，如太原tsəʔ꜆，某些方言中则有变韵，如获嘉"茄"꜁tɕʻiɛ →"茄子"꜁tɕʻio；

(5)有分音词，如平遥"摆"꜂pæ$^{53}$→pʌʔ$_{35}^{24}$꜂læ$^{53}$。

1988年刘育林《陕北方言略说》指出晋语四项特点，和侯文

(1)(2)(3)(5)相同。1996年温端政《开掘"山西方言"的语言宝藏——答山西日报记者问》一文提出两项特点，和侯文(1)(3)(5)相同。

上述晋语的特点涉及语音和构词法。几次介绍中特点的数量递减，显然是去粗存精的结果。

**2.有关晋语归属的讨论**

把"山西省以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划为晋语，和富励士内部混杂的晋语相比，显然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但是这一晋语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众多方言工作者的异议。这首先是因为晋语在方言、次方言等层级上的安排过高。上述入声和阳声韵等语音的特点都属晚期的历史性音变，构词法的特点则缺乏足够的重要性，要依靠这些特点把晋语从官话方言中分离出来处理成独立的方言，说服力是不够的。其次，江淮方言有入声(入声韵和入声调)而留在官话方言中，四川省不少方言有入声(入声调)也留在西南官话中，晋语有入声(入声调和入声韵)却从官话方言中分出，这在方言分区原则的掌握上存在标准相同而处理不同的矛盾。第三，山西西南部晋南方言具有晋语的大部分重要特点，某些特点的表现还极为典型，但仅仅因为没有入声就被划入其他官话方言，这不能不损害晋语本身的完整。第四，还有一些方言(如陕北延安、延长、甘泉)因不同年龄人口音中有无入声的情况不一，致使归属意见也不同，而如果把有入声的老年人口音归入晋语，没有入声的年轻人口音归入其他官话方言，又显然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处理。以上都说明过分强调某一晚期历史性语音标准的不妥。在这种情况下，1991年贺巍《汉语方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一文指出：今后必须继续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是，"晋语主要特点是有入声，与江淮官话的特点'古入声今读入声'相比，在分区的标准上没有明显的差别。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其他特点把两个区的方言区别开来。"这表明入声不能作为晋语独立的依据已经成为一般的共识。

总的看来，晋语的确具有相当多的特点。除上文所述，还有两点值得一提：

(1)某些方言保持古一二等韵的分别，如文水话：

孩一 ꜀xe≠鞋二 ꜀xai　　高一 ꜀kəi≠胶二 ꜀tɕi

憾一 xen꜄≠陷二 xaŋ꜄　　岸一 ŋen꜄≠雁二 ȵiaŋ꜄

(2)文白异读中梗宕江摄阳声韵字有元音尾韵和鼻音尾韵(或鼻化韵)的对应，如太原(南郊)话：

房 ꜀fõ文 ꜀fɤ白　棒 põ꜄文 pɤ꜄白　星 ꜀ɕiŋ文 ꜀ɕie白

这一语音特点在宋西夏文的转写中已经有所反映。

但是晋语的主要特点还是和官话一致的。1955 年丁声树、李荣《汉语方言调查》中列举官话方言的共同点是：

(1)古浊声母清化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2)古-m 韵尾并入-n 韵尾，

(3)多数地区没有入声，少数地区有入声。

这些既明确，又有一定包容度的语音标准至今没有过时。按这些标准来衡量，只有(1)在山西中部南部有不同情况，尽管文读层还是一致的。总的来看，晋语应该留在官话方言中，同时晋南方言也应该留在晋语中。换句话说，晋语应该降低一个层级，由一个独立于官话的方言，改变成官话方言中一个具有较多古老特点的次方言。这样的处理将是符合实际的。

##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

陈昌仪:《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清华学报》新 14 卷 1、2 期,1982;《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
《论官话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语所集刊》第五十八本一分,1987;《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
《吴语中的闽语成分》,《史语所集刊》第五十九本一分,1988;《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
《书评:〈中国语言地图集〉》,《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1 卷 1 期,1996。
富励士(R. Forrest):The Chinese Language(汉语),1948。
顾　黔:《泰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0.4。
《通泰方言声调的历史演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2。
贺　巍:《汉语方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语文研究》1991.3。
侯精一:《晋语的分区(稿)》,《方言》1986.4。
黄雪贞:《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方言》1981.2。
《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方言》1988.4。
《梅县方言的语音特点》,《方言》1992.4。
《梅县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调查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金有景:《义乌话里咸山两摄三四等字的分别》,《中国语文》1964.1。
《关于浙江方言中咸山两摄三四等字的分别》,《语言研究》1982.2。
李　荣:《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中国语文》1965.5。
《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1。
《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1989.4。

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林立芳:《梅县方言语法论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
梁金荣、高然、钟奇:《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1997.2。
刘勋宁:《再论汉语北方话的分区》,《中国语文》1995.6。
刘育林:《陕北方言略说》,《方言》1988.4。
鲁国尧:《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计数研究》30 期,1988。
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
《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语言与文化》(附录三),北大出版社,1950;语文出版社,1989。
罗杰瑞:《闽语里的古方言字》,《方言》1983.3。
《江山方言中类似闽语的成分》,《方言》1990.4。
《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
桥本万太郎(Hashimoto Mantaro):The Hakka Dialect(客家方言),Cambridge U.Press,1973。
《晋语诸方言之比较研究》,《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亚非文化研究》,12－14 别册,1976－1977。
萨加尔(Laurent Sagart):On Gan－Hakka(赣方言与客家话的关系),《清华学报》1988.1。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5 期,1935。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中华书局,1980。
温端政:《试论晋语的特点与归属》,《语文研究》1997.2。
颜　森:《江西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1。
俞　扬:《泰州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1.4。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第一版),1983(第二版)。

詹伯慧等:《汉语方言和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张光宇:《吴闽方言关系试论》,《中国语文》1993.3。
　　《论闽方言的形成》,《中国语文》1996.1。
　　《闽客方言史稿》,南天书局,1996。
张维耿:《客家话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张振兴:《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方言》1997.4。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7,1988。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五　原始闽语的构拟

## （一）构拟汉语原始方言的背景

汉语方言素来以纷繁复杂著称。闽方言作为汉语方言中最有特点的方言，自然特别为人们所注意。但人们对它的特点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1926 年)中利用现代汉语方言材料构拟中古音时，曾经指出闽南话具有的特殊性。在以后的《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1954 年)一书中，他更明确地说：现代汉语各方言"各自的声韵分类显示出它们(闽方言除外)全是从《切韵》系统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只有闽方言不是来自《切韵》，和《切韵》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这实际上也是认为汉语方言的历史比较以《切韵》为依据的一般做法不适用于闽方言。这和汉语音韵研究和汉语方言研究的一般看法完全不同。一般看法是，且不论《切韵》音系的性质如何，它和一般汉语方言都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能在总体上说明它们的声韵分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汉语方言差别很大，有些不同方言之间还难以通话。就可懂度来说，汉语某些方言之间的差别甚至超过了印欧语系某些语言之间的差别。这一情况引起了具有历史比较语言学传统的西方语

言学家的兴趣。而高本汉的观点所显示的历史比较的前景显然又令人鼓舞。6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语言学家提出,以《切韵》音系为依据来解释汉语东南诸方言的语音演变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都具有不同于《切韵》系统的历史来源,需要分别为这些方言构拟原始的语音形式。这一有关汉语方言历史研究的设想,后来被称为"普林斯顿假设"。1969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普林斯顿大学主持了名为"中国语言学工程"的研究工作,进行汉语原始方言的构拟。随后就陆续有成果发表出来,如贝乐德(W.L.Ballard)的原始吴语(1969年),余蔼芹(Anne-Yue Hashimoto)的原始粤语(1972年),罗杰瑞(Jerry Norman)的原始闽语(1973年)等。在他们的影响下,还有别的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如奥康纳(Kevin A.Oconnor)的原始客家话(1976年),和较晚我国严学宭等的原始客家话(1985年,1986年)。此外有的学者也做过构拟工作,但没有说明构拟的原则,如张琨的原始吴语(1972年),萨加尔(Laurent Sagart)的原始赣语(1986年)。这些工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在所有的构拟中,最全面,最深入,因而也最引人注目的,还要数罗杰瑞的原始闽语。

## (二)原始闽语构拟的内容

罗杰瑞构拟的原始闽语,见于他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闽语声调的演变》(1973年),《原始闽语的声母》(1974年)和《原始闽语的韵母》(1981年)。他的原始闽语大致和《切韵》同时,来源于晋时的江东方言,更早则可追溯到东汉扬雄《方言》中的吴楚方言。构拟运用历史比较法,直接利用现代闽方言的字音材料,按照音类的对应关系上推古音,不考虑汉语音韵研究已有的结论。所以这种构拟完全是一种新的尝试。构拟包括声韵调三个方面,以声母

作为重点。总的来说，原始闽语和《切韵》系统相比，除声调平上去入四声相同以外，声母韵母都有差别。原始闽语的声母系统尤其复杂，许多方面和一般认识相矛盾，所以论文发表后很快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本章将集中讨论原始闽语声母系统的有关问题。

下面先介绍原始闽语声母系统的内容。

罗杰瑞是以闽方言，特别是闽北话的字音材料作为构拟声母的依据的。他发现闽方言某些声母的分化缺乏语音条件，不假设这些声母的不同音值各有历史来源，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化。闽方言还有一些声母的不同音值和特定的调类有关，由于汉语方言中声调的演变常常以声母作为条件，也必需假设这些字音中的声母各有自己的历史来源。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得出的结论，就是古代闽方言应当有不同于《切韵》的声母系统。下面列举厦门、福州、建瓯、建阳、邵武等五个方言的五组例字（以平入声字为主，圆圈“ᵓ”是“第九调”，括弧里是不符规律的例字），各例字下附构拟的原始闽语声母：

| (1) | 爬 | 皮 | 瓶 | 茶 | 啼 | 长 |
|---|---|---|---|---|---|---|
| 厦门 | ꜁pe | ꜁pʻe | ꜁pan | ꜁te | ꜁tʻi | ꜁tŋ̍ |
| 福州 | ꜁pa | ꜁pʻuei | ꜁piŋ | ꜁ta | ꜁tʻie | ꜁touŋ |
| 建瓯 | pa꜄ | pʻyɛ꜄ | ꜂paiŋ | ta꜄ | tʻi꜄ | ꜂tɔŋ |
| 建阳 | ꜁pa | ꜁pʻu | ˳vaiŋ | ꜁ta | ꜁hie | ˳lɔŋ |
| 邵武 | ꜁pʻa | pʻeiᵓ | ꜁pʻen | ꜁tʻa | tʻiᵓ | ꜁tʻoŋ |
| | b | bʻ | -b | d | dʻ | -d |

| | 桥 | 骑 | 猴 |
|---|---|---|---|
| 厦门 | ꜁kio | ꜁kʻia | ꜁kau |
| 福州 | ꜁kyɔ | ꜁kʻie | ꜁kau |
| 建瓯 | kiau꜄ | (kyɛ꜅) | ꜂ke |
| 建阳 | ꜁kio | (˳i) | ˳eu |

| | | | |
|---|---|---|---|
| 邵武 | ꜀k'iau | (꜀k'i) | ꜀həu |
| | g | g' | -g |

(2)

| | 分 | 蜂 | 发 | 飞 | 刀 | 天 |
|---|---|---|---|---|---|---|
| 厦门 | ꜀pun | ꜀p'aŋ | puʔ꜆ | ꜀pe | ꜀to | ꜀t'ĩ |
| 福州 | ꜀puɔŋ | ꜀p'uŋ | puɔʔ꜆ | ꜀pui | ꜀to | ꜀t'ieŋ |
| 建瓯 | ꜀pyɪŋ | ꜀p'ɔŋ | ꜂puɛ | ꜂yɛ | ꜀tau | ꜀t'iɪŋ |
| 建阳 | ꜀puŋ | ꜀p'oŋ | ꜁voi | ꜁ye | ꜀tau | ꜀hieŋ |
| 邵武 | ꜀pən | ꜀p'iuŋ | ꜂p'ei | ꜂p'ei | ꜀tau | ꜀t'ien |
| | p | p' | -p | -p | t | t' |

| | 转 | 戴 | 角 | 苦 | 狗 |
|---|---|---|---|---|---|
| 厦门 | ꜂tŋ̍ | ti꜄ | kak꜆ | ꜂k'ɔ | ꜂kau |
| 福州 | ꜂tiɔŋ | tai꜄ | kœyʔ꜆ | ꜂k'u | ꜂kau |
| 建瓯 | ꜂tyɪŋ | tuɛ꜄ | ku꜆ | ꜂k'u | ꜂e |
| 建阳 | ꜂lyeŋ | ꜁lue | ko꜆ | ꜂k'o | ꜂eu |
| 邵武 | ꜂t'ien | t'ə꜅ | ko꜆ | ꜂k'u | (꜂kəu) |
| | -t | -t | k | k' | -k |

(3)

| | 酒 | 青 | 早 | 坐 | 床 | 谢 |
|---|---|---|---|---|---|---|
| 厦门 | ꜂tsiu | ꜀ts'ĩ | ꜂tsa | tse꜅ | ꜁ts'ŋ̍ | tsia꜅ |
| 福州 | ꜂tsieu | ꜀ts'aŋ | ꜂tsa | sœy꜅ | ꜁ts'ouŋ | sia꜅ |
| 建瓯 | ꜂tsiu | ꜀ts'aŋ | ꜂tsau | tso꜅ | ts'ɔŋ꜄ | tsia꜅ |
| 建阳 | ꜂tsiu | ꜀t'aŋ | ꜂lau | tsue꜅ | ꜁t'ɔŋ | lia꜅ |
| 邵武 | ꜂tsou | ꜀t'aŋ | ꜂t'au | ꜂t'oi | t'ɔŋ꜆ | t'ia꜅ |
| | ts | ts' | -ts | dz | dz' | -dz |

| | 纸 | 唱 | 指 | 石 | 树 | 蛇 |
|---|---|---|---|---|---|---|
| 厦门 | ᶜtsua | tsʻĩũᵓ | ᶜtsãĩ | tsioʔ꜆ | tsʻiuᵓ | ꜀tsua |
| 福州 | ᶜtsai | tsʻiɔŋᵓ | ᶜtsai | suɔʔ꜆ | tsʻieuᵓ | ꜀sie |
| 建瓯 | ᶜtsyɛ | tsʻiɔŋᵓ | ᶜi | tsiɔᵓ | tsʻiuᵓ | yɛᵓ |
| 建阳 | ᶜtsye | tsʻiɔŋᵓ | ᶜi | tsio꜆ | tsʻiuᵓ | ꜀ye |
| 邵武 | ᶜtɕi | tɕʻiɔŋᵓ | ᶜɕi | ɕioᵓ | tɕʻyᵓ | ꜀ɕi |
| | tɕ | tɕʻ | -tɕ | dʑ | dʑʻ | -dʑ |

(4)

| | 四 | 蝇 | 身 | 时 | 花 | 雨 |
|---|---|---|---|---|---|---|
| 厦门 | siᵓ | ꜀sin | ꜀sin | ꜀si | ꜀hue | hɔᵓ |
| 福州 | seiᵓ | ꜀siŋ | ꜀siŋ | ꜀si | ꜀hua | xuɔᵓ |
| 建瓯 | siᵓ | saiŋᵓ | ꜀seiŋ | siᵓ | ꜀xua | xyᵓ |
| 建阳 | soiᵓ | ꜀siɔŋ | ꜀siŋ | ꜀si | ꜀xua | xyᵓ |
| 邵武 | siᵓ | ꜀ɕi | ꜀ɕin | ꜀ɕi | ꜀fa | ᶜxy |
| | s | z | ɕ | ʑ | x | ɣ |

| | 哑 | 有 | 下 |
|---|---|---|---|
| 厦门 | ᶜe | uᵓ | eᵓ |
| 福州 | ᶜa | ouᵓ | aᵓ |
| 建瓯 | ᶜa | ᶜiu | a꜆ |
| 建阳 | ᶜa | ᶜiu | aᵓ, haᵓ |
| 邵武 | ᶜa | ᶜiou | ᶜxa |
| | ʔ | ø | ɦ |

(5)

| | 来 | 螺 | 梅 | 名 | 南 | 箬 |
|---|---|---|---|---|---|---|
| 厦门 | ᶜlai | ꜀le | ꜀bue | ꜀mĩã | ꜀lam | hioʔ꜆ |
| 福州 | ꜀li | ꜀løy | ꜀muei | ꜀miaŋ | ꜀naŋ | nuɔʔ꜆ |
| 建瓯 | lɛᵓ | soᵓ | moᵓ | miaŋᵓ | naŋᵓ | niɔ꜆ |

| | | | | | | |
|---|---|---|---|---|---|---|
| 建阳 | ꜁le | ꜀sui | ꜀mui | ꜁miaŋ | ꜀naŋ | nio꜇ |
| 邵武 | ꜁li | soi꜄ | ꜀mei | miaŋ꜄ | ꜀nan | nio꜄ |
| | l | l‘ | m | m‘ | n | n‘ |

| | 日 | 月 | 额 |
|---|---|---|---|
| 厦门 | dzit꜇ | geʔ꜇ | hiaʔ꜇ |
| 福州 | niʔ꜇ | ŋuɔʔ꜇ | ŋiaʔ꜇ |
| 建瓯 | ni꜇ | ŋyɛ꜇ | nia꜇ |
| 建阳 | noi꜇ | ŋye꜇ | nia꜇ |
| 邵武 | ni꜄ | ye꜄ | nia꜄ |
| | ȵ | ŋ | ŋ‘ |

罗杰瑞根据对以上各组例字的分析，构拟了如下的原始闽语声母系统(48)：

| | | | | | | | | | |
|---|---|---|---|---|---|---|---|---|---|
| p | t | ts | tɕ | k | b | d | dz | dʑ | g |
| p‘ | t‘ | ts‘ | tɕ‘ | k‘ | b‘ | d‘ | dz‘ | dʑ‘ | g‘ |
| -p | -t | -ts | -tɕ | -k | -b | -d | -dz | -dʑ | -g |
| s | ɕ | x | | ʔ | m | n | ȵ | ŋ | l |
| z | ʑ | ɣ | ɦ | j | m‘ | n‘ | | ŋ‘ | l‘ |

其中塞音塞擦音声母按清和浊、是否送气和是否弱化分成六组，擦音声母按清和浊分成两组，边鼻音声母按清和浊、是否送气分成两组。

为了显示原始闽语和《切韵》的声母系统的差别，下面列出《切韵》的声母：帮滂並明，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邪，知彻澄，庄初崇生俟，章昌船书禅日，见溪群疑，晓匣，影喻。三十六字母按音值重新排列如下：

| | | | | | | |
|---|---|---|---|---|---|---|
| p | t | ȶ | ts | tʃ | tɕ | k |
| p‘ | t‘ | ȶ‘ | ts‘ | tʃ‘ | tɕ‘ | k‘ |
| b | d | ȡ | dz | dʒ | dʑ | g |

s ʃ ɕ x ʔ

z ʒ ʑ ɣ j

m n ȵ ŋ l

和《切韵》的声母系统相比，原始闽语的声母系统具有下列主要特点：

(1)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分送气和不送气两组，

(2)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另有一组弱化音，

(3)清塞音塞擦音声母另有一组弱化音，

(4)牙喉音声母有对立两个浊擦音，

(5)边鼻音声母分浊不送气和清送气两组。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间声母的差别主要不在发音部位，而在发音方法，即原始闽语比起《切韵》系统要多出四组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不同的声母。

## (三)对原始闽语声母系统的讨论

罗杰瑞构拟的原始闽语声母系统具有很强的条件制约，显得无懈可击，引人入胜。构拟的方法，就历史比较法的原则来看，也属合理。但这一构拟实际上存在许多弱点。下面就语言材料的使用、构拟的方法、结论的推导等方面对构拟的各部分进行讨论。

**1. 弱化声母**

罗杰瑞发现，闽北建阳话浊平字“瓶”、“长”、“猴”(见第一组例字)等声母分别是 v、l、∅，音值特殊，而且调值也和阳平字不同。建瓯话中这些字的调值则和上声相同。v、l、∅ 和塞音塞擦音相比，具有弱化的性质。根据这些字的声母音值和调类分派，罗杰瑞认为它们的声母应该有不同于一般浊塞音声母的历史来源，即原始闽语应该有一组弱化的浊塞音。

建阳话全清字"发"、"飞"、"转"、"狗"(见第二组例字)的情况和上述"瓶"、"长"、"猴"等字相同,声母也是 v、l、ø 等,调值也和阳平不同。建瓯话中这些字的声调也是上声。而且在邵武话中平、上、入声字"飞"、"转"、"发"和去声字"戴"等声母变成送气音,平、入声字"飞"、"发"还读成上声。罗杰瑞认为这些字特殊的声母音值和调类分派也反映它们的声母有不同的来源,即原始闽语应该有一组弱化的清塞音。

建阳话建瓯话"早"、"指"、"谢"、"蛇"等清浊声母字(见第三组例字)声母的情况和上述"长"、"猴"、"转"、"狗"等字相似。因此原始闽语中还有弱化的清塞擦音和浊塞擦音。

以上构拟的弱化声母,古今音变过程可以归纳如下:

-p、-b → v,

-t、-d、-ts、-dz → l,

-k、-g、-tɕ、-dʑ → ø。

弱化声母产生的具体原因,罗杰瑞则从泰国的苗语(Petchabun)和瑶语(Chiengrai)中得到启示:

| 苗语 | 瑶语 | |
|---|---|---|
| $npe^{4}$ | $bua^{1}$ | (名字) |
| $ntau^{1}$ | $dia^{1}$ | (衣服) |

从比较中可以推断,瑶语 b-、d-是苗语 np-, nt-弱化的结果。罗杰瑞据此假设原始闽语弱化声母产生的原因,至少就塞音来说,可能是 p、b, t、d, k、g 等声母由于某种浊音前加成分的影响使后面的主要辅音经历了一个弱化过程(比如 np 变成-p, nb 变成-b),也可能是复辅音中某个成分失落引起了主要辅音的弱化(如像 mb-这样的结构失落了 m 而变成-b)。构拟中声母前面的"-"是用来表示这个还不能确定的引发弱化的浊音前加成分的。罗杰瑞认为上述声母的弱化过程也适用于清塞擦音。(他没有解释浊塞擦音的情况。)

不少学者不同意罗杰瑞对弱化声母的构拟和解释。比如余蔼芹认为声母弱化只不过是建阳等方言的一种特殊音变。李如龙认为古浊声母今读送气、不送气和弱化三分是“不同历史层次的反映”。平田昌司认为余说没有说明音变过程，李说没有涉及弱化清声母的问题。针对李说，平田昌司表示同意郑张尚芳主张浦城城关话端母字声母 l 来自 ʔd-的可能性，认为弱化清声母和浙南地区吴方言全清声母的紧喉作用（如庆元话“波”꜀ʔbo、“朵”ʿʔdo）可能有关。

可以认为，闽北建阳、崇安、政和、松溪、建瓯等方言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来源于古塞音塞擦音的浊擦音、流音等声母，就它们语音转变的性质来看，的确是一种弱化。按罗杰瑞的看法，v、l、∅ 应该是原始闽语的弱化声母演变的结果。但是把弱化现象的产生限制在闽方言的范围内，把时间上推到闽方言形成的早期，而且以浊音前加成分的影响来解释，都和语言事实存在矛盾。实际上这种性质的弱化现象并不是闽方言特有的。历史上汉语中古时期普遍发生的从帮组声母中分化出非组声母（p、p‘ → f，b → v）的音变，就是这样性质的一种弱化，而这种音变只以合口三等韵为条件，并没有浊音前加成分的介入。至少就中古汉语来说，帮组声母没有这种前加成分，是音韵学界的共识。这种弱化声母也不只发生在早期。从目前的情况看，p、b，t、d，k、g → v、l、∅ 这样的音变也见于闽北话以外的许多现代方言，从音类的对应判断，明显是《切韵》以后、近期产生的音变。例如：

（1）福州：p、p‘，t、t‘，k、k‘→β、l、∅。如：枇杷 pi$^{32}_{31}$ βa$^{52}$（←p），土匪 t‘u$^{31}_{24}$ ʒi$^{31}$（←p‘），戏台 xie$^{213}_{44}$ lai$^{52}$（←t），课程 k‘uɔ$^{213}_{44}$ liaŋ$^{52}$（←t‘），米缸 mi$^{31}_{21}$ ouŋ$^{44}$（←k），布裤 puɔ$^{213}_{52}$ ou$^{213}$（←k‘）。

（2）江西永新：p、p‘，t、t‘，k、k‘→v、l、∅～v。如把——刀 ʿva（←p），步——跳 vuʔ（←p‘），点——水 ʿliã（←t），团——人 ꜀lõ（←t‘），间——房 ꜀ã（←k），口——水 ʿœy（←k‘），个——人 voʔ（←k），块——布 vaiʔ

(←k‘)。

(3)湖南泸溪(乡话):並,定→f、l,如皮₍fɔ,大 ly²。

(4)福建浦城(城关):端、知→l,如多₍lo,昼 liao⁾白。

(5)湖南益阳(桃江板溪、大栗港):定、澄→l,如大 lai²,绸₍lou。

(6)湖北崇阳(天城镇):b‘～β,d‘～l‘,∅～w。如:盘₍b‘uɤ～₍βuɤ,道 d‘ao²～l‘ao²,群₍uin～₍win。

(7)安徽铜陵:並、定、群→v、r、ɣ,如排₍væ,独 ro₎,共 ɣom⁾。

上述各方言中的声母弱化现象,大致是唇音变成 v 或 β,舌尖音变成 l,舌根音变成 ∅,音变结果和建阳话的 v、l、∅ 基本相同。只不过是这些音变的范围存在差异。其中(1)是语流音变,以前字韵母阴声韵和 ʔ 尾韵作为音变条件。(2)也是语流音变,但范围较小,只发生在口语常用的数量名结构的量词音节上。当然,语流音变的性质和历史演变不同,但发音机制是相同的。自(3)以下不属于语流音变的范围,而是声母自身的演变。其中(3)的並定二母除弱化声母外,还演变成其他声母,如並母:盆₍bɛ,鼻 pi⁾,排₍p‘ɔ,定母:提₍di,头₍ta,道⁽t‘aɔ,桃₍naɔ,藤₍dzeŋ 等。(4)的端母字声母都是 l,知母字声母 l 则限于白读音,如:昼 tciu⁾文 liao⁾白。(5)的定澄二母字声母大多是 l。(4)(5)的唇音、舌根音声母没有这种音变。(6)的並滂、定透、群溪各有一个声母,但都有弱化音和非弱化音作为音位的自由变体。(7)的三个声母各只有一个弱化音的音值,和建阳话情况相似。以上各方言声母弱化的原因不尽相同,范围和程度也有差别,自(1)至(7)还可以看作是一个逐渐加深的发展过程。根据这些方言的情况来看,闽北话声母的弱化完全可能也是近期才产生的音变,不需要归因于原始闽语的弱化声母。

但尽管如此,闽北话弱化声母产生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说明。而这必须联系"第九调"的问题来分析。

**2."第九调"**

汉语方言声调的演变常常以声母作为分化条件。建阳话浊平

字有两个调，调值和其他调类都不相同，其中之一又和弱化声母联系在一起。罗杰端把这个和弱化声母联系在一起的声调定为四声八调系统以外的“第九调”，把浊平字的另一个声调定为阳平调。

不过建阳话和其他闽北话中一个古调类有几个调值的现象并不限于浊平字，只不过各个调值都在四声八调的范围之内，不存在必需处理成第九调等的问题。如果认为这些同一古调类的不同调值都是由于古声母的不同造成的，那么原始闽语的声母显然还应该更多一些。但实际上这些普遍存在的一个古调类有多个调值的现象是可以从方言中存在声调层次这一角度去理解的。

如果把闽北话中一个古调类具有的几个调值，即声调的层次展开，就有可能透过表面的现象找出深层中的调类变化规律。张琨在《〈建州八音〉的声调》(1988 年)一文中曾对清林端材编《建州八音字义便览》(1795 年)一书所收字音的声调层次做过归纳。这一声调层次和目前闽北话的实际情况出入不大。现在把他归纳的声调层次列在下面，并附上建瓯话的例字：

| | | |
|---|---|---|
| 清平 | 平—上 | 飞꜀xi ꜂yɛ |
| 浊平 | 阴去—上 | 啼 t'i꜄ ꜂tai |
| 清上 | 上 | 保꜂pau |
| 次浊上 | 上—阳入—阳去 | 痒꜂iɔŋ tsiɔŋ꜇，蚁 ŋi꜅ ŋyɛ꜇ |
| 全浊上 | 阳入—阳去—阴去 | 柱 tsy꜇ t'iu꜅，靖 tseiŋ꜅ tsaŋ꜇，翰 xuɪŋ꜄ |
| 清去 | 阴去 | 晏 yɪŋ꜄ |
| 次浊去 | 阳去—阴去 | 亮 liɔŋ꜅，案 uaŋ꜄ |
| 全浊去 | 阳去—阳入—阴去 | 状 tsɔŋ꜅ tsɔŋ꜇，郡 kœyŋ꜄ |
| 清入 | 阴入—上 | 刷 so꜆，发꜂puɛ |
| 次浊入 | 阳入—阴入 | 栗 li꜆ lɛ꜇ |
| 全浊入 | 阳入—阳去—阴入 | 实 si꜆ i꜇，服 xu꜆ xu꜅，蝶 tiɛ꜇ ta꜅ |

从上述情况可见，建瓯话清浊声母字的声调大多有调类分化合流

所形成的不同层次。其中浊声母字的声调之间有下列几种主要的分化合流现象：

(1)浊平分化，

(2)浊上和浊去合流，

(3)浊上和浊入合流，

(4)全浊入和全浊去合流。

对建阳话声调作同样的处理，也可以归纳出大同小异的层次，和建瓯话的声调相对应。下面列出两方言对应的声调层次（下加括号的是没有处理成独立调类的调值）：

| | 建瓯 | 建阳 |
|---|---|---|
| 清　平 | 54<br>(21) | 53<br>(21) |
| 浊　平 | $\underset{\cdot}{(22)}$<br>$(\underline{21})$ | $\underset{\cdot}{\underline{334}}$<br>$\underline{41}$ |
| 清　上 | 21 | 21 |
| 次浊上 | (21)<br>(42) | (21)<br>(332) |
| 全浊上 | $(\underline{42})$<br>$\underset{\cdot}{(44)}$ | $(\underset{\cdot}{\underline{332}})$ |
| 清　去 | 22 | 332 |
| 次浊去 | (44) | (43) |
| 全浊去 | $\underset{\cdot}{\underline{44}}$<br>(42) | $\underset{\cdot}{\underline{43}}$ |
| 清　入 | 24<br>(21) | 214 |
| 次浊入 | (42) | (4) |
| 全浊入 | $\underline{42}$<br>$\underset{\cdot}{(44)}$ | $\underset{\cdot}{\underline{4}}$ |

其中建阳话浊平字分化和次浊上字归清上的情况和建瓯话相同，但全浊上次浊上和清去合流的情况不同。再比较两个方言的浊平字，还可见建瓯话原来的两个调值也有一个是超出四声八调系统之外的，两调并入上声和阴去只是后来调值变化的结果。另外，通过声调层次的展开，还可以发现某些声母的特殊音值（如弱化声母和来自来母的s）的确和某些声调层次存在联系（上表下加"—"表示弱化声母，"·"指来母特殊音值s）。如果排除方言中声调层次和不同古声母来源相联系的设想，则可以考虑这一层次是否是由

外来影响造成的。比如,既然闽北话声调中某些层次和弱化声母相联系,而弱化声母主要由浊音变来,那么这种外来影响也许会是由邻近具有浊声母的方言借字进入所造成的。浦城南郊石陂话属于闽北话,但部分古浊声母字声母现在仍然是浊音。郑张尚芳在《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1985 年)一文中认为这是相邻吴方言影响的结果。平田昌司还进一步推测吴方言的影响也是"第九调"产生的原因。下面再列出石陂话和建瓯、建阳方言对应的声调层次:

| | 建瓯 | 建阳 | 石陂 |
|---|---|---|---|
| 清平 | 54<br>(21) | 53<br>(21) | 51<br>(21) |
| 浊平 | (22)<br>($\underline{21}$) | $\underline{334}$<br>$\underline{41}$ | (33)<br>$\underline{31}$ |
| 清上 | 21 | 21 | 21 |
| 浊上 | ($\underline{42}$)<br>(44) | ($\underline{332}$) | (51)<br>($\underline{33}$) |
| 清去 | 22 | 332 | 33 |
| 浊去 | $\underline{44}$<br>(42) | $\underline{43}$ | $\underline{45}$<br>(32) |
| 清入 | 24 | 214 | 213 |
| 浊入 | $\underline{42}$<br>(44) | $\underline{4}$ | $\underline{32}$ |

从上表可见,建瓯、建阳方言和石陂话的声调层次,特别是建阳话弱化声母字和石陂话浊声母字的声调层次,基本上是对应的。

为了便于观察古浊声母和声调层次的关系,下面再列出石陂、建阳、建瓯等方言不同声调中古浊声母字的读音:

| | | 石陂 | 建阳 | 建瓯 |
|---|---|---|---|---|
| 平 | 拳 | kyŋᵓ$^{33}$ | ꜀kyeiŋ$^{334}$ | kyɪŋᵓ$^{22}$ |
| | 行 | ꜀giaŋ$^{31}$ | ꜁ɦiaŋ$^{41}$ | ᶜkiaŋ$^{21}$ |

| | | | | |
|---|---|---|---|---|
| 上 | 柱 | ꜀t‘iu$^{51}$ | hiuˀ$^{332}$ | t‘iuˀ$^{44}$ |
| | 道 | dɔˀ$^{33}$ | lauˀ$^{332}$ | tau꜆$^{42}$ |
| 去 | 鼻～子 | p‘iˀ$^{45}$ | p‘ɔiˀ$^{43}$ | p‘iˀ$^{44}$ |
| | 步 | buˀ$^{45}$ | voˀ$^{43}$ | piɔˀ$^{44}$ |
| 入 | 直 | teʔ$^{32}$ | teʔ$^{4}$ | tɛˀ$^{44}$ |
| | 毒 | duʔ$^{32}$ | lɔʔ$^{4}$ | tuʔ$^{42}$ |

表中一部分古浊声母字(拳柱鼻直)在三个方言中都读清声母,和一般闽方言古浊声母字清化后的情况相同,可以认为是闽方言原有的字音。另一部分古浊声母字(行道步毒)的声母石陂话是浊声母,建阳话是弱化声母、建瓯话基本上是清声母,在建阳话中调类还出现了超出四声八调范围的"第九调"。综合三个方言的情况来看,这部分字音应该是在闽方言的古浊声母清化以后从保持古浊声母浊音音值的吴方言借入的。借字字音中浊音和闽方言已经没有浊音的声母系统无法协调,因而需要新一轮的浊音清化,或至少浊塞音塞擦音的弱化。石陂处在闽北话的北缘,紧邻吴方言区,因此能较长时期保持这些借字声母的浊音音值,没有清化。而在离吴方言区稍远的方言中,浊音音值就发生了变化,其中建瓯话已经基本上变成清声母,建阳话则变成了弱化声母。由此可见,弱化的确是一种特殊的音变。

闽北话各地的"第九调"调值比较接近。如石陂 31,建阳 41,建瓯 21,崇安 22,政和 21,松溪 21,大多是一个不高的降调。闽北话各地原有古浊平字的调值也大多接近。如石陂 33,建阳 334,建瓯 22,崇安 33,政和 33,松溪 44,大多是一个中平调。"第九调"的调型调值不同于闽北话原有浊平字的调型调值,却和邻近吴方言浙南赣东地区一些方言中的古浊平字调型调值相近。如龙泉 211,庆元 52,云和 213,松阳 311,遂昌 311,庆丰 31,上饶 412,大多也是一个不高的降调。据此可以推测,闽北话从吴方言借入的

古浊平字，语音上没有按照对应规律进行折合，借字的浊声母和中降调都按原样接受了进来。由吴方言借入的浊平字调型调值既然和闽北话原有的古浊平字不同，又不能像其他调类的借字那样有机会按调值的近似情况并入其他调类（不过建瓯话的“第九调”在《建州八音》成书以前已经并入上声）。这样，建阳话中的古浊平字就有了并存的两个不同的调类，其中按吴方言调值借入的一个就成了超出四声八调范围的“第九调”。

**3. 浊塞音塞擦音声母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

闽方言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大部分字不送气，小部分字送气，相互对立。如厦门话：

蹄꜁te≠啼꜁t‘e

哪些字不送气，哪些字送气，各地大多一致。如“爬”、“茶”、“桥”、“坐”、“石”不送气，“皮”、“啼”、“骑”、“床”、“树”送气。（见第一、三组例字）罗杰瑞发现邵武话上述各字的声母一律送气，但声调分派不同：凡在其他闽方言中声母不送气的字，声调按一般调类分派规律演变，凡在其他闽方言中声母送气的字，古平、入声的今读入声，如“皮”p‘ei꜆，“贼”ts‘ə꜆，古去声的今读阴去，如“鼻”p‘i꜄。罗杰瑞认为邵武话这些字的声调特殊分化现象反映了声母的不同来源，因此原始闽语的浊塞音塞擦音应该有送气和不送气两组。

但是汉语其他方言中也存在古浊声母塞音塞擦音送气不送气两见的现象，而且可以用外方言的影响来解释。比如第二章所述四川“老湖广话”的永兴话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有送气不送气的对立，其中不送气音是方言原有的，送气音是四川官话影响的产物。又如徽州方言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大多数字送气，少数字不送气，送气和不送气也对立。例如休宁话（以定母平声字为例）：

题提蹄 te꜄≠啼 t‘e꜄

投 tiəu꜄≠头 t‘iəu꜄

弹 tɔ꜄≠檀坛 t‘ɔ꜄

填 ti:ɐˀ≠田 tʻi:ɐˀ

堂棠唐塘 tɑoˀ≠糖 tʻɑoˀ

腾誊 taˀ≠藤 tʻaˀ

铜桐筒童瞳 tænˀ≠同 tʻænˀ

清江永在《榕村〈等韵辨疑〉正误》一文中说："吾婺源人呼群、定、澄、並诸母字，离县治六十里以东达于休宁皆轻呼之，六十里以西达于饶皆重呼之。""轻呼"指不送气，"重呼"指送气。可见三百年前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休宁话都不送气，婺源以西的赣方言都送气。目前休宁话中出现的送气音，显然和赣方言的影响有关。

看来闽方言古浊声母塞音塞擦音部分字不送气、部分字送气的现象，可能也是相邻赣方言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闽方言原有的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字清化后不送气，送气音则是由赣方言借入的。当然，所受影响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比如在徽州方言各地，哪些字声母送气，哪些字声母不送气，不但和闽方言不都一致，而且内部一致性也较差。

如上所述，罗杰瑞假设原始闽语送气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字，在邵武话中平、入声归入声(清入)，去声归阴去，声调分派具有规律性。但这和实际情况存在不小差距。首先，古浊声母平、去、入声字声调变读的数量极少，以至也许难以看成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而同时，邵武话几乎所有调类、所有声母的字都有变读成入声(清入)的，不限于古浊平、入声字。如"巾"(清平)kin꜆，"饼"(清上)piaŋ꜆，"闭"(清去)pəi꜆，"蚁"(浊上)ni꜆，"避"(浊去)pʻi꜆。既然几乎所有调类清浊声母的字都可以变读入声，变读实际上就没有语音条件的限制。所以可以设想它其实不是一种历史音变，甚至也不是一种属于语音层面的变化。这就要考虑从其他途径寻求答案。

邵武地处闽西北边缘，隔武夷山和江西赣方言区的黎川相邻，两地有山口相通。黎川话有一种小称变调，有升变调(35)、降变调

(53)、高变调(5)三种调值，使用最多的是降变调。各种变调的语法功能没有很大差别，大多用在名词中表示小称、爱称，也用在动词中。万波《从邵武方言中几个语言特点的性质看其归属》(1996年)一文曾把黎川话小称变调的词语和邵武话变读入声(53)的词语加以比较，发现二者极其相似，而且黎川话表示小称的降变调和邵武话的入声调值也相同。例如：

| | 黎川 | 邵武 |
|---|---|---|
| 哥 | ꜀ko$^{22}_{35}$ | |
| 桃 | hou꜆$^{35}_{53}$ | t‘au꜆$^{53}$ |
| 虫 | t‘uŋ꜆$^{35}_{53}$ | t‘uŋ꜆$^{53}$ |
| 贼 | t‘ɛʔ꜆$^{3}_{5}$ | t‘ə꜆$^{53}$ |

这种表小称的降变调还可以在邻近其他一些方言中看到，如泰宁(同阴去51)、南城(31)、光泽(同入声41)。

实际上邵武话的变读入声也是小称变调。当然，它和黎川话的小称变调情况还不完全一样。首先，黎川话小称变调的调值分三种，邵武话则只有一种，调值和入声相同。其次，黎川话这类词语数量多，语法作用明显，而邵武话仅有少量存在，语法作用已经丧失，本地人已经不知道它们曾经是小称变调。这说明，邵武话的小称变调已经只有少量凝固的残存形式。由于小称变调是属于语法层面的音变，和语音的历史演变无关，因此不能作为构拟古音的依据。另外，从邵武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以及具有和黎川话相同的小称变调来看，完全可以作出邵武话不属于闽方言，而属于赣方言的结论。作为非闽方言的邵武话，并不能像罗杰瑞认为的那样反映"闽语独具一格的一些特点"。

综上所述，邵武话古浊声母字塞音塞擦音送气并变读入声，并不是原始闽语送气浊声母的演变结果，而是赣方言小称变调音变规律的表现。没有这种小称变调的闽方言广大地区，就不存在这

种变读现象。另外，邵武话上述情况还使人猜测，古浊声母塞音塞擦音的送气音可能主要是由赣方言通过闽西北的这一通道进入闽方言的。这是历史上闽赣两地间的交通要道。也许因为借字进入的途径比较单一，所以闽方言中古浊声母塞音塞擦音送气不送气的字有了较高的一致性。

4. **牙喉音中两个浊擦音的对立**

闽方言古匣母字和部分云母字声母相同，音值或是 x，或是 h。如厦门"豪"（匣）꜁ho，"远"（云）ᶜuan文 hŋ̍ᵋ白，福州"喉"꜁xɛu文 ꜁xɔ白，"雨"ᶜy文 xuɔᵋ白。但闽北建阳、崇安方言兼有 x、h 两个擦音声母。如建阳"下"（匣）xaᵓ文 aᵓ白 haᵓ白，"雨"（云）xyᵓ，其中"下"字的文白两读相互对立：

xaᵓ≠haᵓ

罗杰瑞认为，如果 x 和 h 同源，则缺乏分化条件，所以应该假设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来源。这就需要为原始闽语构拟两个牙喉部位的浊擦音 ɣ 和 ɦ。这是原始闽语中唯一的不同发音部位的声母构拟。从他所举的例字来看，ɣ 和《切韵》系统的云母和部分匣母相当，ɦ 和另一部分匣母相同。

不过从建阳、崇安方言的情况看，声母 x 来自晓匣母，声母 h 的来源则要复杂得多。以建阳话为例，h 声母大部分来自透定彻澄母，如：

透：他꜀ha、替 haiᵋ、听꜀hiaŋ、退 huiᵓ、炭 hueiŋᵓ

定：桃꜁hau、头꜁həu、啼꜁hie、桶ᶜhoŋ

彻：撑 haŋᵓ、趁 hɔiŋᵓ、超꜀hio、丑ᶜhiu、畅 hiɔŋᵓ

澄：澄꜁haiŋ、虫꜁hoŋ、杖 hiɔŋᵓ、程꜁hiaŋ

少数来自滂並母，如：

滂：帕 haᵓ、破 hɔiᵓ、品ᶜhɔiŋ、屁 hyᵓ

並：稗 haiᵋ、鼻 hɔiᵋ、皮疲꜁hui、被～子 huiᵓ

个别字还有其他来源，如"锄"（崇）꜁hy，"笼"（心）ᶜhieiŋ，"馊"꜀hiəu，

“隙”(溪)hia꜆,“下”(匣)ha꜅。由于云匣母是浊声母,以上对应中还需要排除清声母。但即使这样,建阳话 h 的来源也远比云匣母要多。

建阳话上述 h 声母字,根据历史来源和周围方言的情况考虑,极有可能原来都是送气塞音。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则可以认为是不同发音部位的送气塞音在建阳话中都变成了 h。就音变机制看,上述例字中,透定彻澄母字的声母可以认为是送气塞音 tʻ 丢失了闭塞成分转化成喉门擦音的,音变过程是 tʻ → h。(如果把 tʻ 写成 th,音变原因就更容易明白:th → h)滂並母字的声母也可以认为是 pʻ 丢失了闭塞成分而成的,音变过程是 pʻ → h。其他个别字的声母,根据周围方言的情况,如建瓯“锄”tʻy꜅、“馊”꜀tʻiu,邵武“筅”tʻien꜆,厦门“隙”kʻiaʔ꜇、“下”kʻe꜅,可以推测早期的建阳话同样也都是送气塞音,因此也是同一性质的音变结果:tʻ → h,kʻ → h。

据上所述,建阳话中的 h 都是送气塞音丢失闭塞成分这一特殊音变的结果。但要肯定建阳话“下”ha꜅的声母不是来自原始闽语的 ɦ,而是特殊音变的结果,还必需说明发生这种音变的原因。观察周围方言可以看到,赣方言区南部许多方言中存在送气塞音声母 tʻ 转变为 h 的现象,有的方言还因此产生了链移音变。下面列举临川、高安、黎川等方言的透定(开口一四等和合口)、彻澄(二三等)母字,并和邵武、建瓯、建阳等方言比较:

| | 临川 | 高安 | 黎川 | 邵武 | 建瓯 | 建阳 |
|---|---|---|---|---|---|---|
| 吞一 | ꜀hɛn | ꜀hɛn | ꜀hɛn | ꜀xon | ꜀tʻɔŋ | ꜀huŋ |
| 头一 | ꜁hɛu | ꜁hɛu | ꜁hɛu | ꜂xɛu | tʻe꜅ | ꜁həu |
| 踢四 | tʻiaʔ꜆ | tʻiak꜆ | hiaʔ꜆ | tʻɛ꜆ | tʻɛ꜆ | he꜆ |
| 啼四 | ꜁tʻi | ꜁tʻi | ꜁hi | tʻi꜆ | tʻi꜅ | ꜁hie |
| 腿合 | ꜂tʻuɔi | ꜂hɔi | ꜂hɔi | ꜂tʻei | ꜂tʻo | ꜂hui |

| | | | | | | |
|---|---|---|---|---|---|---|
| 团合 | ꜁hɔn | ꜁hɔn | ꜁hɔn | ꜁tʻon | ꜂tʻuŋ | |
| 拆二 | tsʻaʔ꜇ | tsʻak꜇ | tʻaʔ꜇ | tʻia꜇ | tʻia꜇ | hia꜇ |
| 澄二 | ꜁tsʻaŋ | | ꜁hɛŋ | tʻɛn꜇ | tʻaiŋ꜆ | ꜁haiŋ |
| 抽三 | ꜀tʻiu | ꜀tʻeu | ꜀tɕʻiəu | ꜀tʻou | ꜀tʻiu | ꜀hiu |
| 柱三 | tʻu꜆ | tsʻe꜆ | ꜂tɕʻy | ꜂tʻou | tʻiu꜆ | hiu꜆ |

从表中可以看出,透定母字声母 tʻ 在临川、高安方言今开口韵字中变成 h,在邵武话开口一等韵字中变成 x,在黎川话则今开齐合撮韵字中都变成 h。(要说明的是,这些方言中不送气的端母字声母 t 不发生音变,如黎川"多"꜀to。)彻澄母二等字声母在临川、高安方言中是塞擦音 tsʻ,在黎川、邵武方言中变成 tʻ(要说明的是,不送气的知母字声母仍是塞擦音不变,如"罩"tsau꜄);三等字声母在临川、高安、邵武方言中变成 tʻ(而且知母字声母也变成 t,如临川、高安"朝"꜀tɛu,邵武"猪"꜀ty),在黎川话中仍为塞擦音不变。彻澄母字声母由送气塞擦音变成 tʻ 是一种链式音变,即在透定母的 tʻ 变成 h 以后,为填补空格而发生的音变。由这一音变生成的 tʻ 就不再变成 h。(同样要说明的是,黎川话中不送气的塞擦音母声 ts 或 tɕ 也不变成 t,如"灾"(精)꜀tsai、"爪"(庄)꜂tsau,"展"(知)꜂tɕien、"执"(章)tɕip꜇。邵武话除知母字外,情况相同。)

赣方言的这一链移音变影响到了闽北话部分地区。建瓯话没有受到影响,tʻ 声母没有任何变化。建阳、崇安方言则受到了影响。由于闽方言中知组字还没有从端组中分化出来,端知组声母相同,因此当赣方言 tʻ→ h 音变的影响进入时,建阳话中的透定彻澄母字声母就一并发生了 tʻ → h 的音变。少数滂並母字和个别溪匣母字声母发生同样的变化,则是由 tʻ→ h 音变引起的 pʻ→ h 和 kʻ→ h 音变的结果。这是一种感染作用产生的变化,涉及的字很少,没有形成有规律的对应。

从以上情况来看,建阳、崇安方言个别匣母字的声母 h 并不是

原始闽语声母演变的结果，而应该是由赣方言某种音变规律影响造成的。就“下”ha꜄字来说，这个 h 不是由浊擦音演变而成，而是送气塞音 k' 特殊变化的结果。这个由送气塞音中的送气成分变成的声母是喉门音，和建阳、崇安方言原有的舌根音声母 x 发音部位不同，因此构成了对立。

**5. 次浊声母浊不送气音和清送气音的对立**

闽方言部分次浊字声母有特殊的音值。一是主要在闽北话中少数来母字声母为 s，如建瓯“卵”ᶜlua$_{文}$ soŋ꜄$_{白}$。二是闽南话中明、泥、日、疑母少数字声母为 h，如厦门“茅”(明)꜁hm̩、“耳”(日)hĩ$^{2}$ hĩ$^{2}$、“蚁”(疑)hĩã$^{2}$ hia$^{2}$，潮州“年”(泥)꜁hĩ。此外，上述次浊字的古平、入声字在邵武话中读入声(阴入)，如“猫”mau꜇、“目”mu꜇，去声字在福州话中读阴去，如“面”meiŋ꜄。罗杰瑞根据它们的声母音值和调类分派的特殊性，推断原始闽语中的边鼻音声母除浊不送气音 m、n、ȵ、ŋ、l 外，还有一组清送气音 m'、n'、ŋ'、l'，相互对立。下面分两部分讨论这一构拟。

(1)来母字的声母 s

来母字声母为 s 的现象多见于闽北话，少量也见于闽中话(如永安“癞”sua꜄，“链”sum꜄)，个别还见于闽南话(如泉州“濑”sua꜄)。但是这一现象也见于其他汉语方言。如湖南泸溪乡话：“炉”꜀ly、“来”꜁z(u)ɛ、“梨”꜁za、“漏”za꜄、“林”꜁dzɛ，来母字声母 l、z、dz，其中 z、dz 显然是边音擦音化的结果。据此可以推测，闽北话来母字的声母 s 也可能是同样音变的结果。至于闽北话这部分来母平、入声字在邵武话中读入声(阴入)，前文已经说过，这是一种小称变调。

泸溪乡话来母字的变化：l → z(dz)，是次浊音向浊擦音的变化。但罗杰瑞认为闽方言来母字的 s 是由送气成分发展来的，即按 l'→ s 的音变过程，由清边音直接变成清擦音，中间没有经过全浊音的阶段。不过就整个闽方言来看，次浊字虽然有读入阴调的

情况(如前述福州话个别去声字读阴去),但闽北话来母字并不存在这一现象。下面列出建瓯话来母 s 声母字:

平: 螺 suɛ꜄、螺䗍 so꜄、犁 sɛ꜄、芦 su꜄、雷 so꜄、篮 saŋ꜄、

鬃 saiŋ꜄、郎 soŋ꜄、聋 soŋ꜄、笼 saŋ꜄

上: 李 sɛ꜅、老 sɛ꜅、卵 soŋ꜅、两꜂soŋ、㝗 soŋ꜅

去: 露 su꜅

入: 力 sɛ꜅、笠 sɛ꜅

以上各字中仄声字读阳去(“㝗”、“两”二字例外,但“两”松溪 saŋ꜅仍属阳去),平声字读阴去。仄声字读阳去是古浊上、浊去、浊入调部分合流的结果。平声字读阴去,则是近期发生的阳平调和阴去调因调值相近而合并的结果,和声母清浊的情况无关。这样,建瓯话来母 s 声母字实际上只和阳调配合。就汉语声母清浊和声调阴阳的一般配合规律看,建瓯话来母 s 声母字既然只和阳调配合,它早期就应该曾经经历过浊声母 z 的的阶段,目前的清声母音值 s 只是后来浊音清化的结果。这样,建瓯话这部分来母字声母的音变过程就应该是:

$$l \rightarrow z \rightarrow s$$

即次浊音先变成浊擦音,再变成清擦音,音变过程的起点不是清送气的 l‘。这就说明,来母字的声母 s 是来母本身音变的结果,没有特殊的历史来源。

(2)明、泥、日、疑母字的声母 h

闽南话部分次浊的明、泥、日、疑母字鼻音声母变成 h,是一种由鼻辅音向口辅音的转化。鼻音声母气化后失去鼻音成分,就成为清擦音 h。闽南话次浊字鼻音声母也有变成浊塞音(如厦门“马”꜂be、“蜈”꜁gia)的。这也是一种鼻辅音向口辅音的转化。两种变化虽然结果各异,性质上却有共同点。

闽南话次浊母 h 声母字各地大致相同。以厦门话为例:

明:媒꜁hm̩、茅꜁hm̩

日：耳 hĩ² hi²、燃꜀hĩã、箬 hioʔ₂、肉 hɪk₂

疑：瓦 hia²、鱼渔꜀hi、艾 hĩã²、蚁 hĩã² hia²、岸 hũã²、砚 hĩ²、额 hiaʔ₂

又如潮阳话：

泥：年꜀hĩ

日：耳꜂hĩ、燃꜀hĩã、箬 hioʔ₂、辱 hiok₂

疑：瓦꜂hia、鱼渔꜀hu、艾 hĩã²、蚁꜂hia、岸 hũã²、颜꜀hĩã、额 hiaʔ₂

据李玉《平南闽南话的音韵特征及声母的古音痕迹》(1990年)一文所载，目前广西平南闽南话有一个特殊的鼻音声母 ŋ̊，如"叶"꜂ŋ̊io、"援"꜀ŋ̊uan、"嗯"ŋ̊ŋ²。声母 ŋ̊ 不同于 ŋ，也不同于 h，相互对立：

瓦(疑)ŋia²≠艾(疑)ŋ̊ia²≠械(晓)hia²

其中疑母字"瓦"的声母还没有变化，"艾"的声母则已经清化送气。因此，可以把 ŋ̊ 看作是由 ŋ 向 h 变化过程的中间阶段：

ŋ → ŋ̊ → h

这可以用来说明厦门、潮阳等闽南话次浊母字的 h 声母是怎样变来，以及其中某些阴声韵字为什么带有鼻化成分的。由 n 变 h 的情况可能相似：n → n̊ → h，也可能 n 先和 ŋ 合并：n → ŋ→ ŋ̊ → h。

罗杰瑞也认为闽南话次浊母字声母 h 是鼻音变化的结果。不过从现代方言的情况看，它不是原始闽语时期特殊声母演变的结果，而只是一种近期的鼻辅音向口辅音的音变(平南闽南话甚至还正在开始这一音变)。这一近期的音变，可能和闽方言中非汉语的底层有关。

**6. 原始闽语构拟失误原因的分析**

罗杰瑞关于原始闽语的构拟是历史比较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一次全面运用。构拟中，观察的细致，方法的精密，应属前所未

见。特别是对闽方言词语中语音层次的分析极具启发性。但即使这样，构拟仍未能避免失误。为此，有必要分析它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构拟工作没有事先鉴别所用的语言材料，区别字音所反映的语音变化是历史演变还是外来影响造成的。如第一章第二章所述，这两种语音变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可以说，原始闽语声母系统构拟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就在于把外方言影响引起的音变看成是闽方言自身演变的结果。特别是其中邵武话的语言材料在构拟中起了相当大的误导作用。不过这和构拟时材料不够丰富也有关。材料不足会限制视野，影响判断。

原因之二是构拟工作没有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由于对闽方言和《切韵》关系的否定，原始闽语的构拟没有考虑以《切韵》为中心的汉语音韵研究成果。《切韵》系统是构拟古音的重要依据。离开《切韵》的构拟，就有可能成为如张琨所说的“四不像”。前文提到原始闽语和《切韵》声母系统的差别主要不在发音部位而在发音方法，就是离开《切韵》构拟的结果之一。其实罗杰瑞本人对这一构拟也持怀疑态度。他曾说：“这样构拟的声母在每个发音部位都可以有八种不同的发音方法。看上去一种语言不大可能只就发音方法而论就有这么多不同。”但发音部位相同的声母要成为不同的语音条件，被赋予不同的发音方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陈蒲清：《益阳方言的边音声母》，《方言》1981.3。

陈章太:《邵武方言的入声》,《中国语文》1983.2。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
崔荣昌、李锡梅:《四川境内的"老湖广话"》,《方言》1986.3。
冯雪珍:《屯溪隆阜话》,《徽州师专学报》(哲社版)1991.2。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商务印书馆,1930。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1987。
江　永:《榕村〈等韵辨疑〉正误》,《音学辨微》(附录),《音韵学丛书》(初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
雷伯长:《说邵武方言》,《语言研究》1984.2。
李　荣:《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中国语文》1965.5。
李如龙:《闽西北方言"来"母字读 s-的研究》,《中国语文》1983.4。
《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的分析》,《语言研究》1985.1。
《建瓯话的声调》,《中国语文》1990.2。
李　玉:《平南闽南话的音韵特征及声母的古音痕迹》,《语言研究》1990.1
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
罗杰瑞(Jerry Norman):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CL 1.2, 1973;《闽语声调的演变》,张惠英译,《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CL 2.1, 1974;《原始闽方言的声母》,海牧译,《音韵学通讯》(4),1983。
《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方言》1979.4。
《闽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中国语文》1986.1。
《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
梅祖麟、罗杰瑞:《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 s 声字》,《清华学

报》新9卷1、2期,1971。
平田昌司:《闽北方言"第九调"的性质》,《方言》1988.1。
丘尚仁:《南城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991.1。
万　波:《从邵武方言的几个语言特点的性质看其归属》,《语言研究》1996.1
《赣语永新方言量词的清音浊化》,《语文研究》1996,3。
王福堂:《闽北方言弱化声母和"第九调"之我见》,《中国语文》1994.6。
王辅世:《湖南泸溪瓦乡话记音》,《语言研究》1982.1。
王洪君:《高安(�阳)方言调查字表》,1986。(未刊)
王太庆:《铜陵方言记略》,《方言》1983.2。
颜　森:《江西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1。
《黎川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余蔼芹(Anne－Yue Hashimoto):《古代中国语声母の音韵对立》(论古汉语声母的音韵对立),《中国语学》223期,1976。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袁毓林等:《崇阳(天城镇)方言调查字表》,1991。(未刊)
张光宇:《闽方言古次浊声母的白读h-和s-》,《中国语文》1989.4。
张　琨:《〈建州八音〉的声调》,《中国语文》1988.6
张盛裕:《潮阳声母与〈广韵〉声母的比较》(1—3),《方言》1982.1—3。
浙江省语言学会:《浙江吴语的分区》,《语言学年刊》第三期,1985。
郑张尚芳:《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方言》1985.1。

# 六　儿化韵

## (一)儿化韵的地区分布和语音形式

### 1. 儿化韵的地区分布

儿化韵是汉语方言中一种常见而又特殊的韵母。它是由合音(儿化)这一语流音变造成的。以北京话为例,“花”꜀xua 和“儿”ər 合音后成为꜀xuɐr,其中的 uɐr 就是儿化韵。

儿化韵见于大多数汉语方言,主要分布地区有三:(1)官话方言区,(2)相连的吴方言、徽州方言和赣方言地区,(3)粤方言区。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分布。如闽方言区福建大田后路话中也发现有儿化韵。

### 2. “儿”尾和儿化韵的语音形式

儿化韵的语音形式主要是由“儿”的语音形式决定的。就目前所知,方言中“儿”的语音形式大致有以下五种:

(1)卷舌元音,如北京꜁ɚ(꜁ər);

(2)平舌元音,零声母如洛阳꜁ɯ,扬州꜁a,建瓯ʻœ,梅县꜁i,鼻音声母如浙江松阳(西屏)꜁ȵie,广西桂平(木乐)꜁ȵi;

(3)鼻音声化韵,如休宁 n̩ʔ,温州꜁ŋ̍;

(4)边音声化韵,如杭州꜁ᵊl̩,山东章丘꜁l̩ᵊ,山西平定꜁ɭ̩;

(5)舌尖元音,如甘肃武山꜁zɿ(z̩)。

以上“儿”的几种语音形式，除第五种以外都可以合音构成儿化韵。这样，儿化韵的语音形式就有以下四种：

(1)卷舌元音尾韵，如前述北京“花儿”꜀xuɐr(←“花”꜀xua + “儿”ər)；

(2)平舌元音尾韵，如洛阳“兔儿”tʻuɯ˒(←“兔”tʻu˒ + “儿”ɯ)；

(3)鼻音尾韵和鼻化韵，如安徽休宁“饼儿”pan$^{35}$(←“饼”˓pa + “儿”n̩˒)，浙江平阳“刀儿”tœːŋ$^{24}$(←“刀”꜀tœ + “儿”꜁ŋ̍)，浙江金华“兔儿”˓tʻũ(←“兔”˓tʻu + “儿”꜁ŋ̍)；

(4)边音尾韵和边音声化韵，如四川南溪“娃儿”꜁uəl(←“娃”꜁ua + “儿”꜁l̩)，山西平定“梨儿”꜁lḷ(←“梨”꜁li + “儿”ḷ)。

以上儿化韵的语音形式，第一、二、四种多见于官话方言区，第三种多见于南方各方言区。

儿化韵具有和“儿”尾相同的语法功能，通常表示名词小称爱称等意义。方言中有的儿化韵还用作其他词类的构形标记，如北京“慢慢儿的”、“颠儿”之类。也有的儿化韵徒具形式而实际上并不包含语素“儿”。如北京“这儿”、“今儿”，其中的“儿”是“里”li、“日”ʐʅ 的语音讹变，写作“儿”仅仅是因为语音相同。本章的讨论将不包括这两类儿化韵。

## (二)儿化韵的性质

### 1. 儿化韵的特点和性质

儿化韵是由“儿”尾和前一语素合音而成的，它的特点是“儿”和前一语素两者共存于一个音节之中。如上例北京“花儿”꜀xuɐr，uɐr 中包含了语素“花”的韵母和“儿”尾。

儿化韵由于是由基本韵母和“儿”尾音变生成的，因此是一种

变韵，即儿化变韵，简称儿化韵。儿化韵作为变韵，具有和"儿"尾同样的辨义和构形功能。因此它属于语法层面，和属于语音层面的基本韵母具有不同的性质。

**2. 儿化韵和基本韵母的不同表现**

方言中基本韵母和"儿"尾可以生成整套的儿化韵。儿化韵生成后，具有和基本韵母不同的系统，二者在语音系统的内部关系和语音的变化方面都有不同的表现。

首先，它们的音位构成可能不同。如北京话以中元音为韵腹元音的基本韵母共七组：

| | | | | | |
|---|---|---|---|---|---|
| ɤ o | | ei | ou | ən | əŋ |
| | ie | | iou | i(ə)n | i(ə)ŋ |
| uo | | uei | | uən | uəŋ |
| | ye | | | y(ə)n | y(ə)ŋ |

韵腹元音 ɤ、o、e、ə 等因为语音环境的不同而形成部分互补。通常根据音近原则把其中的 ɤ、e、ə 归纳成一个音位，o 另成一个音位。这样，基本韵母中就有两个中元音音位。但由各组韵母儿化后生成的儿化韵却有不同的情况。以下列儿化词为例：

婆儿꜁p'or≠盆儿꜁p'ər(←꜁p'ən)

歌儿꜀kɤr≠根儿꜀kər(←꜀kən)

叶儿 iɛr꜄≠印儿 iər꜄(←in꜄)

除"婆儿"和"盆儿"对立外，"歌儿"和"根儿"、"叶儿"和"印儿"也形成对立。这样，在儿化韵中就有 ə、ɤ(或 e)、o 三个中元音音位，比基本韵母多出一个 ɤ 音位。这就造成北京话基本韵母和儿化韵中的中元音音位数量不同的情况。由于儿化韵和基本韵母元音音位的构成可能不同，如果把它们归入同一语音平面作为同类韵母看待，无疑会造成韵母系统中元音音位的混乱。

其次，儿化韵和基本韵母在演变速度上也常常表现出不同。一种情况是儿化韵的变化速度比基本韵母快。比如北京话半个多

世纪以来基本韵母 a、an、ai 各组的音值没有多少变化，但由它们生成的儿化韵却有一部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的 ar 组变成了 ɐr 组。如：

ar、iar、uar → ɐr、iɐr、uɐr　　杷儿、芽儿、瓜儿

ɐr、iɐr、uɐr、yɐr → ɐr、iɐr、uɐr、yɐr　　盘儿、沿儿、官儿、圈儿

ɐr、　uɐr → ɐr、　uɐr　　牌儿、　乖儿

变化前“杷儿”和“盘儿”、“牌儿”不同音，“芽儿”和“(帽)沿儿”不同音，“瓜儿”和“官儿”、“(乖)乖儿”不同音，变化后同音。

另一种情况是基本韵母变化的速度比儿化韵快。如浙江温岭话：

鸭 əʔ˒ → ɛ$^{51}$

佛 fɔʔ˒ → fɔn$^{51}$ 石佛…

戳 tɕ‘yoʔ˒ → tɕ‘yɔ̃$^{51}$

叔 ɕyoʔ˒ → ɕyuŋ$^{51}$

以上都是入声字，单字音“鸭”、“佛”同韵，“戳”、“叔”同韵，它们的儿化韵却不同韵。但既然儿化韵是由基本韵母生成的，那么，儿化韵在目前的不同，说明在它生成之初，基本韵母应该也是不同的。因此，目前“鸭”和“佛”、“戳”和“叔”单字音的韵母相同，应该是儿化韵生成后基本韵母变化的结果。这就是说，上述各单字音基本韵母的变化比儿化韵要快。

又如山东荣成成山话新派口音平上声字原 ian 韵母和 in 韵母合流，仅去声字保持区别。如：

斤＝间 ˏkin　林＝连 ˓lin　引＝染 ‘in

信 sinˀ≠线 sianˀ

但在儿化韵中各调字两类韵母都不相同。如：

斤儿˓kiɔr≠间儿˓kiɐr

琴儿˓k‘iər≠钳儿˓k‘iɐr

引儿‘iɔr≠染儿‘iɐr

信儿 siər˺≠线儿 siɐr˺

这同样说明基本韵母的变化发生在儿化韵形成以后，基本韵母的变化比儿化韵要快。

以上两种情况都说明，由于儿化韵和基本韵母变化速度不同，方言中目前的儿化韵和基本韵母并不一定处在同一时间平面上，彼此间的对应不一定是直接的，也不一定是稳定的，可能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如果把儿化韵和基本韵母归为一类，也会造成两类韵母关系上的混乱。

## (三)儿化韵的合音方式

**1. 拼合型儿化韵和融合性儿化韵**

儿化韵中"儿"尾和前一语素韵母合音的方式，就合音以后"儿"尾在韵母中的位置，"儿"尾在语音上是不是还能辨认着眼，可以分为拼合型和融合型两类。

拼合型儿化韵是指合音以后"儿"尾成为韵尾，或"儿"尾取代前一语素韵母的原韵尾，"儿"尾和韵腹元音前后拼合在一起，二者可以明显区分开来。如北京：

花꜀xua＋儿 ər˴ →花儿꜀xuɐr

环꜀xuan＋儿 ər˴ →环儿꜀xuɐr

"儿"尾在"花儿"中成为韵尾，在"环儿"中取代"环"꜀xuan 的原韵尾-n成为韵尾，居于音节尾，语音上明显可辨。

融合型儿化韵是指合音后"儿"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融合成另一语音形式，其中的"儿"尾无法再加辨认。如湖北鄂城话：

环꜀xuan＋儿 a˴ →环儿 xuæ²¹

从 uæ 中已经无法辨认出原来的"儿"尾 a˴。

不过这种分类只是从共时角度说的。从历时角度看，融合型

儿化韵往往是拼合型儿化韵进一步音变的结果。如宁波话：

猫꜁mɔ＋儿 n̩ →猫儿꜁mɛn →꜁mɛ

“猫”和“儿”合音后先生成拼合型儿化韵 ɛn，然后再变成融合型儿化韵 ɛ，音变过程可能是 ɛn → ɛ̃ → ɛ。

**2.“儿”尾在儿音节中位置的前移**

拼合型儿化韵中的“儿”尾通常处在韵腹元音后的韵尾位置。但在某些方言中，卷舌的“儿”在和前一语素合音的过程中，有摆脱音节内各音素线性排列的顺序，从韵尾位置向前方移动的情况。这是由于发音时的逆同化作用使卷舌动作提前发生的缘故。这样，儿音节中的声母也会带上卷舌色彩，甚至某些声母的音值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山东利津话儿音节中 t、t‘、n、ts、ts‘、s 声母带有闪音色彩，如：

刀儿꜀tɾɔr　　灾儿꜀tsɾɛr

天儿꜀t‘ɾɛr　　草儿꜂ts‘ɾɔr

脓儿꜀nuɾər　　丝儿꜀sɾer

齐撮口韵儿音节声母的闪音色彩则位于元音 i、y 后，如：

橛儿꜁tɕyɾər　　衣儿꜀iɾer

山东金乡话的儿音节中，除一般声母带有闪音色彩外，声母 ts、ts‘、s、z 还音变成卷舌音 tʂ、tʂ‘、ʂ、ʐ，如：

卒꜀tsu→（小）卒儿꜀tʂur

虫꜁ts‘uə̃→（小）虫儿꜁tʂ‘uə̃r

三꜀sã→（小）三儿꜀ʂãr

仁꜁zẽ→（杏）仁儿꜁ʐər

山西平定话绝大部分儿音节中的“儿”尾 ɭ 甚至自身也向前移动，成为声母的组成部分，韵母部分虽然还带有卷舌色彩（以音节末尾下加“r”表示），但不再带有“儿”尾。如：

把꜂pɑ→（刀）把儿꜂pɭA‸r

牌꜁p‘æɛ →牌儿꜁p‘ɭɐ‸r

门꜀mɤŋ →(后)门儿꜀mɭɤ̃ŋr

缝 fɤŋ꜄→(门)缝儿 fɭɤ̃ŋr꜄

盖 kæɛ꜄→盖儿 kɭɐr꜄

壳 k'ʌʔ꜆→壳儿 k'ɭʌr꜆

蛾꜀ŋɤ →蛾儿꜀ŋɭɤr

黄꜀xuɑŋ →(鸡蛋)黄儿꜀xɭuɑ̃ŋr

豆 tɤu꜄→豆儿 tɭɤur꜄

兔 t'u꜄→(小)兔儿 t'ɭur꜄

芦꜀lu →(葫)芦儿꜀lɭur

梨꜀li →梨儿꜀lɭ, ꜀lɭər

枣꜂tsɒɔ →枣儿꜂tsɭɒɔr

葱꜀ts'uɤŋ →(小)葱儿꜀ts'ɭuɤ̃ŋr

锁꜂suɤ →(小)锁儿꜂sɭuɤr

尖꜀tɕiæ̃ →尖儿꜀tsɭɐr

球꜀tɕ'iɤu →球儿꜀ts'ɭɤur

心꜀ɕiɤŋ →(菜)心儿꜀sɭɤ̃ŋr

窝꜀uɤ →(被)窝儿꜀ɭuɤr

芽꜀iɑ→(豆)芽儿꜀zɭɭʌr

鱼꜀y →鱼儿꜀zɭɭur

这样,除个别儿音节(如"梨儿"的第一读音)外,儿化实际上已经由韵母部分发展到了声母部分。

**3. 基本韵母对儿化韵的音值的特殊影响**

方言中基本韵母韵腹元音对合音后生成的儿化韵的音值可能产生特殊的影响。比如有的方言中不同的基本韵母可以生成不同韵尾的儿化韵。如山东寿光话基本韵母ɿ、ʅ、i、ei、uei、ẽ、iẽ、uẽ、yẽ生成的儿化韵,韵尾是卷舌边音ɭ,如:

丝(꜀sɿ)儿=塞(꜀sei)儿:꜀səɭ

诗(꜀ʂʅ)儿=色(꜀ʂei)儿=深(꜀ʂẽ)儿:꜀ʂəɭ

艺(iʾ)儿＝印(iẽʾ)儿：iɭʾ

鬼(ʿkuei)儿＝滚(ʿkuẽ)儿：ʿkuɭ

云(꜀yẽ)儿：꜀yɭ

其他基本韵母生成的儿化韵，韵尾是卷舌元音 ər，如：

"法"(꜀fa)儿：꜀fʌr

这是因为ɿ、ʅ、i、ei、ẽ 等基本韵母的韵腹元音都是前高元音或前半高元音，其他基本韵母的韵腹元音都是前中低元音或中元音、后元音。韵腹元音的不同舌位成为语音条件，造成了儿化韵的不同韵尾。

此外，也有的方言中同一基本韵母和"儿"尾合音后似乎生成两种不同语音形式的儿化韵。如山东临清话 aŋ、iaŋ、uaŋ 和 əŋ、iŋ、uŋ、yŋ 两组鼻尾韵生成的儿化韵分 A、B 两类，A 类韵腹元音鼻化，B 类不鼻化。如：

(1)A. ãr、iãr、uãr　(一)行儿、(照)相儿、(奖)状儿

　B. ar、iar、uar　(偏)方儿、(模)样儿、(蛋)黄儿

(2)A. ə̃r、iə̃r、uə̃r、yə̃r　棚儿、(小)兵儿、垅儿、(小狗)熊儿

　B. ər、iər、uər、yər　缝儿、病儿、(胡)同儿、(小)葱儿

不过 A、B 两类儿化韵的区别不取决于语音条件，而和语言环境有关：A 类用于郑重的交际场合、B 类多用于乡亲邻里间的交谈；旧有的词语多用 A 类，也用 B 类，新起的词语只用 A 类，不用 B 类。既然变化不取决于语音条件，可见它不一定是语音性的变化。

A、B 两类儿化韵的区别，在邻近方言中则表现为地域性的分歧。如聊城"尖儿"城区꜀tɕier，李海村꜀tɕiə̃r，因地而异；寿光"帮儿"、"风儿"城区 ãr、ɤr，北部 ʌr、ɤr，东南部 ãr、ɤ̃r，因地因韵而异。看来临清话 A、B 两类儿化韵虽然和使用场合有关而和本方言的地域无关，但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其中的一类是由外方言借入的，情况和字音中的文白异读相似。可以认为，临清话儿化韵的 A 类其实是新近借入的儿化韵读书音，B 类则是旧有的口语音。

# (四)儿化韵的形成

儿化韵变化缓慢,它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目前方言中见到的儿化韵实际上都只是这一渐进过程中某个片断的情况。但由于方言中儿化韵的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因此把这些片断联系起来,完全有可能综合成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儿化韵从形成、归并直到消亡的过程。下面分别介绍过程中的各个阶段。

**1.由“儿”尾向儿化韵的过渡**

儿化韵发展过程的初始,就是它的形成。这个阶段表现为由自成音节的“儿”尾向儿化韵的过渡。它是在语流音变的范围内,由“儿”尾和前一语素韵母合音的要求来推动的。合音要以自成音节的“儿”尾轻声化为条件。非轻声的“儿”尾不会引发儿化。而轻声的“儿”由于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音节,会和前面的语素构成“一个半音节”的语音单位,正是这种性质的语音单位容易发生合音。

方言中“儿”尾向儿化韵的过渡是通过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世代交替来完成的。比如北京房山老年人还在使用自成音节的“儿”尾,“树枝儿”说成 ʂu˒ ˛tʂʅ ɚ,年轻人则普遍使用儿化韵,“树枝儿”说成 ʂu˒ ˛tʂər。随着人事的变化,北京房山话自成音节的“儿”尾将会很快由儿化韵取代。

有的方言自成音节的“儿”尾和儿化韵两种语音形式会共存一段时期,不同年龄的社会成员可以使用任何一种语音形式,而不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如兰州话:

鸡儿 ˛tɕi$^{31}$ ɯ·～˛tɕiɯ$^{31}$

兔儿 t‘u˒$^{24}_{11}$ ɯ·～t‘uɯ˒$^{24}$

又如陕西延川话：

梨儿꜀li$^{353}$ ɚ$^{53}$～lir$^{343}$

兔儿 t‘u$^{53}$ ɚ$^{35}$～t‘ur$^{424}$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方言中自成音节的"儿"尾也终将被儿化韵所取代。

**2. 儿化韵合音中的不同步现象**

方言中不同基本韵母和"儿"尾的合音，可能有的先行，有的在后，不一定同步完成。这多少跟基本韵母的韵尾和"儿"尾二者的发音部位有关。以河北满城话为例，绝大多数基本韵母可以和卷舌的"儿"尾 ɚ 合音，如：

盘꜀p‘an＋儿 ɚ →盘儿꜀p‘er

但-u、-ŋ 尾韵母不能合音，如：

桃꜀t‘au＋儿 ɚ →桃儿꜀t‘au ɚ

虫꜀tʂ‘uŋ＋儿 ɚ →虫儿꜀tʂ‘uŋ ɚ

u 韵母则合音与否两可，如：

老母儿(月亮)꜂lau ꜂mu ɚ

母儿(母亲) ꜂mur

从合音的发音机制来看，所谓不能儿化，也可以说是不需要儿化。因为韵尾-u、-ŋ 等的发音部位偏后，"儿"尾卷舌动作涉及的部位偏前，-u、-ŋ 和 ɚ 发音时在部位上不存在矛盾，不会在发音动作上相互排挤。而韵尾-i、-n 和 ɚ 的发音部位都在前，发音时部位上相互矛盾，因此会产生排挤作用，ɚ 就在排挤中取代了-i、-n，造成合音。除 u 以外的其他单元音韵母，因为没有韵尾，便于 ɚ 进入，所以也容易合音。这一合音中发音机制遵循的原则，赵元任叫做"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

类似满城话的情况也见于其他一些方言。甚至北京话这样的所有基本韵母都可以合音的方言，-u、-ŋ 尾韵母和 u 韵母在合音中也表现出和满城话相似的特点：-u 韵尾保存了下来，-ŋ 韵尾转化

成鼻化成分后也得以保存。如：

桃꜀t'au＋儿 ɚ →桃儿꜀t'aur

缸꜀kaŋ＋儿 ɚ →缸儿꜀kõr

-u、-ŋ韵尾所以没有被“儿”尾取代，也是因为-u、-ŋ和 ɚ 的发音动作可以共存，这同样体现了“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原则。所谓“共存发音”是指两个发音动作的兼容，不是指合成一个发音动作。至于 u 韵母和 ɚ 的合音，则在发音上还有一个特点，即二者先后发音或同时发音两可，如：

肚ˋtu＋儿 ɚ →肚儿ˋtur～ˋ$tu_r$

因此可以认为，满城话和北京话中-u、-ŋ韵尾在合音中的表现实际上是同一音变过程的不同阶段，满城话反映了北京话的早期状态，北京话则预示了满城话的未来。

也有的方言基本韵母和“儿”尾合音的不同步，除-i、-n、-u、-ŋ尾韵母的情况和满城话相同外，包括 u 在内的单元音韵母还有复杂多样的表现。如河北定兴话单元音韵母和“儿”尾的合音有如下几种情况：

(1)a、ia、ua 和“儿”尾合音，构成一般的儿化韵；

(2)ɿ、ʅ、i、y 可以不合音，“儿”尾自成音节，也可以合音，构成一般的儿化韵；

(3)o、uo、ie、ye 和“儿”尾合音，构成另一种儿化韵；

(4)u、ɤ 可以不合音，“儿”尾自成音节，也可以合音，构成另一种儿化韵。

以上各单元音韵母是否可以合音成儿化韵有两种情况，儿化韵结构也有区别。所谓另一种儿化韵，其中韵腹和“儿”尾都保持各自合音前的音值，“儿”尾并不只是一个卷舌作用。例如：

碟儿 ꜀tieɚ$^{35}_{213}$

(卖)缺儿 ꜀tɕ'yeɚ$^{33}$

(喋)末儿 moɚ$^{314}$

(大家)伙儿 ˊxuoə$^{213}$

(打花)鼓儿 ku$^{213}_{21}$ ə~(大)鼓儿(书)kuə$^{213}$

蛾儿 ˌŋɣ$^{35}_{21}$ ə~(蚕)蛾儿 ˌŋɣə$^{35}_{213}$

其中阳平字("蛾")儿化后的声调还表明它实际上是合音前前字变调(21)和"儿"尾轻声(3)的加合。这些都说明这一类儿化韵韵腹和"儿"尾拼合的程度不如一般儿化韵紧密，而这显然和韵腹元音舌位的偏后偏中有关。

有的方言中基本韵母和"儿"尾能否合音还受韵母中韵腹元音和韵尾的双重影响。如湖北英山话绝大多数基本韵母不能和"儿"尾合音，如：

花ˌxua + 儿 ə → 花儿ˌxua ə

帽 mauˀ + 儿 ə → 帽儿 mauˀ ə

网ˊuaŋ + 儿 ə → 网儿ˊuaŋ ə

而-n 尾韵可以合音，如：

竿ˌkan + 儿 ə → 竿儿ˌkər

本ˊpən + 儿 ə → 本儿ˊpər

-i 尾韵中韵腹元音是低元音的可以合音，中元音的不能合音，如：

盖 kaiˀ + 儿 ə → 盖儿 kərˀ

杯ˌpəi + 儿 ə → 杯儿ˌpəi ə

这和-i 尾复元音中舌位低的韵腹元音容易和舌位高而前的韵尾相互吸引而发生复韵母的单元音化(如济南"杯"ˌpei，但"盖"kɛˀ)有关。这种容易单元音化的复元音韵母也容易和"儿"尾合音成儿化韵。

以上是一些方言中基本韵母和卷舌的"儿"尾合音不同步的情况。方言中基本韵母和平舌元音"儿"尾也有不能同步合音成儿化韵的。以湖北鄂城话为例，大部分基本韵母可以和"儿"尾 a· 合音。其中韵腹是后元音 ɑ、o 的单元音韵母合音成 a，如：

渣ˌtsɑ + 儿 a· → 渣儿ˌtsa

脚 tɕioɔ + 儿 a˞ →脚儿 tɕiaɔ

韵腹是低元音的复元音韵母(但不包括韵母 iau、ian)和-n 尾韵合音成 æ:

牌 ꜀p'ai + 儿 a˞ →牌儿 ꜀p'æ

梢 ꜀sau + 儿 a˞ →梢儿 ꜀sæ

环 ꜀xuan + 儿 a˞ →环儿 ꜀xuæ

韵尾是中元音的复元音韵母和-n 尾韵合音成 ɛ:

车 ꜀ts'ei + 儿 a˞ →车儿 ꜀ts'ɛ

酒 ꜂tɕiəu + 儿 a˞ →酒儿 ꜂tɕiɛ

裙 ꜀tɕ'yən + 儿 a˞ →裙儿 ꜀tɕ'yɛ

以上韵腹元音和韵尾的发音部位决定了儿化韵元音的舌位。但基本韵母是高元音的单元音韵母和所有-ŋ 尾韵不能合音,如:

鸡 ꜀tɕi + 儿 a˞ →鸡儿 ꜀tɕi a˞

树 ɕy꜄ + 儿 a˞ →树儿 ɕy꜄ a˞

缸 ꜀kaŋ + 儿 a˞ →缸儿 ꜀kaŋ a˞

棚 ꜀p'oŋ + 儿 a˞ →棚儿 ꜀p'oŋ a˞

这是由于高元音的单韵母和低元音的"儿"尾 a˞ 部位差别过大,不容易合音。而-ŋ 韵尾的发音部位偏后,和前元音的"儿"尾发音上不存在矛盾,不需要合音,原因和满城、北京方言相同。

从以上各方言的情况来看,方言中儿化韵开始形成时常常并不同步,然后才按语音条件先后到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也是语音渐变性的反映。由于不同步现象的存在,从"儿"尾向儿化韵过渡的过程中儿化韵数量扩展的情况,可以判断儿化韵形成时间的早晚。

## (五)儿化韵韵类的调整和归并

### 1.儿化韵生成时的调整和归并

方言中自成音节的"儿"尾向儿化韵的过渡完成以后,出现了大量成套的儿化韵。按理说,一个基本韵母应当可以生成一个不同于其他的儿化韵,如果基本韵母的韵腹元音各不相同的话。比如陕西延川话共有 40 个基本韵母,除去 ɚ 已经是卷舌元音,不存在儿化的问题外,其他 39 个基本韵母可以生成 39 个儿化韵:

ɿ ʅ ɥ ʮ i u → ɿər ʅər ɥr ʮr iər ur

a ia ua ya → ɐr iɐr uɐr yɐr

ɤ uɤ → ɤr uɤr

iᴇ yᴇ → iᴇr yᴇr

ɔ iɔ → ɔr iɔr

ai uai → ɛər uɛər

ɘi uɘi → ɘr uɘr

ɤɯ iɤɯ → ɤɯr iɤɯr

æ̃ uæ̃ → æ̃r uæ̃r

ɯɛ̃ iɯɛ̃ uɯɛ̃ yɯɛ̃ → ɯɛ̃r iɯɛ̃r uɯɛ̃r yɯɛ̃r

ɑɣ̃ iɑɣ̃ uɑɣ̃ → ɑɣ̃r iɑɣ̃r uɑɣ̃r

əɣ̃ iəɣ̃ uəɣ̃ yəɣ̃ → əɣ̃r iəɣ̃r uəɣ̃r yəɣ̃r

ɜʔ iɜʔ uɜʔ yɜʔ → ɜr iɜr uɜr yɜr

像延川话这样每一个基本韵母都能生成一个儿化韵,而且所有的儿化韵都不相同,也许是方言中应有的情况。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多数方言中的情况是几个基本韵母共有一个儿化韵,儿化韵要少于基本韵母。下面列出若干方言基本韵母(不包括 ɚ)和儿化韵的数量:

太原 35—29

济南 37—28

北京 39—26

山东德州 36—22

陕西志丹 54—19

大同 36—14

山西忻州 46—11

山西长治 35—8

成都 35—4

这些方言中儿化韵的数量大约是基本韵母的九分之一至五分之四不等。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儿化韵在生成时和生成后都要进行韵类的调整和归并。

儿化韵的生成时的调整和归并,是因为儿化韵韵尾的单一化减少了韵腹元音相同或相近的不同韵母存在的条件。不同韵尾的基本韵母在生成儿化韵以后韵尾变得相同,儿化韵也就成为同音。比如北京话:

an, ai > ɐr　　uan, uai > uɐr

结果两组基本韵母就只生成一组儿化韵。

2. **儿化韵生成后的调整和归并**

儿化韵在生成后还要不断调整和归并,则是因为方言中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系统对儿化韵元音音位的配置起着制约的作用,其目的在于使儿化韵的元音音位数不超过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数。仍然以北京话为例。北京话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共有/i/、/u/、/y/、/ə/、/o/、/a/六个,其中有一个低元音音位,两个中元音音位,它们分布的韵母(组)如下:

| | | | | | | |
|---|---|---|---|---|---|---|
| a | | | ai | au | an | aŋ |
| ɤ | o | ie | ei | ou | ən | əŋ |

半个多世纪前，基本韵母 a 组生成儿化韵 ar 组，an、ai 组生成 ɐr 组，aŋ 组生成 ã 组，其中 ar 组和 ɐr 组对立：

ar 耙儿≠ɐr 盘儿＝ɐr 牌儿

基本韵母 ɤ 组生成儿化韵 ɤr 组，ei 组生成 er 组，ie 组生成 ier 组，ən、əŋ 组生成 ər（另 i、y、ɿ、ʅ 也生成 ər）、ə̃r 组，o、ou 组生成 or、our 组，其中 ɤr、er、ər、or 组也相互对立：

ɤr 乐儿≠er 泪儿≠ər 论儿≠or （一）摞儿

这样，儿化韵低元音音位有/a/、/ɐ/两个，中元音音位有/ɤ/、/e/、/ə/、/o/四个，数量都超过了基本韵母中的低、中元音音位数。于是在基本韵母元音音位系统的制约下，儿化韵 ar 组再变为 ɐr 组，er 组再变为 ər 组：

ɐr 耙儿＝盘儿 ɐr＝牌儿 ɐr

ɤr 乐儿≠ər 泪儿＝ər 论儿≠or（一）摞儿

结果是低元音音位减为一个，和基本韵母相同，中元音音位减为三个，只比基本韵母多出一个/ɤ/。根据资料，这一制约过程是在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完成的。

基本韵母元音音位系统的制约，使儿化韵的元音音位逐渐减少。而音位数量减少导致儿化韵组数减少，儿化韵总量也随着减少。这一过程从前述各方言中基本韵母和儿化韵的组数也可以看出来。如：

济南、德州、志丹 11—7

太原、北京 12—6

大同 11—5

忻州 14—3

长治 11—2

成都 12—1

其中长治话儿化韵元音音位只有低元音中元音各一个：/a/、/ə/，只有两组儿化韵。成都话的儿化韵则更进一步，最后只保留了一

个和单字音“儿”ɚ舌位相同的中元音音位，只有一组儿化韵。由此可见，基本韵母元音音位系统的制约力量是巨大的。就实际情况看，在某些方言中，由于“儿”音节也产生影响，儿化韵的元音音位数最终甚至还会少于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数。

如上所述，儿化韵生成后的调整和归并主要是方言语音系统中元音音位制约作用的结果。儿化韵发展的时间越长，调整和归并的程度也越甚，儿化韵的组数和总量也越少。所以，通常情况下，从元音音位归并的角度着眼，根据方言中儿化韵的音位数、儿化韵的组数和总量的多少，也可以判断它形成时间的早晚。

## (六)儿化韵调整归并中的“逆行”现象

**1. 四组儿化词的合而又分**

儿化韵的调整和归并使儿化韵数量减少，由繁趋简。但也有情况相反的记载。赵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曾经提到，北京话某些在二三十年代相互区分的儿化韵，在四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口中已经混淆不分，表现出归并的趋向。如以下四组儿化词：

| | |
|---|---|
| (1)歌儿＝根儿 | ɤr → ər |
| (2)果儿＝鬼儿、滚儿 | uor → uər |
| (3)街儿＝鸡儿 | ier → iər |
| (4)样儿＝燕儿 | iɑ̃r → ier |

但目前这些儿化词却又有了区别。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因为北京在1949年后外来人口大量进入，这些人又大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学说普通话时比较注意听辨，所以使已经归并的儿化韵重又分化。因此，就北京话来说，儿化韵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不是由繁趋简，而是由简趋繁。

从语音演变的角度来看，已经归并的儿化韵重新分化，这是不

可想象的，因为导致分化的语音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认为，上述的合而又分其实并不是语音的自然演变，而只是一种社会语言学的现象。作为社会语言学现象，有调查分析的必要。

2. 北京话中的一种超越主流的归并趋势

80 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的一门课程曾经对北京话进行过三次专题调查，其中涉及到儿化韵，包括赵元任提到的四组儿化词的问题。调查范围包括北京城区、郊区和郊县的 25 处，调查对象是世居本地的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共 511 人。调查方法是听辨和发音。部分调查内容作了整理。下面先列出被调查人的情况。表中 L、Z、Q 分别表示老(60 岁以上，赵元任所说四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可以归入这一组)、中(35 至 59 岁)、青(35 岁以下)三个年龄层次，0、1、2 分别表示文化程度低(低或文盲)、中(高小至初中)、高(高中以上)，数字表示人数：

| 文化<br>年龄 | 0 | 1 | 2 |
|---|---|---|---|
| L | 139 | 41 | 14 |
| Z | 83 | 60 | 18 |
| Q | 16 | 86 | 54 |

下面再列出和前述四组儿化词有关的听辨结果。表格中同一格内上排的数字是听辨时能区分的人数比率，下排的数字是发音时相混淆的人数比率：①

① 据沈炯计算机资料统计。

| 词组<br>年龄 | (1) | (2) | (3) | (4) |
|---|---|---|---|---|
| $L_0$ | 76.3<br>9.7 | 83.5<br>20.1 | 59<br>32 | 81.7<br>1.4 |
| $L_1$ | 69.5<br>13.4 | 63.4<br>36.6 | 43.9<br>45.1 | 52.4<br>2.5 |
| $L_2$ | 85.7<br>7.2 | 71.4<br>28.6 | 64.3<br>35.8 | 85.5<br>3.6 |
| $Z_0$ | 77.1<br>6 | 72.3<br>24 | 59<br>24.1 | 85.5<br>3 |
| $Z_1$ | 85<br>6.7 | 76.7<br>20 | 68.4<br>22.5 | 87.5<br>0 |
| $Z_2$ | 75<br>2.8 | 44.4<br>33.3 | 38.9<br>38.9 | 69.5<br>0 |
| $Q_0$ | 83.1<br>3.2 | 62.5<br>31.3 | 81.3<br>9.4 | 84.4<br>0 |
| $Q_1$ | 75.6<br>8.2 | 76.7<br>19.8 | 61.6<br>33.7 | 75.6<br>9.3 |
| $Q_2$ | 79.4<br>8.4 | 88.9<br>13 | 60.2<br>30.6 | 80.5<br>5.6 |

从表中可见，各组儿化词中，(1)(4)两组听辨区分率极高，发音混淆率极低，说明两组儿化词都分而不混。这和赵元任所说的情况不同。(1)组中，儿化韵 ɤr 和 ər 无疑是区分的，(4)组中 iə̃r 的鼻化成分作为区别性特征，不同被调查人的发音中虽然有强弱的差别，但区别始终是明确的。(2)组则听辨区分率在 45％至 89％之间，发音混淆率在 13％至 37％之间，区别虽然仍然是主要的，但混淆的情况也很明显。(3)组的听辨区分率约在 39％至 82％之间，发音混淆率则由 10％起可以高达 45％，几乎接近一半。虽然总的说来区别还是主要的，但混淆率很高，在某一类被调查人中甚至超

过了区分率。(3)(2)两组的调查结果显示，赵元任所说的情况，即使在目前也不限于个别人。

上述各组儿化词，世居北京的本地人虽然绝大多数仍然区别，但确实有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存在混淆的情况，特别是(3)(2)两组混淆的人数竟达 1/4 至 1/3 强。前文曾经提到，北京话基本韵母中只有一个低元音音位，两个中元音音位。前文还曾说过，在儿化韵的调整和归并的过程中，方言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系统具有制约作用。北京话半个世纪前儿化韵 ar 组变成 ɐr 组是因为元音音位系统要求只有一个低元音音位，er 组变成 ər 组是因为元音音位系统要求不超过两个中元音音位。调查中儿化词(3)(2)两组 uor～uər、ier～iər 的混淆，中元音音位倾向于归为/ɤ/、/ə/两个，也正是反映了这一不超过两个中元音音位的要求。只是儿化韵目前实际上还存在三个中元音音位，因此这一向两个中元音音位的调整归并就有了超前的性质，不能成为方言演变的主流，而只能作为方言内部分歧而存在。一个像北京话这样的大城市的方言在演变过程中会产生内部分歧，就语言的社会性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内部分歧有反映发展较慢的一面，如北京即使在城区也还有少数老年人仍然在使用自成音节的“儿”尾，如“树枝儿”说成 ʂu˥ ˌtʂʅ ər，和房山的老年人相同。内部分歧也有反映发展较快的一面，如上述赵元任所说四组儿化词的混淆。这种发展虽然在目前还“不合时宜”，但它体现了基本韵母元音音位系统的制约作用。就发展趋势来看，北京话儿化韵中的中元音音位由三个减为两个，和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数相同，是完全有可能较快实现的。

为了了解 1949 年后由外地迁入的新北京人学说普通话是否会影响到北京话儿化韵的自然演变的问题，对新北京人中的两代人也作了和前述世居北京的本地人同样内容和方法的调查。[1] 下

---

[1] 这一调查是由研究生王海丹在 1992 年进行的。

面表格里的 Z 表示 40 岁以上的被调查人,他们的母语是非北京话,1949 年进入北京后一直学说普通话;Q 是他们的子女一代,年龄在 20 岁以下,从小生活在北京,一般都是中学生:

| 词组 / 年龄 | (1) | (2) | (3) | (4) |
|---|---|---|---|---|
| Z | 91.8<br>8.1 | 81.6<br>10 | 66.3<br>23.7 | 94.1<br>6.4 |
| Q | 86.9<br>9.5 | 78.6<br>12 | 63.1<br>20.1 | 94.1<br>6 |

从表中可见,两代人的语言情况类似,没有因年龄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和世居北京的本地人相比,他们对四组儿化词的听辨区分率都要高些,发音混淆率都要低些。看起来这的确和外地人学说普通话都更注意清晰度有关。但是他们中(3)(2)两组儿化词听辨区分率下降和发音混淆率上升的情况也同样存在。这说明,就儿化韵的发展趋势来看,新北京人和本地人的情况是一致的,只在程度上略有差别,看不出他们有足以改变北京话儿化韵自然演变的特殊表现。

以上对北京话有关调查的结果表明,儿化韵生成后迅即进入调整归并的阶段,儿化韵数量减少,由繁趋简,是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北京话并不例外。作为演变的主流,北京话儿化韵发展中的"逆行"现象,实际上并不存在。

## (七)儿化韵的衰亡

### 1. 儿化韵的衰亡和小称义的磨损

目前在南方地区，特别是相连的吴方言、徽州方言和赣方言地区，一些方言中虽然还存在儿化韵，但不再有构成新词的能力，甚至旧有的儿化词也在迅速减少。以吴方言区浙江金华话为例。金华城区西南30里的长山乡话有基本韵母54个，儿化韵13个，口语中通行的儿化词250余个，如“鸟儿”꜂tiæn$^{423}_{45}$。而城区老年人口音中仅有儿化韵10个，儿化词100多个，少于郊区；年轻人口音中仅有儿化韵4个，儿化词10余个，数量更少。这是由于城区方言比郊区方言、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更容易放弃方言特点的缘故。有的方言甚至儿化词已经只作为残余现象而存在，它们已经失去小称意义，本地人已经不知道这些词语中还包含有语素“儿”。如宁波“脚”tɕiaŋ꜄(←tɕiaʔ꜆)，绍兴“弟弟”꜁diŋ ꜃diŋ(←꜁di ꜃di)。

官话方言的西南地区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一些方言中儿化词数量很少，小称意义也已经不很明确。如成都话仅见“猫儿”꜀mər、“八哥儿”꜁pa ꜀kər等少数几个儿化词。邛崃话老年人口音儿化词稍多，但中青年人口音也已经仅有“猫儿”꜀mər、“鹦哥儿”꜀ŋən ꜀kər等少数几个。总的来看，西南官话表小称的语法手段正在由儿化改变为重叠、重叠儿化和儿化重叠等方式。如成都“罈罈”꜁t‘an ꜁t‘an$^{44}$、“瓶瓶儿”꜁p‘in ꜁p‘iər$^{44}$，昆明“盖儿盖儿”kə꜄ kə꜄$^{44}$。有的方言则对儿化和儿化重叠再辅以附加手段，如邛崃“鹦哥$_{儿}$儿”꜀ŋən ꜀kər ꜁ər、“猫$_{儿}$猫$_{儿}$儿子”꜀mər ꜀mər ꜁ɚ$^{44}$ tsɿ。这说明，单纯的儿化已经失去了表示小称的能力。

由此看来，方言中儿化韵发展的最后阶段是衰亡。

**2. 儿化韵衰亡的必然性**

儿化韵的衰亡其实是儿化词小称意义磨损的必然结果。这是和汉语中语素和音节的结构规律有关的。汉语中，通常一个语素具有一个音节，构成单音节词，如“天”、“地”、“人”；较少情况下一个语素具有多个音节，构成多音节单纯词，如“葡萄”、“犹豫”。汉

语中不存在多个语素共存于一个音节之中的情况。但语流音变的合音作用则恰恰会造成两个(甚至更多)语素共存于一个音节之中的结果。不过既然这一结果不符合语素和音节的结构规律，两个语素共存的局面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其中必然会有一个被消磨。以北京话为例。“甭”꜀pəŋ 是“不用”꜀pu iuŋ꜄ 的合音，但目前口语中也说“甭用”，“甭用”中的“甭”实际上已经和“不”等同，其中的语素“用”已经被磨损。又如“这”tʂei꜄、“那”nei꜄、“哪”꜂nei、꜂nai 原是“这”tʂə꜄、“那”na꜄、“哪”꜂na 和“一”i꜄ 的合音，但实际上目前合音形式也常常失去语素“一”，比如也可以说成“这一个”tʂei꜄ i꜄ kə꜄ 等等。这说明，北京话上述合音词中的语素“不”、“这”、“那”、“哪”借助声母的优势保存了下来，而“用”、“一”则被磨损。儿化词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前面的明显的语素借助声母的优势保存了下来，后面的隐蔽的语素“儿”则被磨损。

儿化词中的语素“儿”被磨损以后，人们自然就不再感觉到这个儿化词的小称意义。如安徽休宁话“燕”基本韵母形式的 $ia^{42}$ 和儿化韵形式的 $iæn^{24}$，本地人已经看做是完全等价的两个异读音，可以随意用于口语或书面语等不同场合(比如儿化韵形式的 $iæn^{24}$ 也可以用在像“燕子衔泥”这样的诗词朗读中)。同时，儿化词失去小称意义后，儿化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不但不再生成新的儿化词，而且连旧有的儿化词也很快弃置不用，从而使仅剩的儿化韵成为残存形式。甚至儿化韵的语音标志也有可能消失。西南官话云南地区就有不少方言的卷舌儿化韵失去了作为语音标志的卷舌成分，变为平舌元音。如昆明“猴狲儿”꜀xou ꜀suə。通过和邻近方言的比较可以确知，这种平舌元音不是融合型的平舌元音儿化韵，而是拼合型的卷舌儿化韵(uər)失去卷舌韵尾的结果。和成都话一样，这些方言的儿化韵也只有一组，元音舌位和“儿”字的基本韵母相同。而且儿化韵的卷舌韵尾失落后，甚至“儿”字的基本韵母也随同变化，如昆明 ə (←ər)，蒙自 ʌ (←ʌr)。

如果儿化词已经只有个别残余，而且不再被人们认为是儿化词，儿化韵就有可能脱离语法层面转入语音层面，随同基本韵母一起演变。比如宁波话“娃”꜀uɛ 是由“娃”꜀ua＋“儿”n̩→“娃儿”꜀uan 这一合音而成的语音形式随着同音字“挽”等演变而成的，上海话“虾”꜀hø 是由“虾”꜀ho＋“儿”n̩→“虾儿”꜀hon 这一合音而成的语音形式随着同音字“憨”等演变而成的。这增加了儿化词辨认的难度。

不过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儿化韵的衰亡却也不一定导致儿化词的全部消失。有的方言中残存的儿化词和原语素失去了联系，反倒有可能作为不明来源的特殊词存在下去。比如江西余干“婻”nan$^{35}$，都昌“㚻”ȵin$^{351}$，它们实际上都是“女”的儿化韵形式，但都在儿化韵衰亡后作为特殊词保存了下来。

综上所述，儿化韵发展的全过程是以合音开始，经历调整和归并，最后归于消亡。不同方言中儿化韵的发展过程可能时间长短不同，但变化结果将是相同的。儿化韵因合音而生，但合音后立即就有了因语素和音节的结构关系而出现的矛盾。因此可以说，儿化韵在生成之初就埋下了日后衰亡的种子。

**3. 儿化韵多层次并存的可能性**

既然儿化韵最终会走向衰亡，那就可以设想，有些目前存在儿化韵的方言，可能以前还曾经有过另外一层儿化韵，有些方言目前还可能正在发生新旧儿化韵的交替。也就是说，方言中可能存在儿化韵的新陈代谢现象。前述西南官话一些方言儿化韵和自成音节的“儿”尾共存，似乎就是残余的儿化韵在向新起的“儿”尾过渡。吴方言浙南地区也有一些现象可以使人产生这样的设想。比如温州话有自成音节的“儿”尾 ŋ̍，如“虾儿”꜀ho$^{32}$ ŋ̍，“将*儿”（麻雀）tɕiʔ$^{32}$ ŋ̍；但同时也有儿化韵的残存现象，“将*儿”中的“将*” tɕiʔ 就是“雀”tɕiaʔ早期的儿化韵 tɕiaŋ꜆随同早期的基本韵母 iaŋ 一起演变的结果。音变过程应该是：

tɕiaʔ꜀ + ŋ̍ → tɕiaŋ → tɕiɛ → tɕi

另外，庆元话也有自成音节的“儿”尾 ȵie˙，但“栗儿”liŋ$^{55}$（←liʔ꜂）ȵie˙ 中的 liŋ$^{55}$同样也是儿化韵的残存形式。温州话的“将*”tɕi˒和庆元话的“栗”liŋ$^{55}$作为儿化韵，和自成音节的“儿”尾 ŋ̍ 和 ȵie˙ 显然不属于同一时间层次。也许可以认为，在这两个方言中，“将*”tɕi˒和“栗”liŋ$^{55}$是早期儿化韵的仅存，新一代的“儿”尾则还处在合音前的阶段，但二者并见于目前的方言中。

此外，方言中也还有一些类似的现象，但需要鉴别。如上海话“囡儿”（女儿）꜁nø ꜁ŋ̍，儿化韵“囡”꜁nø（来自早期的“娜*”꜂no＋“儿”ŋ̍）和自成音节的“儿”尾 ꜁ŋ̍ 并存；广东信宜话“乞儿”有 het ˄ ꜀hat꜆$^{5}$꜁ȵi$^{53}$两音，有特殊音高的小称变调“↑”和自成音节的“儿”尾 ꜁ȵi 并存。这种现象看起来和浙南吴语中的现象相同。但由于上海、信宜方言中并不存在系统的自成音节的“儿”尾，上述个别的“儿”尾词就有借自外方言的可能，并不能反映方言自身的演变。不过无论如何，西南官话和浙南吴语的现象可以说明，儿化韵这种构形手段新陈代谢的情况是存在的。

## （八）儿化韵和小称变调

### 1. 小称变调的性质

方言中“儿”尾和前一语素韵母合音成儿化韵的同时，常常会发生一种非语流音变性质的特殊变调。这种特殊变调和儿化韵一样，也具有表示小称意义的语法功能，可以叫做儿化变调。以湖北阳新三溪话为例。儿化变调有时和儿化韵同时存在，共同承担小称义。如：

花꜀xuɔ$^{33}$→ xuɛ̃$^{55}$

塘꜁t‘ɔŋ$^{21}$→ t‘en$^{55}$

有时有儿化变调而没有儿化韵，儿化变调独力承担小称义。如：

妹 ꜀mei$^{33}$→ mei$^{55}$

方言中如果不存在儿化韵，由儿化变调单独承担小称义，儿化变调通常就称作小称变调。

**2. 小称变调的发展**

和儿化韵相同，小称变调的发展也会以衰亡告终。因为在声调系统中，失去儿化韵支持的小称变调显然不可能长期和本调并存，而终将自行消亡或融入本调系统。粤方言中多见小称变调。现在把粤方言区若干方言中的现象综合成一个小称变调的发展过程，分以下四个阶段来观察它的演变情况。

(1)自成音节的"儿"尾和变调共同表示小称

方言中"儿"尾还没有和前一语素合音，但已经发生变调，"儿"尾和变调共同表示小称。如广西桂平木乐话：

筛儿 ꜀ʃɐi$^{55}_{31}$ ꜁ŋ̍i$^{31}_{55}$

路儿 lu$^{21}$ ꜁ŋ̍i$^{31}_{55}$

竹儿 tʃuk꜆$^{5}_{3}$ ꜁ŋ̍i$^{31}_{55}$

蝶儿 tip꜇$^{2}$ ꜁ŋ̍i$^{31}_{55}$

高平变调 55 在这里使"儿"由具有实在意义的名词转化成具有小称意义的词尾。

(2)儿化韵和儿化变调共同表示小称

方言中"儿"尾已经和前一语素合音成儿化韵，同时发生变调，儿化韵和儿化变调共同担负小称义。以广东信宜话为例。儿化韵只由部分基本韵母生成，生成规律是单元音韵母变成-n 尾韵，-p、-t、-k 尾韵母变成具有同部位韵尾-m、-n、-ŋ 的鼻尾韵，鼻尾韵和复元音韵母没有变化，变调是升变调。如(单字调中"꜀"表示下阴入)：

花 ꜀fa → fan↑

猪 ꜀tʃy → tʃyn↑

鸭 ap꜀ → am↑

佛 fet꜂ → fɐn↑

雀 tʃɛk꜀ → tʃɛŋ↑

(笠)衫꜀ʃam → ʃam↑

(毛)巾꜀kɐn → kɐn↑

钟꜀tʃoŋ → tʃoŋ↑

杯꜀pui → pui↑

狗꜂kɐu → kɐu↑

信宜话的升变调音高大大超过本调的范围，如果和五度制相比，则"↑"可以标写成 57。这反映了早期作为语法变调的特殊性。就调值的情况来看，信宜话变调的产生可能比桂平木乐话要早。

广西容县话的情况和信宜话相近，但基本韵母中只有-p、-t、-k尾能生成儿化韵，升变调的音高也已经降低，进入了本调的音高范围，显见对特殊音高的要求的放弃。如：

鱼꜀ȵy$^{3,}$ → ȵy$^{35}$

盖 koi꜄$^{22}$ → koi$^{35}$

衫꜀ʃam$^{55}$ → ʃam$^{35}$

鸭 ap꜀$^{3}$ → am$^{35}$

笔 pet꜀$^{5}$ → pen$^{35}$

脚 kek꜀$^{3}$ → keŋ$^{35}$

容县话儿化韵的减少，说明表达小称义的负担已经逐渐向变调转移。

(3)没有儿化韵，有小称变调

方言中儿化韵已经不复存在，儿化变调因而转为小称变调，独力担负小称义。以广东中山小榄话为例。小称变调有 55、25 两种调值。不过因为变调的小称义都已磨损，本地人只看作是习惯变调。如：

壶꜀wu$^{32}$ → wu$^{55}$

楼:lɐu$^{32}$ → lɐu$^{25}$

中山小榄话小称变调中的55实际上比本调的音高最高点仍然要高一些，还保有语法变调原有的特殊性。

(4)没有儿化韵，变调融入本调系统

方言中儿化韵已经消失，小称变调的小称义已经磨损，调值也已经混同本调，不可分辨，小称变调至此已告衰亡。以广州话为例：

蚊:mɐn$^{21}$→ mɐn$^{55}$

辫 pin$^{22}$→ pin$^{55}$

糖:t'ɔŋ$^{21}$→ t'ɔŋ$^{35}$

女:nøy$^{23}$→ nøy$^{35}$

画 wa$^{22}$→ wa$^{35}$

(麻)雀 tʃœk̚$^{33}$→ tʃœk$^{35}$

广州话小称变调有高平变调(55)和高升变调(35、35)两种，其中舒声调分别和连读变调的高平调和单字调的阴上相同。不过据早期的记载，两个变调都曾有过特殊的音高，高平变调是比55略高的“超高平”，高升变调也比阴上调“稍为提高”。这说明广州话的小称变调由特殊的语法变调融入本调系统，才不过半个多世纪。近一段时期以来，广州话高升变调已经和阴上调完全融合，高平变调55则成为阴平调除53外的另一调值。“蚊”、“辫”等字的小称变调已经凝固下来，不再读回本调。目前阴平调中的两个调值还正在开始合并成55的演变，以最终消除小称变调和本调并列的痕迹。

综上所述，粤方言的儿化韵以粤西桂东地区较为古老，小称意义明确，儿化变调具有语法变调的特殊音高。而在粤东沿海一带城市的方言中，随着儿化韵失去小称意义而衰亡，儿化变调转变为小称变调后，也迅速融入方言的本调系统，失去自我。因此，小称变调在粤方言中趋于消亡的前景也是无疑的。

#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

曹延杰:《德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1。

陈昌仪:《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陈淑静:《河北满城方言的特点》,《方言》1988.2。

陈淑静、许建中:《定兴方言》,方志出版社,1998。

陈锡梧:《台山方言特殊变调初探》,《中国语文》1966.1。

陈忠敏:《论闽语的小称》。(未刊)

方松熹:《浙江吴方言里的儿尾》,《中国语文》1993.2。

冯雪珍:《休宁方言记要》,《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高葆泰:《兰州方言音系》,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何天贞:《阳新三溪话的小称形式》,《语言研究》1982.2。

贺　巍:《洛阳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侯精一:《长治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5。

黄景湖:《大田县后路话的特殊音变》,《厦门大学学报》(增刊),1983.5。

黄锡凌:《粤音韵汇》,中华书局,1941。

李国正:《四川话儿化词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86.5。

李　龄:《四川邛崃话里的后加成分"儿"和"儿子"》,《中国语文》1959.1。

李　荣:《汉语方言调查手册》,科学出版社,1957。

《温岭方言的变音》,《中国语文》1978.2。

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1994。

林　焘:《北京儿化韵个人读音差异问题》,《语文研究》1982.2。

刘育林:《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马凤如:《山东金乡话儿化对声母的影响》,《中国语文》1984.4。
马文忠、梁述中:《大同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6。
钱曾怡:《论儿化》,《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1995。
邵慧君:《吴语粤语小称变音与“儿”尾》,《汉语方言论文集》,现代教育研究出版社,1997。
万幼斌:《鄂州方言的儿化》,《方言》1990.2。
王海丹:《北京话儿化韵的发展》,1992。(硕士论文,未刊)
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语言研究》1994.1。
王理嘉:《儿化韵语素音位的讨论》,《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1995。
温端政:《忻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5。
徐通锵:《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1词”》,《中国语文》1981.6。
《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中国语文》1985.3。
《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
杨秋泽:《利津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0。
杨时逢:《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汉语部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9。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84。
杨桢海:《广西桂平木乐话“儿”尾》,1989。(未刊)
叶国泉、唐志东:《信宜方言的变音》,《方言》1982.1。
尉迟治平:《英山方言的儿尾》,《语言研究》1989.2。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张　崇:《延川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0。

张鹤泉:《聊城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5。
张鸿魁:《临清方言志》,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张　敏:《小称变音与儿化:广西玉林话和广州话的个案研究》,1993。(未刊)
张树铮:《寿光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5。
赵元任:Cantonese Primer(粤语入门),Harvard U. Press,1947。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
《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
郑伟聪:《小榄话变调现象初探》,《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的儿尾》,《方言》1979.3。
《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二),《方言》1981.1。
周祖瑶:《广西容县方言的小称变音》,《方言》1987.1。
朱加荣:《金华方言的儿化》,《语言学论丛》(第十七辑),商务印书馆,1992。

# 七　子变韵

## (一)子变韵的分布和语音形式

### 1. 子变韵的分布

子变韵是汉语官话方言中的一种特殊韵母，分布在山西、河南两省，以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较为集中。

和儿化韵相同，子变韵也是由合音这一语流音变造成的变韵，特点是“子”尾和前一语素二者共存于一个音节之中。如山西运城三路里话：

盘₍p'æ$^{13}$ + 子 əu˙ → 盘子 p'æ:əu$^{113}$

子变韵是在 50 年代后期汉语方言普查时引起人们注意的。最初它们被作为河南北部一些方言中的变韵介绍出来。例如：

郑州：鼻₍pi → ₍piɔu

叶₍ɪɛ → ₍iau(＝腰)

获嘉：盖 kaiᵓ → kioᵓ

筷 k'uaiᵓ → k'yoᵓ

温县：妹 meiᵓ → mieuᵓ

鞭₍pian → ₍pi:a

这种变韵和基本韵母的对应情况复杂，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又由于这种变韵具有和“子”尾相同的语法功能，使名词如附

后缀,而且有这种变韵的方言一般就不再有通常的"子"尾,因此人们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一种和儿化韵相似的变韵。而且即使方言中发生这种变韵的名词后面并不写出"子"字,人们也仍然认为它是由"子"尾参与,采取和儿化韵相同的生成方式(合音)构成的,把它叫做"子化韵"或"子变韵"。不久以后,因为一时难以肯定其中的构形语素是不是一定是"子",人们又把它叫做 z 变韵或 z 变音。70 年代以后,从山西中部到河南中部的许多方言里都发现了这种变韵,(据了解,晋北地区也有子变韵的分布)材料逐渐丰富。人们发现有的 z 变韵还能表示处所、时态等意义,大大超出了"子"尾的范围,因此又笼统把它们叫做变韵。以河南获嘉话为例,和基本韵母 ai、uai 相对应的变韵具有下列不同的意义和语法功能(例词例句后标出变韵,括弧里注出和变韵功能相当的语素):

名　词 (一般名词):盖 kioˀ(子),筷 k'yoˀ(子)

(地名):帅庄儿 ʂuɛˀ(家)

(处所):小孩儿在怀的* ˛xuɛ (那里)

动　词 (已然):我买葱ˊmɛ (了)

(存现):席上晒玉蜀黍的* sɛˀ(着)

(结果):菜卖怪快 mɛˀ(得)

(趋向):他把我摔他家了 tʂuɛˀ(到)

形容词 (命令):你抱叫快些儿 k'uɛˀ(上)

从以上例词例句看来,变韵中参与合音的语素显然不限于"子"尾,而且地名和动词另有一套变韵,一般称作 D 变韵。本章只介绍方言中具有和"子"尾相同语法意义的一般名词的变韵,不涉及其他变韵。因为其中的构形语素目前基本上可以认为仍然是"子",所以也仍然把这部分变韵叫做子变韵,虽然方言中至今仍然不把"子"写出来。(本章为叙述的方便,一律写出"子"字)

**2."子"尾和子变韵的语音形式**

在子变韵的分布地区,自成音节的"子"尾和实词"子"相比,语

音上大多发生了变化。它的音值按韵母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舌尖元音韵母，如 tsɿ˙（洪洞、临汾），tʂʅ˙（高平）；

(2)中元音韵母，入声韵如 tsəʔ˙（太原、大同）、tsʌʔ˙（介休）、təʔ˙（长治，武乡）、tɛʔ˙（汲县）、zəʔ˙（山阴）、ləʔ˙（沁县），舒声韵如 tsə˙（清徐、五台、洛阳）、tə˙（忻州）、zə˙（天镇）、ɣə˙（绛县）、ə˙（原平）；

(3)后元音韵母和 u 尾韵，如 tɯ˙（临猗临晋）、tɔu˙（临猗）、tou˙（运城）。

“子”尾的不同读音是韵母和声母音变的结果。t、z、l、ɣ、∅ 等是声母 ts 的弱化形式，中元音是原韵母的弱化形式，入声韵是有入声方言中常见的轻声形式。

有些方言的“子”尾虽然不能自成音节，但可以从子变韵里离析出来，如晋城话“狮子”꜀ʂʅ:ɔ$^{33}_{35}$、“椅子”ʿi:ɔ$^{213}$中的 ɔ，闻喜话“刷子”fa:uʾ$^{53}_{551}$中的 u。u 和上述第三类“子”尾韵韵母 ɔu、ou（因 u 韵母前衍生出过渡音 ɔ、o 而成）可以归为一类，并且通过韵母 ɯ 和其他“子”尾的韵母 ə 等语音形式相联系，显示出它们在发生学上可能存在同一性。但“子”尾就目前的音值和合音行为的差别着眼，仍然可以分成 u 类和 ə 类两类。

子变韵的语音形式和“子”尾本身的音值直接相关。上述第二类舒声韵“子”尾合音生成 ɔ 类子变韵，如晋城话：

孤꜀xu →孤子꜀xu:ɔ$^{35}$

第三类“子”尾合音生成 u 类子变韵，如运城三路里话：

筷 k‘uæɛʾ + 子 ɔu˙ →筷子 k‘uæɛ:ɔu$^{33}$˙

3.**“子”尾和“儿”尾的区别**

山西、河南方言中，“子”尾和“儿”尾的语音形式一般都有明显的区别，但也存在一些可能发生混淆的情况。个别方言“儿”尾的语音形式很像“子”尾，如“儿”尾岚县 zəʔ˙（＝天镇“子”），平遥

ʐʌʔ、兴县 lɚ（比较沁县"子"ləʔ）。个别方言"子"尾的语音形式很像"儿"尾，如翼城"子"尾 ŋ̍～nəŋ̍。正是这种情况曾经使子变韵不得不长期叫作 z 变韵。

不过这种可能混淆的现象只发生在"子"尾和"儿"尾自成音节的语音形式中。由于弱化作用，轻声音节会发生元音和辅音的语音趋于中和或混同的变化。不过由"子"尾和"儿"尾生成的子变韵和儿化韵各有系统，相互间并不混淆。至于翼城话"子"尾语音形式中鼻音的来源，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二）子变韵的合音方式

子变韵中，"子"尾和前一语素合音的方式，就"子"尾的行为和状态来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 拼合型，即"子"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成子变韵后，"子"尾处在韵尾位置，可以在语音上和韵腹元音区别开来。以闻喜话为例：

杯 ꜀pi$^{31}$ + 子 u˙ →杯子 piːəu$^{241}$

袜 vaʔ$^{53}$ + 子 u˙ →袜子 vaːu$^{551}$

盘 ꜁pʻæ̃$^{213}$ + 子 u˙ →盘子 pʻæ̃ːu$^{551}$

疯 ꜀fʌŋ$^{31}$ + 子 u˙ →疯子 fʌ̃ːu$^{241}$

2. 融合型，即"子"尾（通常是 u 类）和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韵母，"子"尾在其中已经无法辨认出来。例如阳城话：

娃 ꜀va →娃子 ꜀vɔː

把 pa →（刀）把子 pɔː

按音理判断，这种语音形式应该是 u 类"子"尾和前一语素韵腹元音融合的结果，即 a + u → ɔ。

3. 长音型，即"子"尾音节的声韵调都消失，但音长保留下来，融入前一音节，生成一个长音节的子变韵。在生成子变韵时，有的方言还同时有变调，如临猗话：

孙꜀ɕyẽĩ$^{31}$ → 孙子 ɕyẽ:ĩ$^{311}$

麻꜁ma$^{24}$ → 麻子 ma:$^{213}$

领꜂liŋ$^{53}$ → 领子 li:ŋ$^{553}$

妹 mei꜄$^{44}$ → 妹子 me:i$^{423}$

有的方言不变调，如夏县话：

梯꜀t'i$^{53}$ → 梯子꜀t'i:$^{53}$

蚊꜁vẽĩ$^{31}$ → 蚊子꜁vẽ:ĩ$^{31}$

椅꜂ȵi$^{324}$ → 椅子꜂ȵi:$^{324}$

桌 pfɤ꜄$^{33}$ → 桌子 pfɤ:꜄$^{33}$

子变韵的变调伴随长音节而出现。长音节是两个语素音长的加合，变调则是两个语素声调的加合，可以叫做子变调。以运城话为例，变调的调值实际上等于两音节连读中前字调值和后字轻声之和。比较下例中的两种变调：

| | 子变调 | 连读变调 |
|---|---|---|
| 阴平 | 瞎子 xa:$^{31}_{311}$ | 高的 kau$^{31}$ ti$^{1}$ |
| 阳平 | 鼻子 p'i:$^{13}_{113}$ | 圆的 yæ̃$^{13}_{11}$ ti$^{3}$ |
| 上声 | 剪子 tɕiæ̃:$^{53}_{552}$ | 短的 tuæ̃$^{53}$ ti$^{2}$ |
| 去声 | 豹子 pa:u$^{33}_{331}$ | 细的 ɕi$^{33}$ ti$^{1}$ |

### 2. 子变韵合音方式间的转化

上述子变韵合音方式的不同类型，常常数种同时见于一个方言，很少方言只有一种类型的子变韵。如运城三路里话兼有拼合型和长音型：

车꜀tʂ'ᴇ → 车子꜀tʂ'ᴇ:ou

瞎꜀xa → 瞎子꜀xa:

阳城话兼有拼合型、融合型和长音型：

梯꜀t'i →梯子꜀t'iːu

把 pa꜄ →把子 pɔː꜄

兼型现象反映出子变韵不同类型之间存在的转化关系。比如拼合型子变韵进一步变化可以成为融合性子变韵，等等。从生成的过程看，长音型可能是最早出现的子变韵类型。因为轻声的"子"尾和前面的语素首先构成"一个半音节"的语音单位，这种语音单位容易发生合音。合音时保留这"一个半音节"的时长，从而生成长音节，应该是最自然的结果。长音型子变韵生成后，加上拼合型向融合型转化等机制，就可以构成各种形式的子变韵。

子变韵类型的转化可以假设以 aːu 起头的三种途径：

(1)aːu → aː → (a)

"子"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成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 aːu。然后这一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在发展中失落 u 尾，变成单纯的长音型子变韵 aː。如果进一步再失去特殊的音长，就可能恢复和基本韵母相同的语音形式 a，这时如果没有其他语音标记(如变调等)，就将无法辨认。比较下列方言词：

(下)巴子 paːu(闻喜) →麻子 maː(临猗)

也有的单纯长音型子变韵在失去长音节以前韵母已经发生变化，从而生成一种不同于基本韵母的子变韵，可以叫做缩短了的长音型子变韵。比如原阳话子变韵鼻化韵失去鼻化成分后转成阴声韵(ãː→ aː→ a)，就是这种缩短了的长音型子变韵。例如：

盘꜁p'an →盘子꜁p'a(＝爬)

簷꜁ian →簷子꜁ia(＝芽)

罐 kuan꜄ →罐子 kua꜄(＝挂)

院 yan꜄ →院子 ya꜄

(2)aːu → ɔː → ɔ

长音节拼合型子变韵中的 u 尾和韵腹元音融合，生成长音节

的融合型子变韵 ɔː；如果进一步再失去特殊音长，就成为一般的融合型子变韵 ɔ。比较下列方言词：

(下)巴子 paːu(闻喜) →(刀)把子 pɔː(阳城)

→(锅圪)巴子 pɔ(获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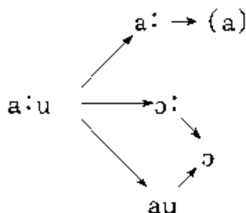
(3)aːu → au → ɔ

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失去特殊音长，成为一般的拼合型子变韵 au；如果 u 尾再和韵腹元音合音，就成为融合型子变韵 ɔ，和上面第二种转化途径的结果相同。比较下列方言词：

(下)巴子 paːu(闻喜) →(鞋)拔子 pau(郑州)

→(锅圪)巴子 pɔ(获嘉)

子变韵的三种转化途径可以综合如下：




子变韵类型的转化关系，可以说明山西、河南各地同一子变词为什么会具有多种不同的韵母类型。而且由于子变韵类型的转化遵循一定的途径，从方言中子变韵具有的类型可以判断它们在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阶段。比如具有长音型子变韵的方言，它的子变韵的发展可能还在前期，而只有非长音融合型子变韵的方言，它的子变韵的发展则可能已到后期。

## (三)子变韵和基本韵母的对应

**1. 对应的复杂性**

"子"尾和前一语素合音而生成子变韵。方言中子变韵和基本

韵母的对应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对应的繁简取决于子变韵类型的多寡及基本韵母和"子"尾在合音中的可理解程度。对应简单的可以以闻喜话为例。闻喜话36个基本韵母中有29个生成子变韵。子变韵里的"子"尾u（在前高元音韵母ɿ、i、y后复化成əu，在鼻化韵后鼻化）基本上都附着在韵腹元音之后，构成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只在韵母u、əu后和其中的u合并成为单纯的长音节子变韵。而且基本韵母在合音中没有变化。因此，闻喜话子变韵和基本韵母对应简单。例如：

| | | | |
|---|---|---|---|
| ɿ→ɿːəu | i→iːəu | u→uː | y→yːəu |
| a→aːu | ia→iaːu | ua→uaːu | ya |
| | iɛ→iɛːu | uiɛ | yɛ→yɛːu |
| ə→əːu | iə→iəːu | uə→uəːu | |
| æe→æeːu | | uæe→uæeːu | |
| ei | | uei→ueiːu | yei |
| ɑo→ɑoːu | iɑo→iɑoːu | | |
| əu→əuː | | | |
| æ̃→æ̃ːu | iæ̃→iæ̃ːu | uæ̃→uæ̃ːu | yæ̃→yæ̃ːu |
| ẽĩ→ẽĩːu | iẽĩ→iẽĩːu | uẽĩ→uẽĩːu | yẽĩ→yẽĩːu |
| ʌŋ→ʌ̃ːu | iʌŋ→iʌ̃ːu | uʌŋ→uʌ̃ːu | yʌŋ |

但在有的方言里，基本韵母和子变韵的对应却很复杂。以获嘉话为例。获嘉话47个基本韵母中有40个生成23个子变韵。下面列出全部16组基本韵母和子变韵的对应（ï代表ɿ和ʅ）：

| | | | | |
|---|---|---|---|---|
| (1) | ï→ïːou | i→iːou | u | y→yu |
| (2) | a→ɔ | ia→iɔ | ua→uɔ | |
| (3) | ɤ→o | | uɤ→uo | yɤ |
| (4) | | iɛ→io | | yɛ→yo |
| (5) | ai→io | | uai→yo | |
| (6) | ei→iːou | | uei→yu, uiːou | |

| | | | |
|---|---|---|---|
| (7) au→ɔ | iau→iɔ | | |
| (8) ou | iou | | |
| (9) an→ã | ian→iã | uan→uã | yan→yã |
| (10) ən→i:ŋ | in→i:ŋ | uən→y:ŋ, ui:ŋ | yn→y:ŋ |
| (11) aŋ→ɔ̃ | iaŋ→iɔ̃ | uaŋ→uɔ̃ | |
| (12) əŋ | iŋ→i:ŋ | uŋ→y:ŋ | yŋ |
| (13) aʔ→o | | uaʔ→uo | yaʔ→yo |
| (14) ɐʔ→o | iɐʔ→io | uɐʔ | yɐʔ→yo |
| (15) əʔ→i:ou | iʔ→i:ou | uʔ→u | yʔ→yu |
| (16) ʅ→ou | | | |

从对应表中可见，获嘉话子变韵的类型多样，而且可以几个基本韵母和一个子变韵相对应，也可以一个基本韵母和几个子变韵相对应，语音条件不都明确。某些基本韵母和相对应的子变韵语音差异又很难从音理上说明。个别基本韵母和子变韵的对应甚至存在对应表中无法容纳的例外。

获嘉话基本韵母和子变韵的对应是复杂的。但合音作为一种有规律的语音变化理应是可以解释的。下面就以获嘉话为例，尝试说明对应中的各种情况。

**2. 获嘉话子变韵的合音**

为获嘉话大部分子变韵的合音作出解释并不困难。比如就子变韵的类型着眼，(1)(8)(15)(16)等组是拼合型子变韵，其中除(16)组以外都和前文所述闻喜话子变韵的情况相同。(2)(3)(4)(7)(14)等组是融合型子变韵，由韵腹元音按低、中两类不同舌位，和“-子”尾 u 拼合后又单元音化而生成：

a + u → au → ɔ

au + u → au → ɔ

ɤ + u → ɤu → o

ɐʔ+u → ɐu → o

iɛ+u → iɛu → io

ɔ、o 即是单元音化的结果。(9)(12)等组则是长音型子变韵,但其中(9)已经失去特殊音长,成为缩短了的长音型子变韵。

对获嘉话另一些子变韵合音的解释则存在一定的困难。不过,既然子变韵各种类型的合音具有规律性,"子"尾的语音形式又是明确的,那么造成解释困难的问题就有可能存在于基本韵母中。由于子变韵和基本韵母二者在变化速度上可能不同,(在这一点上子变韵和儿化韵的情况是相同的)那么一个合理的假设便是,获嘉话基本韵母的变化速度可能快于子变韵,即某些基本韵母的语音形式在生成子变韵以后可能发生过变化,也就是说,某些基本韵母生成子变韵时的语音形式可能不同于目前。如果这样,那么子变韵和目前的某些基本韵母就没有直接的生成关系。要解释这些子变韵的合音自然就不能根据基本韵母目前的语音形式,而应当根据它早期的语音形式。不过这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它的早期形式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邻近的山西方言中去寻找线索,因为这些方言中的基本韵母和获嘉话的不很相同,其中某些韵母的语音形式很可能和获嘉话某些基本韵母的早期形式相同或者相近,可以根据它们来为获嘉话某些子变韵的合音作出合理的解释。下面就按韵组分别叙述。

(5)ai、uai → io、yo

该组对应涉及蟹摄开口一二等韵。可以比较如下方言中的韵母音值,如长治 æ、uæ,沁县 ɛ、uɛ,黎城、晋城 ᴇ、uᴇ,闻喜 iɛ,离石 ie、ye 等。这些韵母的语音形式显示出它们是由早期的复元音 ai、uai 单元音化后再进一步经历高化而成的,而且在高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又发生了腭化,使韵母由开合口转变为齐撮口。音变过程可以假设如下:

ai → æ → ɛ → ᴇ → e → ie

uai → uæ → uɛ → uE → ue → ye

如果获嘉话“盖”、“筷”早期的韵母不是 ai、uai，而是和这些方言相同或相近，那么(5)组子变韵的合音实际上将和(4)组同样简单合理。

(13)aʔ、uaʔ、yaʔ → o、uo、yo

(2)(7)(9)组显示获嘉话韵腹元音为低元音的基本韵母应该和子变韵 a、ɔ 相对应。但(13)组基本韵母韵腹同属低元音却和子变韵 o 组对应，表现得和(14)组韵腹为中元音的基本韵母 ɐʔ 组相同，从而成为例外。不过(13)(14)两组韵腹元音不同的基本韵母既然都生成子变韵 o、io 等，可以推测它们早期的韵腹元音应该同是中元音，即基本韵母 aʔ 组中的低元音是后来变化的结果。而邻近方言的确有以同一组韵母和获嘉话(13)(14)两组韵母相对应的。如晋城、阳城、陵川、高平、沁县等方言的 ʌʔ 等，可以作为上述推测的根据。

(11)aŋ、iaŋ、uaŋ → ɔ̃、iɔ̃、uɔ̃

比较下列方言中相对应韵母的语音形式，如晋城 õ、iõ、uõ，沁县、武乡、襄垣 ɔ̃、iɔ̃、uɔ̃，可以推测获嘉话的子变韵应该是由长音型子变韵失落 u 尾，再失去特殊音长而成的。音变过程是：

ɔ̃ːu → ɔ̃ː → ɔ̃

(6)ei、uei → iːou、yu～uiːou

(10)ən、in、uən、yn → iːŋ、iːŋ、yːŋ～uiːŋ、yːŋ

这两组阴阳相配的韵母在合音成子变韵时有平行的语音变化：

ei → iːou　　uei → uiːou(零声母后)，yu(其他声母后)

əŋ → iːŋ　　uən → uiːŋ(零声母后)，yːŋ(其他声母后)

合口韵韵母的两个变体以同样的声母情况为条件，显示出合音机制的同一性：

苇ᶜuei → 苇子ᶜuiːou　　　　蚊꜀uən → 蚊子꜀uiːŋ

穗 suei' →(麦)穗子 ɕy:u'　　孙꜀suən →孙子꜀ɕy:ŋ

韵母 ei、uei 由韵腹元音前元音引发腭化作用。但 ən、uən 韵腹元音为央元音而同样发生腭化作用则缺乏音理上的根据。比较下列方言中的韵母语音形式，如黎城、平顺、高平 ɛ̃、iɛ̃、uɛ̃、yɛ̃，运城、夏县、闻喜、绛县 ẽĩ、iẽĩ、uẽĩ、yẽĩ，洪洞 en、ien、uen、yen 等，则可以假设获嘉话 ən 组基本韵母早期也曾经以前元音作为韵腹元音，因此也具有引发腭化的条件，可以和 ei 组基本韵母作完全平行的语音变化。

(14)ɐʔ → io

该组基本韵母生成子变韵的情况不难解释。但开口韵基本韵母 ɐʔ 有少数字生成齐齿韵的子变韵，却无法从音理上说明。如：

伯 pɐʔ꜆ →(大)伯子 pio'

麦 mɐʔ꜆ →(种)麦子꜀mio

虱 sɐʔ꜆ →虱子꜀ɕio

可以设想，这是新老读音的更替改变了单字音的结果。即如"伯"(梗开二陌)、"麦"(梗开二麦)、"虱"(臻开三栉，生母)在下列方言中的韵母，如洪洞꜀pɛ、꜀mɛ、꜀sɛ，闻喜 piɛ'、miɛ'、siɛ'，韵腹前元音可以引发腭化作用，使韵母由开口韵转变为齐齿韵。获嘉话"伯"、"麦"、"虱"等字如果早期的读音也属齐齿韵，则合音将是简单合理的：

伯 piɐʔ꜆ →伯子꜀pio

麦 miɐʔ꜆ →麦子꜀mio

虱 ɕiɐʔ꜆ →虱子꜀ɕio

以上对各组基本韵母和子变韵对应的分析说明，获嘉话子变韵合音的复杂难解完全是某些基本韵母的变化造成的。因为目前的基本韵母是新起的，而子变韵是早期生成的，新的基本韵母自然难以解释早期生成的子变韵。所以问题实际上不在于合音，所谓的合音复杂其实是一种假象。

## (四)子变韵的演变

### 1. 子变韵在各地的不平衡发展

子变韵分布在山西、河南地区，在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兼有初生、兴盛、衰落等各种不同的情况。

在有些方言中，子变韵正处在生成的过程之中。如原平：

钉子 ꜀ti$^{213}_{24}$ ɚ

盖子 kæɛ$^{53}_{5}$ ɚ

虫子 ꜀ts'uoŋ$^{33}$ ŋ̍

银子 ꜀iəŋ$^{33}$ ŋ̍

砂 ꜀sa$^{213}$ → 砂子 sa:$^{243}$

刷 suaʔ꜇$^{4}$ → 刷子 sua:$^{243}$

“子”尾在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自成音节的 ɚ，在鼻尾韵字后则被同化成 ŋ̍。如果前字韵母是低元音的 a、ia、ua、aʔ、iaʔ、uaʔ，则“子”尾消失，音长融入前面的音节，生成长音型子变韵。可见原平话正处在由自成音节的“子”尾向子变韵过渡的阶段。

晋南、豫北的一些方言里，子变韵正处在兴旺的阶段。如晋南的运城、闻喜、夏县、临猗、平陆，晋中的和顺，豫北的获嘉、济源、长垣等，子变韵数量多，系统完整，语法意义明确。如前文曾提到闻喜话 36 个基本韵母中有 29 个可以生成子变韵。又如临猗话既有自成音节的“子”尾 ꜌tou，40 个基本韵母中又有 36 个可以生成子变韵，自成音节的“子”尾和子变韵可以自由交替使用。如：

剪子 ꜂tɕiæ̃$^{53}$ tou꜊ ~ ꜂tɕiæ̃:$^{53}_{553}$

可见临猗话也正处在自成音节的“子”尾向子变韵的过渡阶段。

又如运城三路里话，40 个基本韵母可以生成 38 个子变韵，“子”尾 ou 在前字前元音韵母后得以保留，同时又保持长音节，有

17 个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如:

车꜀tʂ'ᴇ →车子 tʂ'ᴇ:əu³¹

筷 k'uaɛ꜄ →筷子 k'uaɛ:ɔu³³

钳꜀tɕ'iæ̃ →钳子 tɕ'iæ̃:ɔu¹²

裙꜀tɕ'yẽ →裙子 tɕ'yẽ:əu¹²

"子"尾 əu 在低元音、后元音和鼻尾韵后失落,有 21 个单纯长音型子变韵,如:

瞎꜀xa →瞎子 xa:³¹

豹 pau꜄ →豹子 pa:u³³

箱꜀ɕiaŋ →箱子 ɕia:ŋ³¹

可见运城三路里话正处在由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向单纯长音型子变韵转变的过程中。

但在晋东南和河南中部一些方言里,子变韵数量显著减少。如郑州话 42 个基本韵母,只有 8 个子变韵:

ou iou uou you

au iau uau yau

子变韵韵类显然已经经过归并,目前只有低元音和中元音音位各一组。

河南中部某些方言中的子变韵则甚至已经成为残余现象。如舞阳话子变词数量很少,本地人也已经不能鉴别它们,只把它们看成是单字的另一读音。例如:

帽 mau꜄ →麦帽꜀mai mo

鸹꜀kua →老鸹꜂lau kuo

鹊꜀ts'iuo →马尾鹊꜂ma ꜂i ꜀ts'io

妮꜀ni →小妮꜂siau niŋ

子变韵在这些方言中成为残余现象,原因在于"子"尾语法意义的磨损。前文已经提到,子变韵是合音的产物。和儿化韵相同,它的特点也是一个音节中有两个语素并存。但是汉语中一个音节

不能包含一个以上的语素。子变韵的情况显然不符合汉语中语素和音节的结构规律，因此其中必然要有一个语素被排除。子变韵中前面的明显的语素因为具有声母以至声调上的语音优势，所以被保存了下来，而后面的隐蔽的语素"子"本来就已经变形，显然容易被磨损排除。另外，方言中子变韵从不写出"子"尾这一事实也加快了"子"尾的磨损。

从上述情况来看，目前子变韵在晋南、豫北正处在兴旺发达的阶段。这一地区可以说是子变韵分布的中心地区。但在河南中部，则子变韵已经趋于衰落，面临消亡。

**2. 两类"子"尾的关系**

前面曾经提到，"子"尾可以分为两类：ə 类和 u 类，两类都可以生成子变韵。ə 类"子"尾生成的子变韵较为少见，目前只在山西原平、晋城等方言中发现。u 类"子"尾生成的子变韵则分布在山西、河南许多方言里，是子变韵主要的语音形式。

方言中两类"子"尾和基本韵母的配合，还反映出时间层次上的差别。比如从前述获嘉话"盖子"kioˀ、"筷子"k'yoˀ的音值，可以推测生成子变韵时的基本韵母应该和山西晋城 ᴇ、uᴇ、离石 ie、ye 等相近。这说明获嘉等方言的 u 类"子"尾一般和比较老的基本韵母合音。山西原平话中的 ə 类"子"尾正处在合音生成子变韵的阶段，而原平话的基本韵母系统显然不如离石等方言那样老。由此看来，u 类"子"尾是比 ə 类"子"尾更早出现的语音形式。

不过 u 类"子"尾也能和新起的基本韵母合音生成子变韵。以河南长垣话下列几组基本韵母和子变韵的对应为例：

a、ia、ua → aːo、iaːo、uaːo

ai、uai → aːi、uaːi

ao、iao → aːo、iaːo

aŋ、iaŋ、uaŋ → aːŋ、iaːŋ、uaːŋ

子变韵类型为长音节的拼合型和单纯的长音型。其中蟹摄开合口

二等韵字的基本韵母 ai、uai 大多如上生成单纯长音型子变韵。如：

带子鸡嗉～、袋子口～ taːiʾ

台子广～、苔子蒜～ ꜀tʻaːi

奶子(乳房) ʿnaːi

蔡子小～ tsʻaːiʾ

但另有少数字的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显示出是由 ɛ、uɛ 一类较老的基本韵母生成的。如：

孩子꜀xɛːo

海子(海滩里)ʿxɛːo

筛子꜀ʂɛːo

拐子线～ʿkuɛːo

个别词甚至兼有两种语音形式的子变韵。如：

盖子 kaːiʾ瓷～ ～kɛːoʾ锅～

筷子 kʻuaːiʾ饭～，竹～ ～kʻuɛːoʾ竹～

这说明 u 类"子"尾除和较老的基本韵母合音外，还能和后起较新的基本韵母合音。看来 u 类"子"尾具有很强的构形能力，不受特定韵母系统的限制，活动的时限要大于 ɔ 类"子"尾。

### 3. 子变韵和历史上的人口迁徙

从本章前面所述，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由较早的 u 类"子"尾合音生成的子变韵并见于山西和河南，但和 u 类"子"尾合音的基本韵母较老的语音形式却只见于山西方言，以致在需要解释河南地区子变韵的合音时不得不转向山西方言寻找线索。也许这些由较老的基本韵母合音生成的子变韵是在山西方言中生成，然后扩散到河南地区的，即这是一种由外方言借入的语言现象？或者说，河南地区早期的方言和山西方言类似，也能生成这类子变韵？这里就可能有一个人口流动的问题。而历史记载表明，事实是支持这后一种推测的。

造成山西河南地区子变韵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历史上的移民。根据史籍记载，元末农民起义，中原地区成为争战之地，居民人口急剧减少。因此明王朝在建国后迅速采取了移民的措施。《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一)中说，洪武二十一年"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也说，该年"迁山西泽潞二州之民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同书卷一九七、一九八还提到洪武二十二年沁州民移徙彰德、卫辉、怀庆、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泽潞二州即今晋东南晋城、长治地区，彰德、卫辉、怀庆、归德都在今河南豫北地区和商丘地区。这说明明代初年曾经有大量晋东南地区的移民进入豫北等地。以后永乐年间"又屡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宣德、正统年间大批流民自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地涌入河南府，进而移至南阳府，说明山西移民后来还陆续有迁徙到河南中部西部的。

明初大量山西移民进入人烟稀少的豫北地区，使当地居民的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豫北地区为移民带来的山西方言所覆盖，河南中部也受到山西方言的重大影响。如在嘉靖时东昌府濮州(今河南范县濮城镇)人桑绍良所著《青郊杂著》的本地方言音系中，"红"字归入庚部合口，和"横"同音，"稻"作透母上声(《集韵》：稻，"杭也，关西语，土晧切")，反映了山西方言的语音特点；古浊声母塞音塞擦音归次清，也和今晋南某些方言情况相同。经过六百多年的变化发展，目前河南豫北地区西部的方言仍然和山西方言相同，但河南其他地区的方言虽然还保存有山西方言的影响，却已经演变成中原官话，声韵调系统和山西方言有了很大的差别。

由此可见，子变韵是在数百年前随着山西方言进入河南地区的。它是由原来山西方言的基本韵母生成的，所以它的合音不可能由以后新的中原官话的基本韵母来解释。前面说过，子变韵在河南少数方言中也能通过 u 尾和新的基本韵母合音而生成(如长垣话)。但总的来说，在河南广大的中部地区，子变韵由于汉语语

素和音节结构规律的制约，由于远离晋南豫北的中心地区，也由于缺乏本地方言基本韵母系统的支持，正不可避免地面临衰亡。

## 参考文献


崔　灿、夏跃进：《舞阳方言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贺　巍：《济源方言记略》，《方言》1981.1。

《获嘉方言的一种变韵》，《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商务印书馆，1982。

《获嘉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

侯精一：《晋东南地区的子变韵母》，《中国语文》1985.2。

《垣曲方言用变调表示"子"尾》，《中国语文》1988.4。

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金梦茵：《原平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9。

李　荣：《汉语方言调查手册》，科学出版社，1957。

卢甲文：《郑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2。

吕枕甲：《运城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裴泽仁：《明代人口迁移与豫北方言——河南方言的形成（一）》，《中州学刊》1988.4。

沈慧云：《晋城方言的"子尾"变韵》，《语文研究》1983.4。

田希诚：《山西和顺方言的子变韵母》，《中国语文》1986.5。

《和顺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7。

王洪君：《闻喜方言的 u 化变音》，1987。（未刊）

徐承俊：《温县方言与普通话简说》，《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五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徐通锵、王洪君:《闻喜方言调查字表》,1985。(未刊)
张启焕、陈天福、程仪:《河南方言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 八　连读变调

## (一)连读变调的性质

连读变调是一种语流音变现象。由于人们对发音动作简便的要求,语流中相邻音节的声调在调型调值方面发生一种相互协调的变化,因此产生了变调。常见的变调有同化异化等,同化异化根据位置又有顺逆的不同。顺同化如苏州“阿侄”ɒʔ$^{4}$ zɤʔ$^{23}_{4}$,顺异化如温州“紫菜”søy$^{42}$ ts'e$^{42}_{21}$,逆同化如福州“头先”t'au$^{52}_{44}$ leiŋ$^{44}$(s-),逆异化如南昌“旅馆”li$^{213}_{24}$ kuɔn$^{213}$。汉语绝大多数方言都有连读变调现象,而以吴、闽两方言最为复杂。

## (二)连读变调的类型

连读变调虽然是一种语音现象,但也可能兼有其他非语音因素的影响。根据这方面的不同情况,可以把连读变调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1.由语音条件决定的连读变调**

这种类型的连读变调,变化结果可以用单纯的音理来解释。比如语流中两个曲折调相连时,为了发音简便而要求减少曲折,前

一个曲折调往往就变成单纯的升调。比如济南“飞机”꜀fei$^{213}_{23}$ ꜀tɕi$^{213}$，武汉“洋苕”꜁iaŋ$^{213}_{13}$ ꜁sau$^{213}$，天津“厂长”꜂tʂ'aŋ$^{213}_{14}$ tʂaŋ$^{213}$，洛阳“重要”tʂuŋ$^{412}_{13}$ io$^{412}$。这些不同的例词中相对应的单字调和变调的调型完全相同，仅仅音高有点差异。可见它们是在同一语音条件支配下发生的同一性质的变化。

不过语音变化还要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所以变化的发生也只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比如，不同的方言里即使有同样的语音条件，变调也不一定都会发生。如济南话上声是高平调 55，两个上声字相连时，前字因异化作用而变调，如“母马”mu$^{55}_{42}$ ma$^{55}$。而北京话虽然阴平也是高平调 55，但两个阴平字相连时前字不变调，如“书桌”ʂu$^{55}$ tʂuo$^{55}$。又如，不同的方言里，即使在相同语音条件下都发生变调，结果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如北京话两个上声字相连时，前字由曲折调变成升调，结果减少了一个曲折，如“土改”t'u$^{214}_{35}$ kai$^{214}$。但是绍兴话两个阴上（调值 335 或 325）字相连时，前字变成升调，同时后字变成降调，结果减少了两个曲折，如“土改”t'u$^{325}_{35}$ kE$^{325}_{52}$。当然，以上事例并不否定语音条件的存在，只是说明它的适用性不是没有限制的。

**2. 和位置有关的连读变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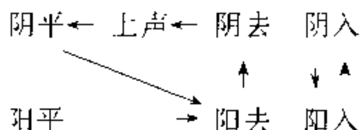
有时一个音节是不是发生变调，和前后音节的声调甚至自身的声调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只取决于该音节在语流中所处的位置。这种连读变调主要见于闽南话。以厦门话为例。厦门话句末、音段末、词末的音节和轻声前的音节不变调，代词不论在语流的任何位置也不变调。例如：

我唔食。gua$^{51}$ m̩$^{33}_{21}$ tsiaʔ$^{5}$。

汝有看戏无？li$^{51}$ u$^{33}_{21}$ k'ũã$^{21}_{55}$ hi$^{21}$ bo?

“食”和“戏”不变调，“我”和“汝”也不变调。但在其他情况下，处在前字位置的音节都要变调。下面列出前字阴平变调的一组两音节

入字变调同阴入。(还有少数喉塞尾入声字变调后失落韵尾,阴入字变调同阴上,阳入字变调同阴去,如“铁路”tʻi$^{51}$(←tʻiʔ$^{32}$)lɔ$^{33}$,“石灰”tsio$^{21}$(←tsioʔ$^{5}$) hue$^{55}$。)单字调和变调的对应可以表示如下:




上表中每一个前字单字调都可以发生变调,而每一个变调的调值又和另一个单字调的调值相同。这看来像是前字单字调决定了前字变调的种类,但原因却很难从音理上加以解释。这里先借用北京话的例子来说明。如果北京话“土改”一词中前字上声变调同阳平,那么前字阳平在同样的语音环境中就应该不变调。事实也就是这样,如“涂改”一词中前字阳平的“涂”就不变调,“涂改”和“土改”因此同音。但是厦门话单字调 A 产生变调 A' 后并不能使和变调 A' 同调值的单字调 B 在同样的语音条件下不再变调,单字调 B 产生变调 B' 后也不能使和变调 B' 同调值的单字调 C 在同样语音条件下不再变调,等等。由此可见,厦门话前字的单字调虽然有自己变调的种类,却不是变调值生成的真正条件。唯一能肯定的,是它使变调得以产生。这就是说,产生变调的真正原因应该是该字的前字位置。前字发生变调,说明随着还有后字。所以前字位置上发生变调可以表明一个语素已经投入使用,已经处在词和句子的语流之中,不再是字库中一个个孤立的语素了。这在语言心理上,无疑是重要的。

**3. 和构词情况有关的连读变调**

构词情况的不同会影响语流中音段的划分,在心理上或实际上使音段分界处各音节的语音关系和音段内部各音节的语音关系发生差别,从而产生不同的连读变调。另外,不同词组中意义重点所在不尽相同,如主谓式词组中的主语和谓语是意义重点,述宾式

词组中的宾语是意义重点，等等，意义重点所在的音节常常不变调，这也会使连读变调变得不同。因此，构词虽然属于语法的范围，但会影响到语音层面，使不同语法结构的音段产生不同的变调。

汉语多数方言在连读变调中对构词条件的要求并不严格，而且由于口语中语速、节奏、间歇、着重点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变调常常会出现两可的情况。比如北京话上声在上声前变读同阳平，复合词“炒菜”和述宾式词组“炒菜”的连调式同为 35 + 214；多音词如“虎骨酒”、主谓句如“我也有”变调情况也相同，而且都可以有两种连调式：(1)35 + 35 + 214、(2)21 + 35 + 214。

但有的方言构词情况在连读变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复合词和词组有不同的变调规律，不同结构的词组(如联合式、偏正式、主谓式、述宾式、述补式)也有不同的变调，区别严格。这种情况主要见于吴方言，也见于官话晋陕地区的少数方言。以温州话首字阴平的两音节连调式为例。温州话复合词有复杂而有系统的变调，主谓式词组中主语谓语都不变调，述宾式词组中述语变调，宾语不变调。如：

复合词：霜冰 $ɕyɔ^{44}_{32}$ $peŋ^{44}_{33}$

主谓式：天光 $t‘i^{44}$ $kuɔ^{44}$

述宾式：开车 $k‘e^{44}_{3}$ $ts‘o^{44}$

吴方言北部地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部分词组虽然也有自己的变调规律，但也可以按复合词的变调规律变调。这样，复合词的连调式就扩大了适用范围。例如上海话首字阴平的两音节变调：

复合词：家生 $ka^{53}_{55}$ $saŋ^{53}_{21}$

主谓式：天亮 $t‘i^{53}_{44}$ $liaŋ^{23}$，$t‘i^{53}_{55}$ $liaŋ^{23}_{21}$

述宾式：拎水 $liŋ^{53}_{44}$ $sɿ^{34}$，$liŋ^{53}_{55}$ $sɿ^{34}_{21}$

主谓式词组“天亮”和述宾式词组“拎水”中的主语“天”和述语“拎”

变调，谓语“亮”和宾语“水”不变调，但两个词组都可以又按复合词的连调式变调。

山西和顺话也有类似的语法结构影响变调的现象。如两音节词语中，后字上声在复合词和述宾式词组中情况不同，前者变调，后者不变：

大雨 ta$^{44}$ y$^{35}_{42}$

下雨 ɕia$^{44}$ y$^{35}$

某些方言中，有的词语因为有特殊的语法结构而需要有特殊的变调。例如北京话形容词重叠儿化构成的状态词，重叠成分不论单字调是什么，后一音节都要变读同阴平，变调的同一性反映了语法意义上的同一性。如：

香香儿的 ɕiaŋ$^{55}$ ɕiaŋr$^{55}$ tə˙

白白儿的 pai$^{35}$ pair$^{35}_{55}$ tə˙

好好儿的 xau$^{214}_{21}$ xaur$^{214}_{55}$ tə˙

快快儿的 k‘uai$^{51}$ k‘uair$^{51}_{55}$ tə˙

有的方言中，由于构词情况对变调的影响，已经形成的连调式也可能再度变化。例如吴方言浙江地区的一些方言中，复合词虽然有自己的变调规律，但在组成词组时还要按词组的变调规律再次变调。下面以绍兴话为例来说明。

首先，绍兴话首字阴去、阳去的两音节复合词连调式分甲、乙两式，其中甲式前字不变调，后字声调变同前字（入声字为促调）。如（例词按后字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的顺序排列）：

(1)33—33(3)　泰山　戒指　照相　印刷

　　　　　　　算盘　炮仗　笑话　教育

(2)11—11(1)　地方　代表　忘记　未必

　　　　　　　渡船　运动　豆腐　练习

其次，绍兴话后字阴去、阳去的两音节述宾式词组连调式中，

后字宾语阴去变读55，阳去不变；前字述语阴调字在宾语阴调字前变读同阴去33(3)，阳调字前变读55(5)；前字述语阳调字在宾语阴调字前变读同阳去11(1)，阳调字前变读55(5)：

(1)33(3)—55：挑担　讨债　唱戏　织布

11(1)—55：查账　上当　射箭　立志

(2)55(5)—11　生病　写字　做寿　触电

抬轿　坐轿　认字　入味

比如单音词"担"tæ$^{33}$在述宾式词组"挑担"中作宾语时变读成tæ$^{55}$，调值由中平变成高平。

但如果述宾式词组中的宾语不是单音词，而是首字阴去、阳去的复合词，那么其中前字阴去的复合词的连调式将再次变调，由33－33(3)变成55－55(5)，但前字阳去的不变，仍是11－11(1)。如：

(1)33(3)—55—55(5)：登泰山　打算盘　放炮仗　拍照相

11(1)—55—55(5)：还价钿　坐汽车　话笑话　轧姘头

(2)55(5)—11—11(1)：收旧货　打阵头　中状元　拍电报

提问题　赚外快　吃便饭　热下饭

就述宾式词组来说，宾语不论是单音词还是多音词，变调的要求是一致的：阴去的单音词变读成55，首字阴去的多音词变读成55－55(5)等，阳去的单音词和首字阳去的多音词不变，是11和11－11(1)等。但就多音词本身来说，处在述宾式词组以内和以外时，变调就不同。如"泰山"作为两音节复合词是t'a$^{33}$ sæ$^{52}_{33}$，作为述宾式词组中的宾语则是t'a$^{33}_{55}$ sæ$^{52}_{55}$，两个音节的调值都由中平变成高平，和前述作为宾语的单音词"担"调值由中平变成高平相同。这种变调现象可以叫做二次变调。汉语方言中单音词在不同语法环境中有不同变调，固然反映语法结构对变调的影响；但已经变调的多音词在另一种语法环境中要再次变调，作为语法结构层次性在变调中的反映，显然是更为深刻的。

## (三)连读变调和轻声

有连读变调的方言大多也有轻声。轻声也是一种变调，但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轻声的调值是在相邻音节声调的影响下产生的。它或是反映前字声调曲线变化的趋向，音高随前字声调高低升降的走向而变动。如北京话：

姑娘 ku$^{55}$ niaŋ$^{2}$

姨父 i$^{35}$ fu$^{3}$

枕头 tʂən$^{214}_{21}$ t'ou$^{4}$

袜子 ua$^{51}$ tsɿ$^{1}$

或者是前字声调的延长，音高和前字声调的终点相近。如扬州话：

衣裳 i$^{21}$ saŋ$^{1}$

蚕子 ts'æ̃$^{34}$ tsɛ$^{4}$

晚上 uæ̃$^{42}$ saŋ$^{2}$

夜头 iɪ$^{55}$ t'ɤɯ$^{5}$

日里 ləʔ$^{4}$ li$^{4}$

有的方言轻声也影响前字，使前字发生变调，同时又受前字变调的影响。如济南话：

金子 tɕiẽ$^{213}_{21}$ tsɿ$^{1}$

鹁鸽 pɤ$^{42}_{55}$ kɤ$^{5}$

暖壶 nuæ̃$^{55}_{213}$ xu$^{4}$

露水 lu$^{21}_{55}$ ʂuei$^{2}$

其次，轻声的另一特点是音节的短促化。变调具有和单字调类似的音长和调域，轻声则因为音长的缩短，调域也大大压缩，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没有音高变化的短促音节。比如北京话的轻声实际上在前字阴平、阳平、去声后是降调，在上声后是升调，但都被处

理成没有起头和终点、没有音高变化的音点。

在有入声韵的方言里，由于入声具有短促的特点，轻声就常常以入声的形式出现，呈现出轻声化即是入声化的现象。如太原话“洋曲*灯儿”iõ$^{11}$ tɕʻyəʔ$^{2}_{54}$ təŋr$^{11}$中的“曲*”tɕʻyəʔ$^{2}_{54}$是“取”tɕʻy$^{53}$的轻声形式，“燕则*”iɛ$^{45}$ tsəʔ 中的“则*”tsəʔ 是“子”tsɿ$^{53}$的轻声形式；苏州话“勃*荷”bɤʔ$^{23}$ dæ$^{24}_{21}$中的“勃*”bɤʔ$^{23}$是“葡”bu$^{24}$的轻声形式，“砚瓩*”ȵiɪ$^{31}_{22}$ ŋoʔ$^{23}_{4}$ 中的“瓩*”ŋoʔ$^{23}_{4}$ 是“瓦”ŋo$^{31}$的轻声形式。方言中入声形式的轻声还没有形成有系统的规律。

## （四）变调和单字调的关系

### 1. 单字调、变调和本调

总的来说，连读变调中，变调是单字调在语流中的变形。如北京话“土改”tʻu$^{214}_{35}$ kai$^{214}$中，“土”的单字调是 214，变调是 35，调值 35 是调值 214 的变形。在大多数情况下，单字调就是本调。相对来说，本调是第一性的，变调是第二性的。本调可以独立存在，变调则只见于语流之中，不能独立存在。

单字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本调，是说有时并不就是本调。以山西原平话为例来说明：

公羊 kuəŋ$^{213}_{31}$ iɔ̃$^{33}$

母羊 mu$^{213}$ iɔ̃$^{33}$

例词中，“公”、“母”单字调相同，语音环境也相同，但变调情况不同，“公”字变调，“母”字不变调。“公”、“母”的单字调是由古清平字和古清上次浊上字的声调合流而成的。但造成目前不同变调情况的并不是合流以后的单字调，而是合流前的不同声调。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单字调就不能笼统地说成是生成变调的本调（但有可能是生成其中某一个变调的本调）。

## 2. 变调和单字调的关系

变调一般是由单字调生成的，但它们属于不同的语音层面，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变调和单字调又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相互关系的表现主要有下面两个方面。

(1)变调和单字调相对独立

变调和单字调有各自的系统。变调系统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有不同于单字调系统的分合方向和变化速度。以济南话为例。济南话阴平和去声单字调不同，但在去声字前的变调相同：

阴平＋去声：三步 $sæ̃^{213}_{23}$ $pu^{21}$

去声＋去声：散步 $sæ̃^{21}_{23}$ $pu^{21}$

单字调不同而变调合流，说明济南话变调的变化速度要快于单字调。

浙江遂昌小槎话的情况不同。如在单字调系统中，全浊上字和清上字同调，和浊去字不同调。但在变调系统中，全浊上字和清上字不同调：

坐(全浊上)$su^{33}$→坐位 $zu^{21}$ $uei^{231}$

所(清上)$su^{33}$→所谓 $su^{42}$ $uei^{231}$

却和浊去字同调：

弟(全浊上)$ti^{33}$→弟子 $di^{21}$ $tsɿ^{33}$

地(浊去)$di^{231}$→地址 $di^{21}$ $tsɿ^{33}$

这说明变调和单字调两个系统有不同的分合方向。此外，全浊上字在变调中声母保持浊音音值而在单字调中清化，还从另一方面说明遂昌小槎话变调系统的变化速度要慢于单字调系统。

(2)变调和单字调的相互呼应

变调和单字调虽然不属于同一语音层面，但由于变调是在单字调的基础上生成的，两个系统关系密切，在发展过程中常常表现出相互影响、彼此呼应的一面。下面以苏州话为例说明。苏州话有七个调类，其中舒声五个调，即阴平 44，阳平 24，上声 52，阴去

412，阳去 231。首字舒声的两音节复合词有五个连调式（下面举例中只标写变调值，括弧里是后字入声的变调值）：

阴平式 44—21（<u>21</u>）：天井 t'iɪ tsin　　巴结 po tɕiɪ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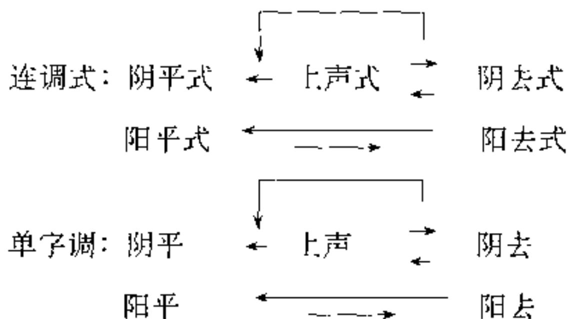
阳平式 22—44（4）：　庭柱 din zʮ　　茶叶 zo jiɪʔ

上声式 52—21（<u>21</u>）：口气 k'ɤ tɕ'i

阴去式 41—34（<u>34</u>）：教师 tɕiæ sɿ　　刺激 ts'ɿ tɕiɪʔ

阳去式 24—21（<u>21</u>）：眼泪 ŋɛ li

但是苏州话口语中不少复合词有不止一种连调式。如前字浊平的"同志"和前字浊上的"动员"都兼有阳平式和阳去式，前字清上的"早饭"兼有上声式和阴去式，前字清去的"破坏"兼有阴去式、上声式和阴平式，等等。与此同时，口语中许多单字也或是有不止一个调值，或是虽然只有一个调值，但不符合声调对应规律。如清上字"左"、"岂"兼读上声和阴平，"矩"读阴平；清去字"据"、"桂"兼读阴去和阴平，"亚"、"讽"兼读阴平和上声，"错"读阴平，"删"、"佐"读上声；浊去浊上字"鲍"、"务"、"砚"、"柚"兼读阳去和阳平，"腐"、"尾"读阳平，等等。把连调式和单字调的情况联系起来观察，可以发现复合词连调式的不稳定和单字调类的不稳定，二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这种情况可以表述如下（箭头表示混淆的方向）：




连调式中阴调的上声式和阴去式多有混淆，二者又都有不少混入

阴平式，这和单字中上声调和阴去调常常混淆，又都有混入阴平调的情况相平行。连调式中阳调的阳去式和阳平式也多有混淆，但以阳去式混入阳平式居多，这和单字中阳去调和阳平调常常混淆，而以阳去调混入阳平调居多的情况也相平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易说明

事实上产生苏州话变调和单字调不稳定现象的原因不在苏州话自身，而在邻近的上海话。上海话中青年口音的声调已经完成了阴上和阴去，阳平、阳上和阳去的单字调和连调式的合流，首字舒声有三个单字调（阴平、阳平、去声）和相应三个连调式，目前还正在进行去声（清去、清上）向阴平的单字调和连调式的归并。正是上海话声调系统的这种演变，影响到苏州话的声调系统使它发生类似的变化。目前苏州话实际上正在经历五个单字调和五个连调式向三个单字调和三个连调式的转变，而混乱则是过渡状态的一种表现。混乱中表现出来的单字调和连调式的平行变化，则是一种相互的呼应，反映了变调系统和单字调系统间深刻的关系。

**3. 变调、单字调和本调关系的处理**

由于变调和单字调不属于同一语音层面，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在处理两个系统的关系时就不能对它们等同看待，否则就会造成声调系统的混乱。下面分别说明处理中若干常见的问题。

（1）变调和单字调调值相同时的分混

方言中可能某个变调和某个单字调调值相同。这常常是变调变化的结果。起初变调的调值和某一个单字调的调值只是相近，然后就发生了二者越益接近终致合流的过程。如北京话目前上声调在上声前变同阳平调，但早期的记载曾经提到这一变调值要比阳平调略低，说明有过这样的合流过程。但调值趋同并不改变变调和单字调的不同性质，不能因此就把变调和单字调等同起来。所谓"北京话上声在上声前变成阳平"，也许是一种方便的说法，但却混淆了变调和单字调的区别。因为"变成"还包括调值以外系统

上的混同。又如成都话重叠式名词"坛坛"$t'an^{21}\ t'an^{21}_{11}$,"罐罐"$kuan^{13}\ kuan^{13}_{44}$,"后字变调成阴平"的说法也同样混淆了变调和单字调的区别。实际上可以借助邻近方言的调类调值来说明成都话的阴平调和变调 44 无关。如梓潼话中变调调值同样是 44,但阴平调调值却是 45,并不相同。

如果因为变调和单字调的调值相同就把变调处理成单字调,还会使声调系统变得杂乱。现以昌黎城关话的单字调调类为例:

| | | |
|---|---|---|
| 阴平 | 32 | 天八(清平、清入) |
| 阳平甲 | 13 | 甜白(浊平、全浊入) |
| 阳平乙 | 11 | 甜～的 石～头(浊平、全浊入) |
| 上声 | 213 | 古老国织(清上、次浊上、清入) |
| 阴去 | 55 | 贵做(清去) |
| | | 柜庙道麦(浊去、全浊上、次浊入) |
| 阳去 | 24 | 柜庙大～道～上(浊去、全浊上) |
| | | 天～亮八～个(清平、清入) |
| | | 甜～水儿 白～露(浊平、全浊入) |

从各调类的例字可以看出,阳平乙是大部分阳平甲字在轻声前的变调,阳去调中一部分字是阴平字和阳平字在轻声前的变调,浊去、全浊上字两见于阴去调和阳去调则是文白异读。但是因为阴平字和阳平字在轻声前并不一律变调,即是否变调缺乏严格的语音条件,所以不得不作如上处理,按调值逐字归类,甚至设立新调类。不过缺乏严格的语音条件的情况实际上是昌黎县郊区方言和邻县方言影响的结果。下面列出这些方言阴平调和阳平调的调值:

| | 阴平 | 阳平 |
|---|---|---|
| 张家石门 | 32 | 32 |
| 朱建坨 | 32 | 24 |
| 曹东庄、陈官屯 | 44 | 24 |

张家石门话平声不分阴阳，其中清平、清入字在轻声前或不变调，或变读24，浊平、全浊入字在轻声前变读11；其他方言阴平字在轻声前变读24，阳平字在轻声前不变调。由此可见，昌黎城关话少数阴平、阳平字在轻声前变读24是和以上各方言的影响有关的，设立阳平乙调还完全是张家石门话影响的结果。这些因外方言影响而产生的语音变化自然难以用本方言的语音条件来说明。但厘清外来影响以后，昌黎城关话变调系统和单字调系统的界限将是清楚的。如果把变调值排除出去，单字调系统将可以作如下的归纳：

阴平　32　天八(清平、清入)

阳平　13　甜白(浊平、全浊入)

上声　213　古老国织(清上、次浊上、清入)

阴去　55　贵做柜文庙文道文麦(清去、浊去、全浊上、次浊入)

阳去　24　柜白庙白道白(浊去、全浊上)

这样处理的结果会出现一个复杂的变调系统，但为从性质上分清单字调和变调，仍然是必要的。

(2)变调和单字调的对应

变调和单字调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一一对应。因为变调可能合流，造成一个变调和几个单字调的对应；单字调也可能合流，造成一个单字调和几个变调的对应。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把合流而成的一个单字调再勉强分开，以便和几个变调分别对应，造成的混乱将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以山西忻州话为例来说明。

忻州话被处理成六个单字调，即阴平、阳平、上声、阴平上声、去声、入声。其中阴平、上声、阴平上声三个调类的调值同是313。调值相同而分成三个调类，是因为它们的变调情况不同。阴平和上声有不同的变调，反映它们有不同的来源(清平和清上、次浊上)。如：

阴平＋阴平　铺开 $p'u_{33}^{313}$ $k'æ_{31}^{313}$ 上声＋阴平　普通 $p'u_{42}^{313}$ $t'uəŋ^{313}$

阴平＋阳平　居留 $tɕy_{33}^{313}$ $liəu^{31}$　上声＋阳平　举人 $tɕy_{42}^{313}$ $zəŋ^{31}$

阴平＋入声　西域 $ɕi_{33}^{313}$ $yɔʔ^{2}$　　上声＋入声　醒木 $ɕi_{42}^{313}$ $məʔ^{2}$

阴平上调则是所辖字或是没有机会进入连调式产生变调以表明身份(如清上"饵"ˊə，清平"夯"꜀xɛ)，或是来历不明(如"□"隐藏 $tɕ'yɛ^{313}$)。但前文曾经提到，由于单字调系统和变调系统的分合方向和变化速度可能不同，汉语方言中变调有别而单字调混同的现象虽然少见，却属正常。忻州话目前阴平、上声有不同变调，固然反映它们早期的单字调曾经是不同的。但作为共时的声调系统，目前已经合流的声调再加区别，不仅否定了调类演变的事实，也削弱了声调系统的合理性。

(3)变调转为本调的可能性

前文曾经提到，单字调一般就是本调，变调是本调的变形。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从汉语某些方言的情况来看，有可能单字调实际上是变调，变调才是本调。

平山久雄曾经为此对厦门话的声调做过分析。下面先列出厦门话的七个单字调调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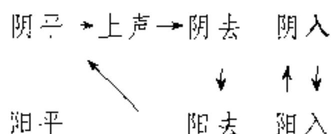
| | | | |
|---|---|---|---|
| 阴平 55 | 上声 51 | 阴去 21 | 阴入 3̲2̲ |
| 阳平 24 | | 阳去 33 | 阳入 5 |

再列出和七个单字调对应的变调值：

| | | | |
|---|---|---|---|
| 阴平 33 | 上声 55 | 阴去 51 | 阴入 5 |
| 阳平 33 | | 阳去 21 | 阳入 3̲2̲ |

从上列两表可见，厦门话去声和入声的单字调调值是阴调低、阳调高，变调值则是阴调高、阳调低。目前对汉语声调历史演变情况的一般认识是，由于浊声母发音时要在声母的声带振动方面额外耗费力量，因此同名调浊声母字的音高总是要比清声母字低，声调按清浊字分化的原因就在这里。厦门话去声、入声单字调阴调低、阳

调高的情况则显然和这一认识相矛盾，但变调的情况却与此相符。由于厦门话的变调调值没有超出单字调调值的范围，变调又基本上不出现在语流中的停顿之前，因此可以反过来假设厦门话的变调实际上是本调。其中上声（阴上）由于在停顿前不能长时间维持音高，因而由高平调（55）变成高降调（51），这就推动高降调的阴去也发生变化，从而出现循环的变调（只有阳平没有发生变化），生成目前厦门话全部单字调的调值（阳平据董同龢所记厦门话部分人口音的变调值同阴去而拟成13）。又由于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对应以阴入和上声、阳入和阳平最为类似，所以两个入声调的调值应该和这两个舒声调相近。这样调整处理后，古调值应该是阴平33，阳平13，上声55，阴去53，阳去31，阴入5，阳入13。以上变化看起来是一种链移。假设古调值向目前单字调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表中单字调和变调的变化方向和前文（158页）所述厦门话单字调和变调的变化方向正好相反。所以就厦门话的声调来看，单字调应该是变调，变调才是本调。

这一假设是以厦门话单字调中去声、入声阴调低、阳调高的反常事实作为依据的。但实际上汉语许多方言中都存在这种同名调阴调低阳调高的现象。比如关中地区的方言阴平的调值就普遍低于阳平：

| | 阴平 | 阳平 |
| --- | --- | --- |
| 西安 | 21 | 24 |
| 蓝田 | 31 | 24 |
| 长武 | 341 | 25 |
| 韩城 | 231 | 25 |

| | | |
|---|---|---|
| 潼关 | 42 | 25 |

如果考虑汉语的声调在最初按声母清浊分化后还可能继续发生演变，最后成为阴调低、阳调高的情况，就是完全可能的。上述假设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可能性。而就厦门话来说，上述假设也没有考虑目前平声、上声阴调高、阳调低的事实（厦门话浊上归阳去），同样也没有考虑近邻某些方言中存在的不一致现象，如漳州话单字调入声阴调高、阳调低：

| | | | |
|---|---|---|---|
| 阴平 55 | 上声 51 | 阴去 21 | 阴入 42 |
| 阳平 24 | | 阳去 22 | 阳入 12 |

泉州话单字调上声、去声、入声都是阴调高、阳调低（泉州话浊去归阳上）：

| | | | |
|---|---|---|---|
| 阴平 33 | 阴上 554 | 去声 41 | 阴入 43 |
| 阳平 24 | 阳上 22 | | 阳入 23 |

比较漳州、泉州、厦门三个方言的单字调系统，可以看出，它们的对应调类虽然音高不一，调型一般是相同的。根据这一点推测，厦门话声调的早期情况可能和漳州、泉州相近，同名调都是阴调高、阳调低，目前单字调去声、入声的阴调低、阳调高，只是调值后来变化的结果，即阴去、阴入由高降调变成低降调，阳去、阳入由低平调变成中平调、高平调。同名调调值的升降没有导致二者的合流，这是因为不同的调型使合流得以避免。河北南部一些方言的情况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 | 阴平 | 阳平 |
|---|---|---|
| 沙河 | 44 | 53 |
| 鸡泽 | 55 | 42 |
| 曲周 | 55 | 42 |
| 广平 | 55 | 41 |
| 成安 | 44 | 31 |
| 肥乡 | 55 | 31 |

| | | |
|---|---|---|
| 怀远 | 33 | 51 |
| 虢县 | 33 | 53 |

各方言中阴平的平调和阳平的降调，早期的音高可能相近，目前的差异应该是它们在演变过程中调值向不同方向浮沉的结果。但由于调型不同，无一方言两调合流。因此可以认为，厦门话单字调去声、入声早期也应该是阴调高、阳调低，和汉语一般方言中调类分化初期的情况并无二致，目前阴调低、阳调高的情况是后来演变的结果。单字调调值的演变和变调问题无关，从中并不能引出单字调实际上是变调、变调才是本调的结论。

## (五)连读变调和声调包络

### 1.吴方言中的特殊连读变调

吴方言区许多方言里，复合词的变调还有一种无法用相邻音节间的相互影响来说明的现象。下面以上海话的多音节连调式为例来说明。例词按首字调类的顺序排列，并和单字调调值比较(除首字外，入声不标促调)：

| 单字调 | 两音节 | 三音节 |
|---|---|---|
| 阴平 52 | 乌贼 55—21 | 乌贼鱼 55—21—21 |
| 阳平 23 | 薄荷 22—44 | 薄荷糖 22—44—21 |
| 去声 34 | 过房 33—44 | 过房囡 33—44—21 |
| 阴入 5 | 百合 3—44 | 百合花 3—44—21 |
| 阳入23 | 学生 1—23 | 学生子 1—11—23 |

| 四音节 | 五音节 |
|---|---|
| 空心汤团 55—21—21—21 | 清水大闸蟹 55—21—21—21—21 |
| 大清老早 22—44—21—21 | 陈年宿古董 22—44—21—21—21 |
| 过房囡儿 33—44—21—21 | 酱油西瓜子 33—44—21—21—21 |

法国梧桐 3—44—21—21　拆空老寿星 3—44—21—21—21
入舍女婿A.1—44—21—21 癞痢头儿子A.1—44—21—21—21
B.1—11—11—23　B.1—11—11—11—23

从上例可见，连调式各音节的调值实际上是首字单字调调值的扩展，是单字调越出音节的范围把自身的调值扩展到其他音节上的结果。这种声调的变化和一般的连读变调不同，它超出了邻接音节的范围，具有非线性的性质。

这一由非线性音变产生的变调，由于是单字调的扩展，被称作声调包络。又由于只出现在复合词中，也有人称作"词调"。就目前所知，它见于汉藏语系诸语言和非洲诸语言，汉语中目前只见于吴方言。根据已有的研究，和这种变调有关的规则可以归纳成以下各点：

(1)单字调的调型可以从首音节或末音节扩展到全词，由首音节扩展的叫右扩展(Right Spreading)，由末音节扩展的叫左扩展(Left Spreading)；

(2)调型没有扩及到的音节叫做附加音节，在汉语中常常是一个低调；

(3)音高分高(H)和低(L)，汉语中必要时分高(H)、中(M)、低(L)；

(4)分析单字调调值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表层和底层的差别，必要时按底层调值进行分析。

根据以上规则，上海话的上述连调式可以作如下的分析：

| 单字调 | 两音节 | 三音节 | 四音节 | 五音节 |
|---|---|---|---|---|
| 阴平 HL | H-L | H-L-L | H-L-L-L | H-L-L-L-L |
| 阳平 LH | L-H | L-H-L | L-H-L-L | L-H-L-L-L |
| 去声 MH | M-H | M-H-L | M-H-L-L | M-H-L-L-L |
| 阴入 MH | M-H | M-H-L | M-H-L-L | M-H-L-L-L |

阳入 LLM　　L-LM　　L-L-LM　A. L-H-L-L　　A. L-H-L-L-L
　　　　　　　　　　　　　　　　B. L-L-L-LM　B. L-L-L-L-LM

从分析中可见：

(1)上海话复合词连调式的扩展属右扩展；

(2)音高分高、中、低；

(3)单字调调值的扩展分 A、B 两式，A 式在两音节时已经扩及全词，从第三音节起都是附加音节(21)；B 式只见于首字阳入，可以无限制扩展，但四音节以上也可以按 A 式变调；

(4)阴入和阳入的单字调不按调值分析成 HH 和 LM，而根据在连调式中的表现分析成 MH 和 LLM。[1]

上述各种连调式，由于只是由有限的单字调调值扩展而成，多数扩展到两音节，再以附加音节连缀，结构简单。而且去声和阴入、阳平和阳入的单字调调型调值各各近似，首字去声和阴入的连调式、首字阳平和阳入(四音节以上)的连调式实际上还可以合并。因此这种性质的连读变调具有使方言中的变调由繁转简、形繁实简的作用。

2. **声调包络产生的原因**

声调包络产生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方言或语言中声调包络和声调本身同时产生。如藏语康方言木雅话本来没有声调，目前则已经有 53 和 13 两个声调，同时也衍生出两类声调包络，各有以下组成部分：53(HL)、13(LH)、55(HH)、11(LL)。如：

两音节：①55—53　　$na^{53}_{55}\ ta^{53}$(耳朵)

　　　　②11—53　　$da^{13}_{11}\ do^{13}_{53}$(磨刀石)

三音节：①55—55—53　$ta^{53}_{55}\ mi^{53}_{55}\ ma^{13}_{53}$(元宝)

---

[1] 据艾约瑟(J. Edkins)《上海口语语法》(1855 年)所记，上海话阴入调是"短高升"

②11—55—53 dzia$^{13}_{11}$ se$^{53}_{55}$ ma$^{13}_{31}$(蚕豆)

但在已有声调的汉语中情况不同。如上海话中具有严整系统的声调包络只见于中青年人口音而不见于老年人口音。老年人口音(有六个调类)两音节连调式的规则如下表所示：

<table>
<tr><td colspan="2">后字<br>前字</td><td>平</td><td>入</td><td>上</td><td>去</td></tr>
<tr><td colspan="2">阴平 53</td><td colspan="2">44—53(<u>53</u>)</td><td colspan="2">55—21</td></tr>
<tr><td rowspan="2">阳平 23</td><td>浊平</td><td>23—44</td><td>22—5</td><td colspan="2">23—44</td></tr>
<tr><td>浊上去</td><td colspan="2">23—53(<u>53</u>)</td><td>①23—53<br>②22—44</td><td>22—44</td></tr>
<tr><td colspan="2">上声 44</td><td colspan="2" rowspan="2">34—53(<u>53</u>)</td><td rowspan="2">①34—53<br>②44—44</td><td>44—44</td></tr>
<tr><td colspan="2">去声 34</td><td>①55—21<br>②44—44</td></tr>
<tr><td colspan="2">阴入 5</td><td>4—53</td><td>3—5</td><td colspan="2">4—44</td></tr>
<tr><td colspan="2">阳入 <u>12</u></td><td>1—23</td><td>2—5</td><td colspan="2">1—23</td></tr>
</table>

表中共生成十种两音节连调式。三音节、四音节等连调式可以由两音节连调式扩展生成。各不同音节的连调式对应如下：

| 两音节 | 三音节 | 四音节 |
|---|---|---|
| 44—53 | ①44—44—53 | ①44—44—55—21 |
| | ②44—44—21 | ②44—44—21—21 |
| 55—21 | 55—21—21 | 55—21—21—21 |
| 23—44 | 23—33—44 | 23—33—33—44 |
| 22—55 | 22—44—55 | |
| 34—53 | 34—44—53 | 34—44—44—21 |

| | | |
|---|---|---|
| 44—44 | ①44—44—44 | 33—55—21—21 |
| | ②33—55—21 | |
| 23—53 | 23—44—53 | 23—44—44—21 |
| 22—44 | 22—55—21 | 22—55—21—21 |
| 33—55 | 33—44—55 | |
| 11—23 | 11—11—23 | 11—11—11—23 |

从以上情况可见，老年人口音中的两音节连调式，一部分由音节间相互影响形成，后字仍在变调中起作用，一部分由首字调值扩展生成，而且相当一部分首字调值可以扩展到第三音节，规律比较复杂；四音节连调式基本上由三音节连调式扩展而成，大部分第四音节为附加音节，但仍有一小部分采用无限制扩展，结构仍嫌复杂。可见老年人口音的连调式还没有形成一个严整而简单的系统。显然，从老年人口音到中青年人口音，上海话复合词的变调规律经历了整化和简化，才基本上完成了向声调包络的发展。整化和简化还和阴上高平调 44 向去声 34 的归并以及以 44 为首字调值的连调式消失有关。不过这一整化和简化也还是不彻底的，首字阳入连调式 B 式的扩展方式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为目前的声调包络式变调中一个不协调的组成部分。

吴方言复合词的连读变调由音节间相互影响的一般类型发展为声调包络，语音上的原因还不得而知。不过联系前述扬州话后字轻声的音高和前字声调终点相近的现象来观察，可以发现扬州话后字轻声和上海话声调包络（右扩展型）后字调值在同样取自前字调值终点这一点上具有共同性，所不同的是前字在扬州话保持了完整的调值，而在上海话只保留了调值的起点。由此看来，声调包络（右扩展型）中除前字以外的音节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特殊的轻声，声调包络是轻声现象的特殊发展。

## （六）合音变调

汉语方言中还存在因音节合并而发生变调的现象。如福州话“牙齿”ŋa$^{53}_{31}$ i$^{31}$（k‘-）中前字声母韵母和后字韵母声调合音成“□”ŋai$^{31}$，“固”kou$^{213}$和“再”tsai$^{213}$中前字声母和后字韵母声调合音成“盖*”（再）kai$^{213}$，阳江话“果*样”（这样）kɔ$^{21}$ jiɛŋ$^{54}$中前字声母韵母声调和后字韵母合音成“拱*”kuŋ$^{21}$，等等。合音中，如果后字是轻声，合音字常常以前字的单字调或变调和后字的轻声合调。如获嘉话“路上”lu$^{13}$ ʂɔ̃· 合音成 luɔ̃$^{13}$，厦门话“拍唔见”（丢失）p‘aʔ$^{32}_{5}$ m· kĩ$^{21}$中的 p‘aʔ$^{32}_{5}$ m· 合音成 p‘aŋ$^{51}$（←-m）等。从上述各例可见，合音字的声调大多是原有各音节声调的加合。合音字的这种声调实际上也是一种连读变调，可以叫做合音变调。

合音变调也见于一些方言的儿化韵和子变韵，具有一定的规律。由于儿化韵和子变韵本身就是合音的产物，“儿”尾、“子”尾和前字韵母合音时，原有两个音节的单字调或变调加合在一起，就成为合音变调。比如延川话“儿”尾可以自成音节，也可以合音生成儿化韵：

| | |
|---|---|
| 阴平 | 花儿 xua$^{213}_{21}$ ɚ$^{34}_{42}$～xuar$^{324}$ |
| 阳平 | 房儿 faŋ$^{34}$ ɚ$^{34}_{53}$～faŋr$^{343}$ |
| 上声（清上） | 马儿 ma$^{52}$ ɚ$^{34}_{31}$～mar$^{53}$ |
| （清去） | 兔儿 t‘u$^{53}_{42}$ ɚ$^{34}_{35}$～t‘ur$^{424}$ |
| 阴入 | 角儿 tɕiɛ$^{423}_{42}$ ɚ$^{34}_{35}$～tɕiɛr$^{424}$ |
| 阳入 | 笛儿 tiɛʔ$^{54}$ ɚ$^{34}_{42}$～tiɛr$^{53}$ |

儿尾词中两个音节的变调，调型如果可以顺接，就合成儿化韵的降调，不能顺接，就合成儿化韵的曲折调。

温州话没有儿化韵，但有儿尾词。“儿”尾可以叠用并合音(儿儿)，表示特别细小或幼小。如：

猫儿 muɔ$^{44}_{32}$ ŋ̍$^{21}_{22}$→猫儿儿 muɔ$^{44}_{45}$ ŋ̍$^{212}_{21}$

羊儿 ji$^{31}_{21}$ ŋ̍ →羊儿儿 ji$^{31}_{34}$ ŋ̍$^{212}_{21}$

蝯子儿 jy$^{22}_{31}$ tsɿ$^{45}_{42}$ ŋ̍ →蝯子儿儿 jy$^{22}_{32}$ tsɿ$^{45}$ ŋ̍$^{212}_{21}$

簿儿 bu$^{34}_{31}$ ŋ̍ →簿儿儿 bu$^{34}$ ŋ̍$^{212}_{21}$

矮凳儿 a$^{45}_{42}$ taŋ$^{42}$ ŋ̍ →矮凳儿儿 a$^{45}_{43}$ taŋ$^{42}_{45}$ ŋ̍$^{212}_{21}$

殿儿 di$^{22}_{31}$ ŋ̍ →殿儿儿 di$^{22}_{34}$ ŋ̍$^{212}_{21}$

“儿”和“儿”合音时的变调和前字后字阳平(31)的复合词连调式21+22相同，21+22合音后和阳入212相同(中青年人也读同阴入323)。这一音变过程可以表述如下：

31+31→21+22 →212(323)

运城话中子变韵的变调也和连读变调有关。子变韵的变调实际上就是两音节连读变调中前字声调和后字轻声的加合。(例见第七章139页)

少数方言中动词也有这一性质的变调。如陕西商县话单音节动词的声调(或和韵母同时)发生变化，并成为长音节，用来表示动作的完成貌。例如(括弧中的变调值是较早的一种记录)：

阴平 吃 tʂʻʅ$^{21}$→ tʂʻɔː$^{53(3231)}$

阳平 赔 pʻei$^{35}$→ pʻaiː$^{351(2141)}$

上声 取 tɕʻy$^{53}$→ tɕʻyɛː$^{31(5231)}$

去声 病 pʻiaŋ$^{55}$→ pʻiaŋː$^{551(551)}$

动词发生音变从而引起语法意义变化的现象看起来像是一种屈折方式的构词手段，但实际上是合音的结果。就韵母看，上述变韵应该是基本韵母和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后缀(语法意义和“了”相同)的合音，这个后缀的韵母可能有一个低或半低的前元音(语音形式和目前商县话的“咾”lau·不同)。就声调看，变调作为一个长的曲折

调(甚至是多重曲折)应该是前字声调和后缀轻声的加合,和延川话儿化韵及运城话子变韵变调的情况相似。

## 参考文献

白涤洲:《关中方音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4。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93。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
陈忠敏:《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研究综述》,《语文研究》1993.2—3。
丁邦新:《汉语声调发展若干问题》,李玉译,《音韵学研究通讯》(4),1983。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1962。(未刊)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河北方言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1961。
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科学出版社,1960。
贺　巍:《获嘉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
黄平文:《侗台语族语言比较研究》,1992。(硕士论文,未刊)
金梦茵:《原平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9。
李小凡:《苏州话的字调转移及其成因》,《缀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李行健:《天津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1985.1。
林　焘:《语音探索集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刘　娟:《济南话上上相连前字变调的实验分析》,《语言研究》1994.2。

罗常培：《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
吕枕甲：《运城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平山久雄：《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拟测》，J. C. L. Vol 3. no. 1，1975；《音韵学通讯研究》(1)，1981。
《山东西南方言的变调及其成因》，《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计数研究》21 期，1983。
沈　同：《新派上海话声调的底层形式》，《语言研究》1985.2。
石　锋：《试论天津话的声调及其变化》，《再论天津话的声调及其变化》，《语音学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谭　馥：《也谈天津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1986.6。
田希诚：《和顺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7。
王福堂：《绍兴话记音》，《语言学论丛》(第三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
王世华、黄继林：《扬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温端政：《忻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5。
五　台：《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语言研究》1986.1。
谢自立：《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方言》1982.4。
徐云扬：《自主音段音韵学理论与上海声调变读》，《中国语文》1988.5。
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岩田礼：《连云港市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2.4。
叶祥苓：《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79.1。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
《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
张成材：《商县方言动词完成体的内部屈折》，《中国语文》1958.6。
《商县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0。
张　崇：《延川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0。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1964.1。
《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一)、(二),《方言》1980.4,1981.1。
《方言中的舒声促化现象说略》,《语文研究》1990.2。
Anne O. Yue-Hashimoto: Tonal Flip-Frop in Chinese Dialects, J.C.L, Vol.14, no.2, 1986.
Ballard W. L. On Some Aspects of Wu Tone Sandhi,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19, 1980.
Sherard M.(司马侃)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odern Colloquial Shanghai(现代上海话口语の共时音韵论), CAAAL Monograph Series, no.5, 1980.

# 附　录：

## 晋中榆次、太谷、祁县、榆社、平遥、介休、灵石、孝义方言语音特点简述

1964年夏，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师生在山西太谷进行方言调查实习，以太谷师范学校学生为发音人，[①] 初步了解了晋中地区下列八市县十二点的方言：(1)榆次(麻地沟)，(2)太谷(城关)，(3)祁县(大贾村)，(4)祁县(城赵)，(5)榆社(社城)，(6)榆社(南河底)，(7)平遥(杜家庄)，(8)平遥(岳壁)，(9)介休(义棠)，(10)介休(东杨屯)，(11)灵石(柳树村)，(12)孝义(禅房头)。[②]

以下简述十二个方言点声母、韵母、声调及其配合的主要特点。

### 一　声　　母

#### (一)声母总述

晋中方言[③] 共有三十个声母，排列如下：

---

① 发音人按文中12个方言点顺序排列：(1)杨云枝，女，22岁，(2)王传义，男，18岁，(3)齐凤英，女，17岁，(4)王长兰，女，18岁，(5)韩志清，男，18岁，(6)王铁钢，男18岁，(7)商汝兰，女17岁，(8)雷通贤，男，22岁，(9)居桂娥，女，23岁，(10)李露园，男23岁，(11)李娇乔，女，20岁，(12)任宝宇，男，21岁。

② 本文地名中村镇只记第一字，同一县两点而情况相同或一县仅只一点的，只记县名，不注村镇

③ 为行文简便，本文晋中方言限指八市县十二点的方言，不包括晋中地区其他方言。

| | | | | | |
|---|---|---|---|---|---|
| p 布步 | p' 怕盘 | m 门木 | f 飞冯 | v 闻午 | |
| t 到道 | t' 太同 | n 南怒 | | | l 来李 |
| ts 糟争 | ts' 仓除 | nz 挠 | s 苏生 | z 如软 | |
| tsʝ 基居 | tsʝ' 启区 | | sʝ 牺虚 | | |
| tʂ 智珍 | tʂ' 吉扯 | ɳ 碾 | ʂ 社扇 | | |
| tɕ 精九 | tɕ' 全丘 | ȵ 年硬 | ɕ 线晓 | | |
| k 该贵 | k' 开葵 | ŋ 案饿 | x 化话飞冯 | | |
| ø 二安晚远 | | | | | |

双唇音 p、p'、m 和唇齿音 f 的发音部位和北京音相同。v 是与 f 同部位的浊音，但摩擦较轻。声母 f、v 仅见于榆次、太谷、榆社方言。如榆次"飞"꜀fei，"无"꜀vu。

舌尖塞音 t、t'，鼻音 n，边音 l 是舌尖中音，发音部位和北京音相同。如榆次"多"꜀tɤ，"妥"꜂t'uɤ，"挪"꜀nɤ，"骡"꜀luɤ。在太谷、榆社(南)方言中，声母 t' 与齐齿韵配合时还带有腭化倾向，如太谷"条"꜀tʝ'io。

舌尖塞擦音 ts、ts' 和擦音 s 也是舌尖中音，发音部位比北京音要后。擦音 z 是和 s 同部位的浊音，但摩擦较轻。如榆次"栽"꜀tsæɛ，"初"꜀ts'u，"私"꜀sɿ，"如"꜀zu。"鼻擦音"nz 是带有舌尖摩擦的鼻音。(详见下文)

带有腭化作用的舌尖塞擦音 tsʝ、tsʝ' 和擦音 sʝ 见于祁县(城)、榆社方言，如祁县(城)"基"꜀tsʝɿ，"启"꜂tsʝ'ɿ，"西"꜀sʝɿ。

卷舌音 tʂ、tʂ'、ʂ 见于太谷、祁县(城)、平遥、介休、灵石、孝义等方言，发音部位一般比北京音要前，在太谷方言实际上还是颤音。如"遮"，平遥(杜)꜀tʂɿ，太谷꜀tʂɤ。ɳ 是同部位的鼻音，见于平遥、介休、孝义方言，仅有少数(古娘母)几个字。如孝义"扭"꜂ɳɤu，"碾"꜂ɳɐŋ。

舌面音 tɕ、tɕ'、ɕ 比北京音部位后些。ȵ 是同部位的鼻音。如榆次"鸡"꜀tɕi，"启"꜂tɕ'i，"呢"꜀ȵi，"西"꜀ɕi。

舌根音 k、kʻ 的发音部位也比北京音后。ŋ 是同部位的鼻音。如榆次"高"꜀kɔo，"考"ʻkʻɒo、"袄"ʻŋɒo。擦音 χ 是舌根小舌音，摩擦性强，在太谷、榆社(南)、介休(义)方言中还带有同部位的颤音色彩。如太谷"害"χ$^{R}$æɪ꜄。

零声母开口韵仅有一个卷舌元音。如榆次"儿"꜀ɚ。零声母齐合撮韵都带有明显的同部位摩擦成分 j、w、ɥ，如灵石"也"ʻi$_{j}$ᴇ，"外"u$_{w}$æᴇ，"远"ʻy$_{ɥ}$ɐŋ。

此外，晋中方言声母的送气成分送气强烈，发音部位因韵母等呼而异：在开合口韵及 ɿ、ɥ 韵母前是 χ，在齐撮韵前是 ç。如榆次"太"tχæᴇ꜄，"批"꜀pçi。

**(二)鼻音声母附带的闭塞成分**

晋中方言的鼻音声母普遍带有一个同部位的浊塞成分，从而构成整套的"鼻塞音"。如平遥(杜)"母"ʻm$^{b}$u，"努"ʻn$^{d}$ɤu，"扭"ʻȵ$^{d}$ɤu，"纽"ʻȵ$^{d}$iɤu，"我"ʻŋ$^{g}$i。鼻塞音是同部位的鼻音的变读，不构成独立的音位。它的存在有下列条件：

(1)念字方式：一般存在于单字慢读中，在快读和连读时闭塞成分就消失。

(2)声母发音部位：在双唇和舌根部位较多出现，其他部位则较少。如平遥(杜)、孝义有 m$^{b}$、n$^{d}$、ȵ$^{d}$、ȵ$^{d}$、ŋ$^{g}$，榆次、榆社、介休(东)有 m$^{b}$、n$^{d}$、ȵ$^{d}$、ŋ$^{g}$，介休(义)只有 m$^{b}$、n$^{d}$、ŋ$^{g}$，祁县(大)只有 m$^{b}$、ŋ$^{g}$，祁县(城)、平遥(岳)只有 m$^{b}$。

(3)韵母开口度或调类舒促：在平遥(杜)方言中多出现在开口度较小的元音前；(例见前)在孝义方言中经常出现在入声韵前，不常出现在舒声韵前，如"木"m$^{b}$əʔ꜆，"纳"n$^{d}$ɐʔ꜆，"捏"ȵ$^{d}$iɔʔ꜆，"额"ŋ$^{g}$ɔʔ꜆；在平遥(岳)方言中只出现在韵母 ɐʔ 前，如"木"m$^{b}$ɐʔ꜆。

鼻音声母在灵石、太谷方言中具有另一种特点：单字慢读中，声母持阻阶段的发音明显延长，听来似乎是在音节开首压入了一个同部位的声化韵 m̩、n̩、ȵ̩、ŋ̍。如灵石"妹"m̩mᴇ꜄，"耐"n̩nᴇ꜄，"年"

꜀ȵȵiei，安꜀ŋ̍ŋɔ̃。（这一特点在太谷方言中还扩及所有声母：边音、擦音声母的情况和鼻音声母相同，如“良”꜀llio，“三”꜀ʂ̩sã，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前则有一个明显的无声紧张阶段。）这种现象和“鼻塞音”存在着内部的联系。以双唇音为例，m̩m 和 $m^b$ 可以看作是同一个音变过程的不同阶段：先是声母 m 的发音中持阻阶段延长而成为 m̩m，以后进一步在除阻阶段鼻腔的发音动作停止而成为 $m^b$，从而完成了辅音的分裂过程。

**（三）鼻音声母附带的摩擦成分**

晋中部分方言鼻音声母在与舌面高元音和舌尖元音韵母（i、y、ɿ、ɥ、ʮ）配合时，带有一个强摩擦成分作为后流，从而构成了一系列的“鼻擦音”，如榆社“米”꜂$m^z$ɿ，“女”꜂$n^z$ɥ，“牛”꜀$ȵ^ʑ$iɤu。“鼻擦音”的数量各方言不等，如祁县（城）有 $m^z$、$n^z$（在 ɿ 韵母前），榆社、介休（东）有 $m^z$（ɿ 韵母前）、$n^z$（ɿ、ɥ 韵母前）、$ȵ^ʑ$（齐撮韵前），平遥有 $m^z$（ɿ 韵母前）、$n^z$（ɿ、ɥ 韵母前），介休（义）有 $n^z$（ɿ 韵母前，如“腻”）、$ɳ^ʐ$（ʮ 韵母前，如“鱼”），孝义有 $n^z$（开口韵前）、$ȵ^ʑ$（齐撮韵前）、$ɳ^ʐ$（开口韵前）。此外，“鼻擦音”的摩擦成分在榆社、介休（东）、孝义方言中还可以和前述“鼻塞音”中的闭塞成分结合成为塞擦成分，从而又构成了一系列的“鼻塞擦音”。这样，鼻音声母的面貌就变得极其多样化：$ȵ \sim ȵ^d \sim ȵ^ʑ \sim ȵ^{dʑ}$。

“鼻擦音”（或“鼻塞擦音”）的摩擦成分在方言中强弱也不尽相同。大致在祁县（城）、榆社方言中稍弱，在平遥、介休、孝义方言中较强，实际上已是摩擦较轻的辅音 z、ʐ、ʑ。但“鼻擦音”（或“鼻塞擦音”）在多数方言中还只是同部位鼻音声母的变体，不构成独立的音位，因此可以在音标中略去这些摩擦成分。但在孝义方言中，虽然 $ȵ^ʑ$、$ɳ^ʐ$ 不构成独立的音位，但 $n^z$ 却和开合口韵配合，因而与同部位的鼻音声母 n 相对立，如“挠”꜀$n^z$ɒo（≠“铙”꜀nɒo），“沾~水”꜀$n^z$ɐŋ（≠“南”꜀nɐŋ），“女子”꜂$n^z$u tsə˙（女孩子）。这样，孝义方言

就必得有一个具有独立音位的“鼻擦音”nz。

**(四)腭化音 ts$_j$、ts$_j$ʻ、s$_j$ 所体现的反腭化作用**

腭化音 ts$_j$、ts$_j$ʻ、s$_j$ 见于祁县(城)、榆社方言,只与两个韵母配合:ɿ(祁、榆)、ʮ(榆)。如“基”꜀ts$_j$ɿ,“齐”꜀ts$_j$ʻɿ“西”꜀s$_j$ɿ,“居”꜀ts$_j$ʮ,“区”꜀ts$_j$ʻʮ,“须”꜀s$_j$ʮ。

腭化音 ts$_j$、ts$_j$ʻ、s$_j$ 来源于古精组止摄开口三等字、精见组蟹摄开口三四等字(祁、榆)、精见组遇摄合口三等字(榆)的声母,是一种特殊音变的结果。以下就各方言中上述精见组蟹止遇摄细音字(以“妻欺”为例)和精组止摄开口三等字(以“雌”为例)作一比较:

榆次等:　　　　妻欺꜀tɕʻi≠雌꜀tsʻɿ

祁县(城):　　　妻欺꜀ts$_j$ʻɿ≠雌꜀tsʻɿ

榆社:　　　　　妻欺꜀ts$_j$ʻɿ=雌꜀ts$_j$ʻɿ

平遥、介休(东):妻欺꜀tsʻɿ=雌꜀tsʻɿ

以上的比较说明,晋中部分方言发生过声母 tɕ、tɕʻ、ɕ(i、y)向 ts、tsʻ、s(ɿ、ʮ)转化的过程,平遥、介休(东)方言已经完成了这一过程,祁县(城)、榆社方言的腭化音 ts$_j$、ts$_j$ʻ、s$_j$ 则正好是这一过程的中间阶段,它最好不过的说明了音变的具体进程。(严格说来,音变过程是以舌面音齿化开始的,但音变发展的中间阶段更接近舌尖部位,就目前音值来说已不是舌面齿化音,而是舌尖腭化音。)祁县(城)、榆社、平遥、介休(东)方言,与使上述精见组蟹止遇摄细音字声母转化为 tɕ、tɕʻ、ɕ 的腭化作用相对,使 tɕ、tɕʻ、ɕ 声母(i、y)转化为 ts$_j$、ts$_j$ʻ、s$_j$ 以至 ts、tsʻ、s 的,实质上是一种反腭化作用,其具体表现则为舌尖化。(一个特殊的现象是榆社方言中精组止摄开口三等字以及知照组蟹止摄开口三等字声母反而向这种腭化音靠拢而混同,如前例“雌”꜀ts$_j$ʻɿ。)因此,可以说晋中方言目前还存在着腭化与反腭化的交替作用。这种交替作用在汉语历史演变中曾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方言中一批舌尖音在古代腭化为舌面音(知组),在近代进一步又转化为舌尖音,同时又发生了精见组细音字声母

腭化为舌面音的过程，这种舌面音的递变同样也是腭化与反腭化交替作用的结果。腭化作用在汉语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肯定的，反腭化作用也应当得到相当的重视。

# 二　韵　母

## (一)韵母总述

下列韵母表，以榆次方言为例：

| | | | | | | | |
|---|---|---|---|---|---|---|---|
| ɿ | 资支 | i | 齐以 | u | 故午 | y | 雨吕 |
| ɑ | 爬堂 | iA | 架讲 | uɑ | 花光 | | |
| æ | 肥三 | | | uæ | 酸短 | | |
| ɤ | 河丑 | iɤ | 流九 | uɤ | 过朵 | yɤ | 锁白 |
| | | ie | 姐解捡 | | | ye | 靴远 |
| æE | 盖妹 | | | uæE | 怪帅 | | |
| eɪ | 费魏 | | | ueɪ | 雷贵 | | |
| ɒo | 桃烧 | iɒo | 条焦 | | | | |
| əŋ | 根生 | iəŋ | 心星 | uəŋ | 魂东 | yəŋ | 云胸 |
| aʔ | 色辣 | iaʔ | 百铁 | uaʔ | 落刮 | yaʔ | 月劫 |
| əʔ | 直木 | iəʔ | 急北 | uəʔ | 出郭 | yəʔ | 欲洛 |
| ɚ | 耳二 | n̩ | 你台 | | | | |

以上榆次方言韵母共三十五个，其中单元音韵母ɿ、i、u、y、ɚ以及ɑ、æ、ɤ、e四组共十六个，复元音韵母æE、eɪ、ɒo三组共六个，鼻尾韵əŋ组共四个，塞尾韵aʔ、əʔ两组共八个，声化韵n̩一个，开齐合撮四呼俱全。

但与晋中其他方言比较，榆次方言韵类归并较多，韵母数量较少，系统简单。一般说来，晋中其他方言比榆次方言多一组复元音韵母，如祁县"斗"ᶜtɤu，"流"꜀liɤu；多一至二组鼻韵(鼻尾韵或鼻化

韵)，如孝义"单、当"ₒtəŋ，"年、娘"ₒnieŋ，"关、光"ₒkueŋ，"全"ₒtɕʻyeŋ，榆社(南)"单"ₒtɑ̃，"年"ₒniɛ，"关"ₒkuɑ̃，"全"ₒtɕʻyɛ，"当"ₒtɑ̃o，"娘"ₒniɑ̃o，"光"ₒkuɑ̃o；还有多数方言"姐"、"解"分韵(iɪ≠ie)，半数方言"资"、"知"分韵(ɿ≠ʅ)，韵母数量都在四十个以上。但塞尾韵平遥、介休方言中只有一组，"百"、"北"同韵，比榆次方言简单。

**(二)高元音的舌位变化**

晋中方言高元音的发音紧张，发音器官的接触面加大。这一特点的一个结果是，前高元音 i、y 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因而产生了腭化和舌尖化两种语音作用。其中腭化作用指舌面与上腭接触面的增大，其结果表现为前文所述各方言声母送气成分变为舌面摩擦，如榆次"批"ₒpɕi，以及太谷、榆社(南)方言中声母 tʻ 的轻微腭化，如太谷"条"ₒtʲʻio。

舌尖化作用是接触面加大的发音器官两方由舌面与上颚转为舌尖与齿龈，从而导致韵母本身和部分声母发音部位的转移。这一音变作用所产生的韵母 ɿ、ʮ 正是韵母 i、y 舌尖化的结果。(这一音变作用是和前述声母 tɕ、tɕʻ、ɕ 转化为 tsʲ、tsʲʻ、sʲ 以至 ts、tsʻ、s 同步进行的。)在榆社、平遥、介休(东)方言中，ɿ 和声母 p、pʻ、m、n、ts、tsʻ、s、z 配合，ʮ 和声母 ts、tsʻ、s、z 配合，如平遥"闭"pɿʾ，"批"ₒpʻɿ，"米"ʿmɿ，"呢"ₒnɿ，"基"ₒtsɿ，"启"ʿtsʻɿ，"戏"sɿʾ，"移"ₒzɿ，"居"ₒtsʮ，"取"ʿtsʻʮ，"须"ₒsʮ，"雨"ʿzʮ。在祁县(城)方言中，ɿ 还可以和声母 t、tʻ、l 配合，如"底"ʿtɿ，"梯"ₒtʻɿ，"礼"ʿlɿ。此外，在介休(义)方言中，这一音变作用仅有零星表现，如"技"tsɿʾ，但舌尖化作用还可以进一步使个别字声韵转化为卷舌音，如"鸡"ₒtʂʅ，"鱼"ₒɳʮ。

高元音发音紧张，发音器官间接触面加大的另一个结果，是元音发音时附带有一个同部位的摩擦成分。前元音 i、y 带有舌面摩擦 j、ɥ，如孝义"由"ₒiʲɤu，"雨"ʿyᶣ。后元音 u 所带摩擦成分的部位在各方言中略不相同，在多数方言中是双唇摩擦 w，在祁县方言是

唇齿摩擦 v，在榆次、太谷、榆社方言中这一摩擦成分则强化而转为声母 v，例如“外”，孝义 $u_{w}$æɛʾ，祁县 $u_{v}$æɛʾ，榆次 væɛʾ。舌尖元音 ɿ、ʮ 所带摩擦 z 极强，在祁县(城)、榆社方言中正处于向声母转化的阶段，如“衣”꜀$ɿ_{z}$ 或꜀ᶻɿ，在平遥、介休、孝义方言中则是摩擦较轻的声母 z，如平遥“衣”꜀zɿ。但二者在听感上所差无多，统一标写为声母 z。

部分方言中，高元音 i、y、ɿ、ʮ、ʯ 在与某些声母配合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摩擦成分。如榆社、介休(东)、孝义方言中 i、y(与 ȵ 配合时)的 ʑ，祁县(城)、榆社、平遥、介休、孝义方言中 ɿ、ʮ(与 p、p‘、m、t、t‘、n、l 配合时)的 z，介休(义)方言中 ʯ(与 ɳ 配合时)的 ʐ。前文曾把这种摩擦成分和鼻音声母合同处理为“鼻擦音”，如介休“腻”nᶻɿˀ[$nɿ_{z}$ˀ]，“鱼”꜀ɳᶻʮ[꜀$ɳʮ_{ʐ}$]，榆社“牛”꜀ȵᶻiɤu[꜀$ȵi_{ʑ}$ɤu]。但为简化标音起见，前文除孝义方言 nz 外，“鼻擦音”一律作为鼻音声母变体处理。同样，这里也不再设置下列不具独立音位的复辅音声母 pz、p‘z、tz、t‘z、lz 了。但尽管作了上面的简化处理，榆社等方言的 z，孝义方言的 nz，榆次等方言的 v，仍然足以说明高元音所带的摩擦成分可以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元音前衍生出辅音来。

**(三)前响复元音的单化趋向**

晋中方言前响复元音普遍有单化的趋向。以低元音为主要元音的复元音(蟹一二、效)，这一趋向表现得特别显著。以“来”、“刀”两字韵母为例，复元音单化趋向表现为：主要元音与韵尾开口度逐渐接近，如太谷 æᴇ、ɑɔ，祁县、介休(东)、孝义 æɛ、ɒɔ，平遥(岳)、介休(义)æᴇ、ɒɔ，榆次 æᴇ、ɒo，平遥(杜)æɛ、ɔo；或韵尾趋于弱化，如榆社(南)ᴇˑ、ɔᵒ；或兼有上述两种表现，如灵石 ᴇᵓ、ɔo；或已转化为单元音，如榆社(社)ɛ、ɔ。但以中元音为主要元音的复元音(蟹三四、止、流)，单化趋向仅在个别方言中有所表现，如榆次“斗”ˊtɤ“流”꜀liɤ。如果比较晋中其他方言“斗”、“流”两字韵母：榆社、灵石、孝义 $ɤu_{w}$、$iɤu_{w}$，祁县、平遥、介休 $ɤu_{v}$、$iɤu_{v}$，太谷 ɤɯ、iɤᵘ，可

以推测榆次方言“斗”、“流”韵母复元音单化的过程，还曾以复元音韵尾元音唇形由圆趋展的变化作为前提。

**（四）鼻音韵尾的消变趋向**

鼻音韵尾在晋中方言表现了弱化与消失的趋向。这一趋向又因韵母历史来源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来源于古宕江摄的舒声字，韵母以“当”、“江”、“光”三字为例，为鼻尾韵的有祁县、平遥（岳）aŋ、iaŋ、uaŋ，平遥（杜）ɒŋ、iɒŋ、uɒŋ，孝义 ɐŋ、iɐŋ、uɐŋ；为鼻化韵的有介休（东）ɤ̃、iɛ̃、uɤ̃，灵石 ɔ̃、iɔ̃、uɔ̃，榆社（社）ɑ̃ʊ、iɑ̃ʊ、uɑ̃ʊ；为纯口韵的有榆次 ɑ、iᴀ、uɑ、太谷 ɒ、iɒ、uɒ、介休（义）æ、iɛ、uæ，榆社（南）ɔʊ、iɔʊ、uɔʊ。

来源于咸山摄的舒声字，韵母以“山”、“棉”、“关”、“全”为例，为鼻尾韵的有孝义 ɐŋ、iɐŋ、uɐŋ、yɐŋ；为鼻化韵的有太谷 ɤ̃（ẽ）、iẽ、uẽ、yẽ，榆社（社）ɤ̃、iᴇ̃、uɤ̃、yᴇ̃，介休（东）ɤ̃、iɛ̃、uɤ̃、yɛ̃；为纯口韵的有榆社（南）ᴀ、iᴇ、uᴀ、yᴇ，介休（义）æ、iɛ、uæ、yɛ，榆次 æ、ie、uæ、ye。还有同组韵母按等呼而有不同情况的，如祁县（大）aŋ（ɤŋ）、aŋ（iĩ）、uaŋ（uɒŋ）、yĩ，祁县（城）aŋ（ᵊĩ）、iaŋ（iĩ）、uaŋ（uᵊĩ）、yĩ，平遥（岳）aŋ、iaŋ（ie）、uaŋ、ye，平遥（杜）ɒŋ、iɒŋ（ie）、uɒŋ、ye，灵石 ɔ̃（eɪ）、iɔ̃（ieɪ）、uɔ̃（ueɪ）、yeɪ。

来源于深臻曾梗通摄的舒声字，韵母以“本”、“银”、“东”、“永”为例，为鼻尾韵的有榆次、平遥（岳）、灵石 əŋ、iəŋ、uəŋ、yəŋ，太谷、平遥（杜）、孝义 əŋ、iəŋ、uəŋ、yəŋ，介休（义）əŋ、ieŋ、uəŋ、yeŋ；为鼻化韵的有榆社（社）ɤ̃ɪ、iĩ、uɤ̃ɪ、yĩ。也有同组韵母按等呼而有不同情况的，如介休（东）əŋ、iẽ、uəŋ、yẽ，榆社（南）æe、iĩi、uæe、yĩi。

综上所述，晋中方言鼻音韵尾消变过程的进行，在低元音后比在高元音后快、在齐撮韵后比在开合韵后快。

此外，上述榆社方言中鼻尾韵还转化为鼻化或非鼻化的复元音。其中榆社（南）方言“本”、“东”、“当”、“江”的韵母 æe、uæe、ɔʊ、iɔʊ，恰好替代“来”、“快”、“刀”、“交”即将单化的韵母 ᴇᶦ、uᴇᶦ、ɔᵒ、iɔᵒ，

从而完成旧有复元音单化而又由鼻尾韵转化出新的复元音这一系统替代的过程。榆社(社)方言"本"、"东"、"当"、"江"韵母 ɤ̃ɪ、uɤ̃ɪ、ɑ̃o、iɑ̃o 在鼻化成分消尽后,亦将替代"来"、"快"、"刀"、"交"业已单化的韵母 ɛ、uɛ、ɔ、iɔ 而完成上述过程。

**(五)塞音韵尾的消变趋向**

塞音韵尾的弱化也是晋中方言普遍的特点。韵尾?在弱化后一般成为一个喉头紧张成分"'",个别情况下也可能进一步消失而使入声韵并入阴声韵。塞音韵尾的弱化有下列两种情况:(1)入声字慢读时弱化,快读或连读时不弱化,如榆次阳入调字"鼻"piəʔ˦(快读或连字读)、piə'˧(慢读);(2)与韵母元音开口度有关,如榆次 aʔ 类韵字快读或连字读时弱化为"'",慢读时进而与舒声韵字混同:"拔"pa'˦(快读或连字读)、pa˧(慢读,易与上声字"把"pa˧相混)

**(六)特殊来源的声化韵**

晋中祁县方言具有两个来源特殊的声化韵:ᵊm̩("松"、"孙"的韵母)、iᵊm̩("云"、"雄"的韵母)。声化韵发音时,在双唇闭合的同时还有明显的唇齿动作,(因此也可以标写为ᵊɱ、iᵊɱ)一般有一个过渡音 ə 作为前流,并且事实上可以带有介音 i,从而可以按四呼来分类。这种声化韵,按习惯处理为鼻尾韵 əm、iəm 也许更为方便。但是,这些韵母中前流音弱而短,(在大贾村方言中,以开口韵零声母为条件,这个前流音还是不存在的,如"松"、"孙"꜀sᵊm̩,"闻"、"翁" m̩)鼻音强而长,即使是介音 i 也没能改变它作为领音的特点。

声化韵ᵊm̩、iᵊm̩ 所领是古臻曾梗通摄的合口字。参考其他方言和汉语的历史,祁县方言声化韵ᵊm̩、iᵊm̩ 当是由鼻尾韵* uəŋ(*uoŋ)、*iuəŋ(*iuoŋ)演变而来。这一音变过程显然是特殊的。但不妨假设:鼻尾韵中介音 u 的发音部位和鼻音韵尾的发音方法在

主要元音弱化后相互融合，(凑巧的是现代祁县方言的元音 u 和声化韵同样带有唇齿作用)原鼻尾韵中弱化了的主要元音在声化韵形成后则转化为前流音，并在一定条件下消失。以上过程试以音标表示：ʻuəŋ(ʻuoŋ) → ʻuᵊŋ → ᵊm̩ → m̩。

**(七)鼻尾韵字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阴阳对转**

晋中方言鼻尾韵字的口语音可以以阴声韵为韵母，因而文白读音构成了"阴阳对转"。这种现象限于古梗曾摄字和宕江摄字。梗曾摄字的文白异读见于各地。以"生"(梗开二庚)、"星"(梗开四青)、"兄"(梗合三庚)为例：

| | 生 | | 星 | | 兄 | |
|---|---|---|---|---|---|---|
| | 文 | 白 | 文 | 白 | 文 | 白 |
| 榆次 | ꜀səŋ | ꜀sɿ | ꜀ɕiəŋ | ꜀ɕi | ꜀ɕyəŋ | ꜀ɕy |
| 太谷 | ꜀səŋ | ꜀sɿ | ꜀ɕiəŋ | ꜀ɕi | ꜀ɕyoŋ | ꜀ɕy |
| 祁(大) | ꜀soŋ | ꜀sɿ | ꜀ɕioŋ | ꜀ɕi | ꜀ɕiᵊm̩ | ꜀ɕiu |
| 祁(城) | ꜀sɔuŋ | ꜀sɿ | ꜀ɕiɔuŋ | ꜀sɿ | ꜀ɕiᵊm̩ | ꜀ɕiu |
| 平(社) | ꜀səŋ | ꜀ɕi | ꜀ɕiəŋ | ꜀sei | ꜀ɕyoŋ | ꜀sʮ |
| 平(话) | ꜀səŋ | ꜀ɕie | ꜀ɕiəŋ | ꜀sei | ꜀ɕyəŋ | sʮ |
| 介(义) | ꜀səŋ | | ꜀ɕieŋ | ꜀ɕi | ꜀ɕyeŋ | |
| 介(东) | ꜀səŋ | | ꜀ɕiẽ | ꜀sei | ꜀ɕyẽ | ꜀sʮ |
| 灵石 | səŋ | ꜀sa | ꜀ɕiəŋ | ꜀ɕi | ꜀ɕyəŋ | ꜀ɕy |
| 孝义 | ꜀səŋ | ꜀sʌ | ꜀ɕiəŋ | ꜀ɕi | ꜀ɕyoŋ | ꜀ɕy |

各方言"星"、"兄"口语音韵母和蟹止遇摄细音字(如"西"、"虚")韵母相同。但二等字"生"的口语音则表现了不够一致的对应。

宕江摄字的文白异读完整地表现在祁县、介休(东)、孝义方言中。以"糠"(宕开一唐)、"两"(宕开三阳)、"窗"(江开二江)为例：

| | 糠 | | 两 | | 窗 | |
|---|---|---|---|---|---|---|
| | 文 | 白 | 文 | 白 | 文 | 白 |

| | | | | | | |
|---|---|---|---|---|---|---|
| 祁县 | ꜀k'ɑŋ | ꜀k'a | ꜂liɑŋ | ꜂lia | ꜀ts'uɑŋ | ꜀so |
| 介(东) | ꜀k'ɑ̃ | ꜀k'uo | ꜂liɛ | ꜂luo | ꜀ts'uɑ̃ | ꜀ɕyo |
| 孝义 | ꜀k'ɐŋ | ꜀k'uo | ꜂liɐŋ | ꜂lie | ꜀ts'uɐŋ | ꜀suo |

在介休(东)、孝义方言中,上述例字口语音韵母和果摄字(如"科"、"裸"、"左")韵母相同。在祁县方言中,"窗"字口语音韵母和果摄字(如"梭")韵母相同,但"糠"、"两"口语音韵母 a、ia 则与果摄无关。如果就榆次、太谷方言中"糠"、"两"韵母为 ɑ、iʌ 和 ɒ、iɒ 着眼,则祁县上述二字口语音韵母或系邻方言影响。但如果就灵石方言中果摄字"哥"以 a 为口语音韵母,则可推测祁县方言果摄字或曾有类似音值,"糠"、"两"口语音韵母似仍与果摄有关。

晋中方言目前梗曾摄字和宕江摄字文白异读中韵母音值差别颇大,因而"阴阳对转"的现象当是早期发生的。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曾说:"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明陆蓉《菽园杂记》(卷四)也说"山西人……以青为萋";李汝珍《音鉴》(卷四)还引证刘攽《诗话》说"关中以青为萋"。[①] 这就说明晋中方言鼻尾韵文白异读中韵母的"阴阳对转"是在北宋就已存在的、极其古老的方音现象。但这一现象目前就晋中地区来说正趋于消失:"对转"已只限于少数常用字,如"蒸正整绳剩生甥声病明名命钉顶听井镜青星应蝇影盈兄"等,而在受普通话影响较大的城市如太原,则所见更少。至于宕江摄字文白异读韵母的"阴阳对转",目前只集中在祁县、介休(东)、孝义方言,其他方言仅见零星字例,如平遥(杜)"汤"꜀t'ɒŋ、꜀t'uo,平遥(岳)"瓤"꜂ʐɑŋ、꜂zuo,介休(义)"两"꜂liɛ、꜂luo。

---

① 转引自罗常培《方音研究小史》,见《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63。

# 三 声 调

## (一)声调总述

晋中方言共有五个声调,以榆次方言为例:

| | | |
|---|---|---|
| 平声 | ˩21 | 题时 |
| 上声 | ˦53 | 体以 |
| 去声 | ˧34 | 弟替第 |
| 阴入 | ʔ˩21 | 滴逸 |
| 阳入 | ʔ˦42 | 笛食 |

平声是个似平的低降调,标为21。太谷、祁县、榆社、孝义方言中,平声的调型及升降幅度大致相同,标为32或21;灵石方言平声是半高降调,标为42。平遥、介休方言中,平声降的意味极少,径直标为33。晋中多数方言平声调领有全部古平声字;灵石方言平声调只领有古平声浊声母字。

上声是个高降调,标为53;在榆社(南)方言中略低,标为42。其他方言上声是降升调,一般起点比终点高,分别标为312、313、412、423、512、523等、太谷方言起点略低于终点,标为213。降升调中,音节的重点落在声调下降部分,其后的回升只是一个短而轻的尾音。晋中多数方言上声调领有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灵石方言上声调还领有古平声清声母字。

去声是个似平的半高升调,标为34。其他多数方言去声调型及升降幅度大致相同,标为34、35或45。太谷、灵石方言去声是个高降调,标为53。晋中各方言去声调所领都是古去声字和上声全浊声母字。

阴入是个低降调,不很短促,标为21。阴入的调型较有分歧:或与榆次相同,如祁县、榆社、孝义、标为21或31,灵石为高降调,

标为52;或为平调,如太谷、平遥(杜)、介休(义)标为22、33、44等;或为微升调,如平遥(岳)标为23。晋中多数方言阴入调领有古入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但平遥、介休方言阴入调只领有古入声清声母字。

阳入是个半高降调,也不很短促,标为42。榆社(南)方言阳入调的调型调值相同。其他方言阳入都是降升调,多数起点也比终点高,分别标为212、312、412、512。降升调中,音节的重点也落在下降部分;但灵石方言阳入调起点略低于终点,标为213,音节重点落在声调回升部分。晋中多数方言阳入调领有古入声全浊声母字,平遥、介休方言阳入调还领有古入声次浊声母字。

晋中方言入声调不很短促,为与同调型的舒声调区别,一律在声调符号前加一个喉塞,如榆次阴入:ʔ˨˩21。

**(二)入声调类的归并趋向**

晋中方言阴入调和平声调、阳入调和上声调的调型调值普遍相近,而入声调的不很短促使它们在音长上也接近起来。比较如下:

| | 平声 | 阴入 | 上声 | 阳入 |
|---|---|---|---|---|
| 榆次 | 21 | 21 | 53 | 42 |
| 太谷 | 32 | 22 | 213 | 312 |
| 祁(大) | 32 | 31 | 412 | 412 |
| 祁(城) | 32 | 31 | 312 | 212 |
| 榆(社) | 21 | 31 | 313 | 312 |
| 榆(南) | 21 | 21 | 42 | 42 |
| 平(杜) | 33 | 44 | 523 | 512 |
| 平(岳) | 33 | 23 | 512 | 512 |
| 介(义) | 33 | 33 | 412 | 412 |
| 介(东) | 33 | 44 | 423 | 412 |
| 灵石 | 42 | 52 | 313 | 213 |

| 孝义 | 21 | 21 | 423 | 312 |
|---|---|---|---|---|

在阴入和阳入调音高音长向平声、上声调各各靠拢的同时，晋中方言还存在前述塞音韵尾的消变趋向，榆次方言中阳入调 aʔ 韵类字就已经与上声字趋于混同（如"拔"paɬ 与"把"pɑɬ）。可以想见，这种趋向发展的结果，必将是各方言中阴入、阳入调字各各归并入平声、上声调，从而在晋中出现一个简单的三调类（平、上、去）地区。

**（三）调值与快读慢读**

晋中部分方言上声和阳入调类，在单字慢读和快读时具有不同的调值。比较如下：

| | 上声 | | 阳入 | |
|---|---|---|---|---|
| | 慢读 | 快读 | 慢读 | 快读 |
| 祁（大） | 412 | 41 | 412 | 41 |
| 祁（城） | 312 | 31 | 212 | 21 |
| 榆（社） | 313 | 41 | 312 | 41 |
| 介（东） | 423 | 42 | 412 | 41 |
| 榆次 | 53 | 53 | 42 | 4 |

上述方言中，慢读的降升调可以在快读时转化为降调，榆次方言中慢读的降升调（阳入）还可以在快读时转化为一个较促的平调。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调类在太谷、平遥、介休（义）、灵石、孝义方言中仅有降升调一值，在榆社（南）、榆次（指上声）方言中仅有降调一值。如果把他们各看作是一个音变过程的起点和终点，那就可以把上述祁县等方言中快慢读时调值互异的现象看作这一音变过程的中间阶段。看来声调调值的演变方式，除自身渐变外，还可以以快慢读异化调值作为过渡。

**（四）降升调分裂字音的作用**

晋中少数方言中降升调具有一种分裂字音的作用。榆社（社）方言的降升调（上声慢读）使韵母 i 分裂为 ii，例如：

些谐　　　　姐解　　　　谢蟹

꜀ɕi　　　ʿtɕi˩(快读)、ʿtɕiɪɹ(慢读)　　　ɕiʾ

孝义方言的降升调(上声和阳入)还使整个音节发生分裂：声调在下降到最低点时，产生一个很强的喉塞切断音节，然后喉塞迅速解除，声调继续一个回升的阶段，如“走”ʿtsɤu[tsəʔ$^{42}$ ɤu$^{23}$]，“石”sɔʔ$_{2}$[sɔʔ$^{31}$ ə$^{12}$]。在音节为喉塞切割成二的同时，韵母也被有规律的分裂：上声字韵母中，(1)高元音单韵母(ɿ、ʅ、i、u、y)分裂为二；(2)齐合撮韵母(如 iʌ、uæɛ、yɐŋ)即就介音与韵分裂；(3)开口韵母(为 ʌ、æɛ、ɐŋ)自身不分裂，但在喉塞前产生一个过渡音 ə。阳入字韵母则在按上述(2)(3)两项变化的同时，还丢失了入声韵尾，从而在音节结构上与上声字完全一致。例如：

子ʿtsɿ[tsɿʔ$^{42}$ ɿ$^{23}$]
纸ʿtʂʅ[tʂʅʔ$^{42}$ ʅ$^{23}$]
体ʿtʻi[tʻiʔ$^{42}$ i$^{23}$]
主ʿtsu[tsuʔ$^{42}$ u$^{23}$]
取ʿtɕʻy[tɕʻyʔ$^{42}$ y$^{23}$]
假ʿtɕiʌ[tɕiʔ$^{42}$ ʌ$^{23}$]
拐ʿkuæɛ[kuʔ$^{42}$ æɛ$^{23}$]
犬ʿtɕʻyɐŋ[tɕʻyʔ$^{42}$ ɐŋ$^{23}$]
耳ʿᵊɚ[əʔ$^{42}$ ɚ$^{23}$]
把ʿpʌ[pəʔ$^{42}$ ʌ$^{23}$]
老ʿlɒɔ[ləʔ$^{42}$ ɒɔ$^{23}$]
喊ʿxɐŋ[xəʔ$^{42}$ ɐŋ$^{23}$]
食 səʔ$_{2}$[sɔʔ$^{31}$ ɔ$^{12}$]
鼻 piəʔ$_{2}$[piʔ$^{31}$ ɔ$^{12}$]
活 xuɐʔ$_{2}$[xuʔ$^{31}$ ɐ$^{12}$]

上述例字无论就听感或发音动作来说，都“像是两个字似的”(发音人的话)。看来孝义方言中一个字确实可以念得像两个音节。但

这种特殊的音节结构毕竟只存在于降升调单字读音的条件下。上声字和阳入字(没有快读)如果在连读变调中不再读为降升调,则这一特殊现象也就消失,又各恢复了原有单音节的面貌。如“黑老鸦”$\text{ɣəʔ}_3^{21}$ $\text{lɔɔ}_{44}^{423}$ $\text{uʌ}^{21}$,“鼻子”$\text{piəʔ}_4^{312}$ tsə˙ 中的“老”和“鼻”。既然音节分裂的现象只是在降升调的条件下才发生的,本身并不具有辨义作用,就仍然可以把上声字和阳入字看作单个的音节,以免在韵母处理上复杂化。

降升调分裂音节的现象极其特殊,并不多见。(晋中太谷方言也有类似现象,但限于阳入字,如“活”xuɐʔ₁[xuʔ$^{31}$ ɐ$^{12}$]。)尽管早在2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到这一现象,① 但仍然值得注意。

晋中方言语音在系统上并不复杂,但在音值上却表现出了丰富的特点,其中如“鼻塞音”、“鼻擦音”、舌尖腭化音、高元音的舌位变化、由鼻尾韵转化的声化韵、鼻尾韵字文白异读中表现的“阴阳对转”、快慢读和调值的变化以及降升调分裂字音的作用,等等,都值得再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

① 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中说,浙江黄岩方言“上声字单读时(尤其是阳上),当中喉头关一关,作一个‘耳朵’音,把字切成两个音节似的”。又在《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1934年)一文中具体说明黄岩方言中的[ɔ$^{313}$:]实际上变为[ɔ$^{31}$:ʔɔ$^{3}$:]。(见《Readings in Linguistics》,P.41,New York,1958)就标音看,它的具体读音和晋中孝义太谷方言有些差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
作者＝
页数＝１９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